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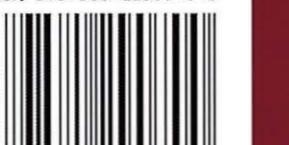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0卷

第30卷

润东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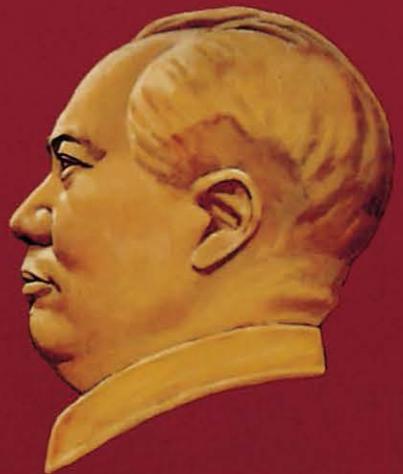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润东出版社

#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0卷



#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0卷

张迪杰 主编 第30卷

毛泽东全集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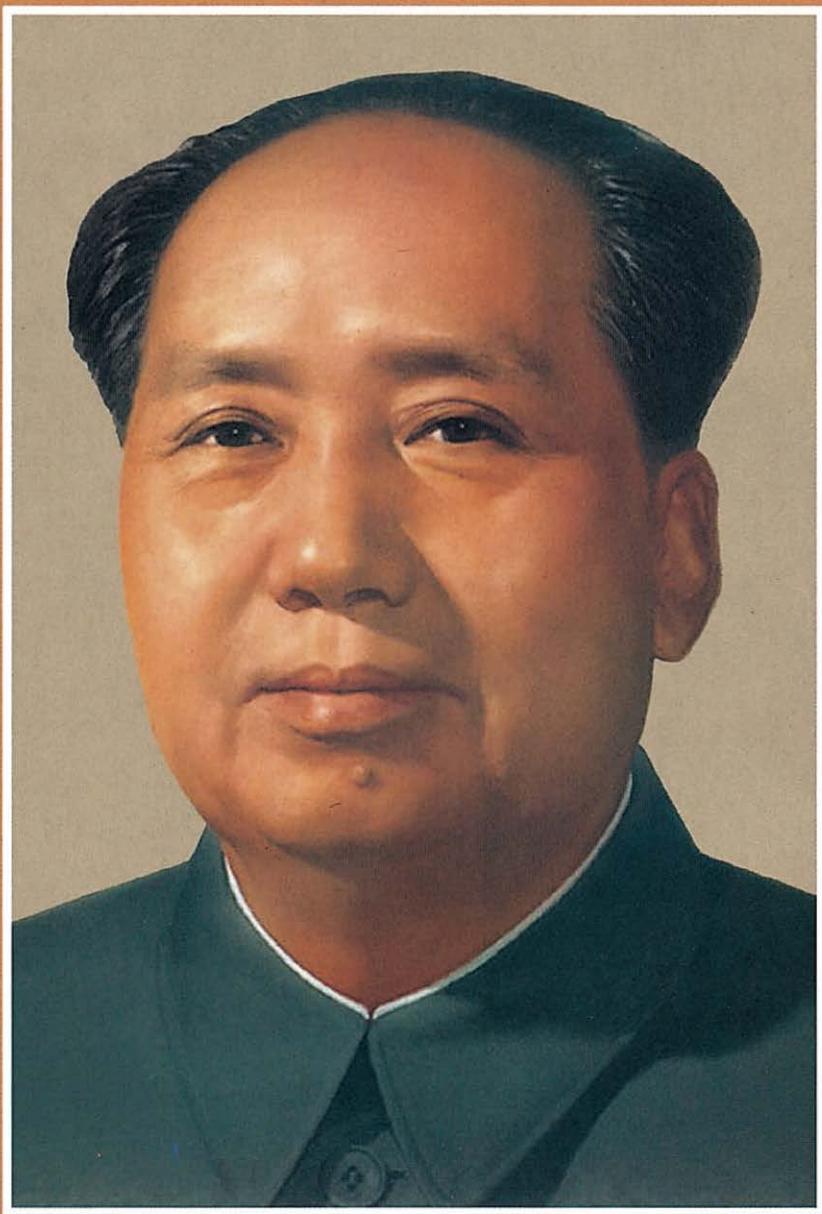
9 789881 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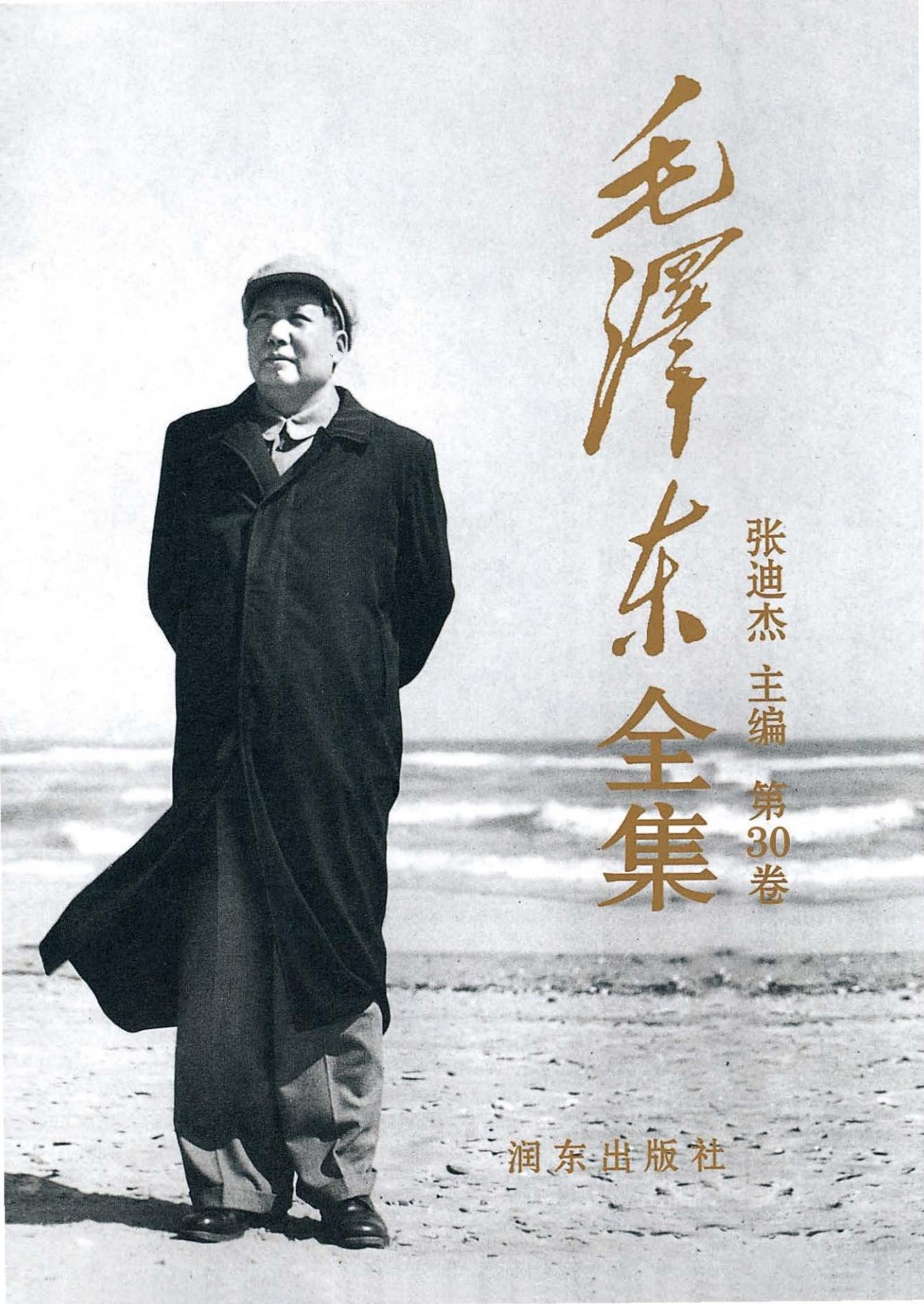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http://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0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 任 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 目 录

同意青海骑兵支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	1
(1951年1月17日)	
在杨尚昆关于朱德患肺炎需要休养的报告上的批语.....	2
(1951年1月18日)	
致新疆省和田专区各族人民电.....	3
(1951年1月18日)	
和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工作同志谈话纪要 .....	4
(1951年1月19日)	
对彭德怀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加写的话…	8
(1951年1月19日)	
华东应准备独力歼灭可能进犯之敌 .....	11
(1951年1月21日)	
中央关于转发河南省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致中南局电 .....	12
(1951年1月21日)	
关于镇反部署致上海市委电 .....	14
(1951年1月21日)	
祝贺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 .....	15
(1951年1月21日)	
关于建议再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致邓小平电 .....	16
(1951年1月22日)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	18
(1951年1月22日)	
关于四十五军等部队行动部署致陶铸电	19
(1951年1月22日)	
关于编印土改材料给彭真的信	20
(1951年1月22日)	
对河北阜平、曲阳灾区救济问题的批语	21
(1951年1月22日)	
给张澜的信	22
(1951年1月22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抗美援朝和推销土产工作报告的批语	24
(1951年1月23日)	
关于撰写介绍《实践论》文章给陈伯达的信	25
(1951年1月23日)	
关于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和复张云逸电	26
(1951年1月23日、24日)	
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局十一、十二月综合报告的批语	29
(1951年1月24日)	
对东南沿海设防和构筑工事的意见	31
(1951年1月24日)	
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反应注意之点的电报的批语	33
(1951年1月24日)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34
(1951年1月24日)	
关于编印学校反美斗争文件给彭真的信	36
(1951年1月24日)	

关于转送张澜复信致邓小平电 .....	37
(1951年1月24日)	
转发苏南区党委关于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报告的批语 .....	38
(1951年1月25日)	
给傅作义的信 .....	39
(1951年1月26日)	
在印度大使举行的印度国庆会上的祝词 .....	40
(1951年1月26日)	
给齐白石的信 .....	41
(1951年1月27日)	
关于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审判反革命罪犯的批语 .....	42
(1951年1月28日)	
关于嘉奖西南剿匪部队的电报 .....	44
(1951年1月28日)	
给张澜的信 .....	46
(1951年1月28日)	
志愿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 .....	47
(1951年1月28日)	
关于不要到处修工事致张云逸等电 .....	49
(1951年1月29日)	
关于华东沿海构筑工事问题致陈毅电 .....	51
(1951年1月29日)	
军委查询十八军入藏物资准备情况的电报 .....	52
(1951年1月29日)	
军委关于对越南同志要取耐心说服态度的电报 .....	53
(1951年1月29日)	

关于统一领导完成广西剿匪和土改等任务致陶铸电	54
(1951年1月30日)	
关于注意玉树地委开展医疗贸易工作的经验致邓小平电	56
(1951年1月30日)	
在华东军区关于修建水吉至建瓯公路的请示电上的批语	57
(1951年1月30日)	
土改工作应注意的主要之点	58
(1951年1月)	
为《察哈尔日报》题写报头	59
(1951年1月)	
为《钢铁小报》题写报头	60
(1951年1月)	
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	61
(1951年2月1日)	
关于颁布队列条令草案、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的电报	67
(1951年2月1日)	
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兵力编成	69
(1951年2月7日)	
中央关于抓紧春耕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电报	71
(1951年2月7日)	
土地改革要有秩序分阶段进行	72
(1951年2月7日)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73
(1951年2月7日)	
中央关于转发华东工会工作会议情况报告致饶漱石电	75
(1951年2月7日)	

为柳亚子居所题词 .....	76
(1951年2月7日)	
关于转发山东分局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	77
(1951年2月8日)	
中央对华北局部署镇反及审查留用人员报告的复电和批语 .....	78
(1951年2月10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补充指示的批语 .....	80
(1951年2月10日)	
中央关于引导民主人士参加土改工作的批语 .....	81
(1951年2月10日)	
转发陈丕显关于苏南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	82
(1951年2月11日)	
给马叙伦的信 .....	83
(1951年2月12日)	
为《学文化》半月刊题名 .....	84
(1951年2月12日)	
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致斯大林电 .....	85
(1951年2月12日)	
给黄炎培的信 .....	86
(1951年2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 .....	87
(1951年2月18日)	
大城市必须有计划地修建居民住房 .....	93
(1951年2月18日)	
中央转发察哈尔省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	95
(1951年2月21日)	

给符定一的信 .....	96
(1951年2月21日)	
中央关于印发和组织学习三个镇反文件的通知 .....	97
(1951年2月22日)	
在《新民报》北京社社会服务部来信上的批语.....	98
(1951年2月23日)	
转发罗瑞卿考察广东、广西、江西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	99
(1951年2月25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	101
(1951年2月25日)	
转发川西军区清匪报告的批语.....	102
(1951年2月25日)	
军委关于撤回新疆入藏部队问题致王震电 .....	103
(1951年2月25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市政建设计划的批语.....	104
(1951年2月26日)	
关于继续肃清福建一切股匪致叶飞等电 .....	105
(1951年2月26日)	
中央转发川东区党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06
(1951年2月27日)	
中央转发川西区党委关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情况报告的批语.....	107
(1951年2月27日)	
中央关于向各界人士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的电报.....	108
(1951年2月28日)	
转发西南军区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09
(1951年2月28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摧毁一貫道的报告的批语	110
(1951年2月28日)	
为人民出版社题名	111
(1951年2月)	
为《军学》题名	112
(1951年2月)	
关于志愿军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	113
(1951年3月1日)	
给胡乔木的信	115
(1951年3月2日)	
关于修改《矛盾论》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	117
(1951年3月8日)	
转发罗瑞卿关于浙江省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18
(1951年3月9日)	
给杨尚昆的信	120
(1951年3月9日、20日)	
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的批语	122
(1951年3月11日)	
给戴毓本的信	124
(1951年3月11日)	
给胡乔木的信	125
(1951年3月14日)	
关于校对《矛盾论》给田家英的信	126
(1951年3月15日)	
中央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	127
(1951年3月18日)	

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	129
(1951年3月18日)	
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30
(1951年3月18日)	
转发西南公安部关于财经交通部门清理反动分子总结报告的批语	131
(1951年3月18日)	
组织民主人士参观或参加土改、镇反工作	132
(1951年3月18日、30日)	
给周世钊的信	134
(1951年3月19日)	
转发中南局关于城市镇反指示的批语	135
(1951年3月20日)	
转发薄一波、刘澜涛三月份综合报告的批语	136
(1951年3月20日)	
对邓小平关于清查处理西南军政机关不纯问题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137
(1951年3月20日)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人民群众拥护镇反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39
(1951年3月20日)	
中央转发山东分局就黄祖炎被刺杀对所属市、地委的指示的批语	140
(1951年3月20日)	
给胡乔木的信	141
(1951年3月20日)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领导工作的意见的批语	143
(1951年3月22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反中如何对待民主党派成员的指示的批语	144
(1951年3月23日)	

中央转发罗瑞卿关于几个大中城市镇反工作考察报告的批语………	145
(1951年3月23日)	
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沧县地委镇反工作经验的通报的批语………	147
(1951年3月23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委镇反计划致饶漱石电………	148
(1951年3月24日)	
转发河北省公安厅关于天津专区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报告的批语…	150
(1951年3月25日)	
给李达的信………	151
(1951年3月27日)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召开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反问题的 报告的批语………	153
(1951年3月27日)	
给胡乔木的信………	154
(1951年3月29日)	
转发黄克诚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156
(1951年3月30日)	
转发山东分局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58
(1951年3月30日)	
转发中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159
(1951年3月30日)	
转发空军党委关于镇反工作的检讨和决定的批语………	160
(1951年3月30日)	
关于组织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镇反给刘少奇等的信………	161
(1951年3月30日)	
对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	162
(1951年3月30日)	

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人物开会通报镇反情况的电报	164
(1951年3月30日)	
关于播发许建国等在天津镇反大会上发言的电话稿	165
(1951年3月31日)	
关于彭友胜工作安排问题的信	166
(1951年3月31日)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的指示	169
(1951年3月)	
关于继续努力消灭残匪致叶飞等电	170
(1951年4月1日)	
给田家英的信	171
(1951年4月1日)	
转发饶漱石关于镇反中清理外中内三层等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72
(1951年4月2日)	
转发中南局传达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报告的批语	174
(1951年4月2日)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进行镇反的报告的批语	176
(1951年4月2日)	
给李介侯的信	177
(1951年4月2日)	
给张澜的信	178
(1951年4月3日)	
给张云逸的信	180
(1951年4月3日)	
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派遣工作组检查和帮助镇反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181
(1951年4月3日)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 .....	182
(1951年)	
给毛宇居的信 .....	184
(1951年4月5日)	
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	185
(1951年4月7日)	
中央转发山东分局关于城市镇反经验报告的批语 .....	186
(1951年4月7日)	
为翻译《斯大林全集》给斯大林的电报 .....	187
(1951年4月7日)	
给田家英的信 .....	188
(1951年4月7日)	
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 .....	189
(1951年4月9日)	
给李维汉的信 .....	190
(1951年4月9日)	
转发天津市委关于企业系统查出内奸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	191
(1951年4月10日)	
关于镇反工作中两个突出经验的通报 .....	193
(1951年4月10日)	
转发济南市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	195
(1951年4月13日)	
转发东北军区党委镇反工作计划的批语 .....	196
(1951年4月13日)	
转发南京市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	197
(1951年4月13日)	

防敌从元山登陆.....	198
(1951年4月13日)	
给田家英的信.....	200
(1951年4月16日)	
转发西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指示的批语.....	201
(1951年4月17日)	
转发天津市通过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进行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203
(1951年4月17日)	
转发宿县地委关于运用农代会布置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204
(1951年4月17日)	
转发山东军区关于镇反和审查不良分子的计划的批语.....	205
(1951年4月17日)	
注意对付敌可能降落的伞兵.....	207
(1951年4月17日)	
给胡南浦的信.....	208
(1951年4月17日)	
转发罗荣桓等关于黄祖炎被害事件调查报告的批语.....	209
(1951年4月19日)	
对陈毅巡视福建工作报告的复电和批语.....	211
(1951年4月19日)	
转发河北省农业厅审查旧人员的经验的批语.....	213
(1951年4月20日)	
给杨尚昆的信.....	214
(1951年4月20日)	
转发师哲关于陪同费德林访问情况报告的批语.....	215
(1951年4月21日)	

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	216
(1951年4月22日)	
转发中南局关于镇反工作补充指示的批语·····	219
(1951年4月23日)	
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工厂、企业、学校中开展镇反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220
(1951年4月23日)	
对订制军用雨衣被奸商诈骗情况简报的批语·····	221
(1951年4月26日)	
转发华东局关于十六个大中城市统一镇反行动的报告的批语·····	222
(1951年4月27日)	
给司徒美堂的信·····	223
(1951年4月27日)	
为《中国青年报》题写报头·····	225
(1951年4月27日)	
注意在第五次战役中给敌以尽可能大的打击·····	226
(1951年4月28日)	
给陈文新的信·····	228
(1951年4月29日)	
为炮兵学校题词·····	230
(1951年4月)	
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的批语·····	232
(1951年4月30日)	
转发二十三兵团党委关于开展民主运动的总结报告的批语·····	235
(1951年5月4日)	
关于转发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237
(1951年5月4日)	

给张治中的信	238
(1951年5月5日)	
关于同意苏联就美国对日和约草案所拟复文的电报	240
(1951年5月6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241
(1951年5月7日)	
转发谭震林关于杭州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242
(1951年5月7日)	
关于印发南京市公安局纯洁内部的计划的批语	244
(1951年5月7日)	
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 执行政策的决定	245
(1951年5月8日)	
对中南军区关于华南海防战备报告的复电和批语	247
(1951年5月10日)	
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镇反指示的检讨报告的批语	249
(1951年5月10日)	
同意在朝鲜战争结束前推迟解放金门	250
(1951年5月10日)	
对今后兵工建设方针报告的批语	251
(1951年5月12日)	
转发中南局关于纠正镇反中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的批语	252
(1951年5月15日)	
转发苏南区党委关于清理“中层”计划的批语	254
(1951年5月15日)	

转发四军党委关于镇反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	256
(1951年5月15日)	
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的批语 .....	257
(1951年5月15日)	
关于争取与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的批语.....	258
(1951年5月15日)	
给王淑兰的信.....	259
(1951年5月15日)	
为治淮工程题词.....	261
(1951年)	
中央关于转发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通知.....	263
(1951年5月16日)	
转发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的批语.....	271
(1951年5月16日)	
关于将捕人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提高一级的电报.....	273
(1951年5月16日)	
关于鼓励部队继续剿匪致广西军区电.....	274
(1951年5月16日)	
关于清理“中层”问题致高岗电.....	275
(1951年5月16日)	
中央转发察哈尔省委关于进一步普及镇反宣传计划的批语.....	276
(1951年5月16日)	
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	277
(1951年5月16日)	
在总政转发西北军区航空处镇反报告的批语中加写的一段话.....	279
(1951年5月17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等关于涡阳事件的电报的批语	280
(1951年5月19日)	
转发无锡市委关于组织民主人士参加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情况报告的批语	282
(1951年5月19日)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283
(1951年5月20日)	
中央关于印发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的通知	285
(1951年5月21日)	
转发东北军区党委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286
(1951年5月21日)	
关于同意目前收兵休整致彭德怀电	287
(1951年5月22日)	
中央批发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的通知	288
(1951年5月22日)	
转发上海市委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通报的批语	289
(1951年5月23日)	
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水平	290
(1951年5月23日)	
转发武威地委关于召开反革命家属座谈会报告的批语	291
(1951年5月23日)	
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的讲话	292
(1951年5月24日)	
给达赖喇嘛的信	298
(1951年5月24日)	

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	300
(1951年5月25日)	
对美英军目前只宜打小歼灭战.....	303
(1951年5月26日)	
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草稿时加写和改写的话.....	305
(1951年5月26日)	
给章士钊的信.....	307
(1951年5月26日)	
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歼敌.....	308
(1951年5月27日)	
关于华东各城市收回捕杀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致饶漱石电	310
(1951年5月28日)	
为陈永康题词.....	311
(1951年5月28日)	
关于同意阻敌和兵力调动计划致彭德怀电.....	315
(1951年5月31日)	
转发邓子恢关于城市工作报告的批语.....	316
(1951年5月31日)	
对薄一波报批的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给各中央局的电报等文稿的批语	318
(1951年5月31日)	
询问我军阵地构筑和防守情况.....	320
(1951年5月31日)	
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	321
(1951年6月1日)	
中央转发云南省委关于初步整顿党组织的决定的批语.....	322
(1951年6月1日)	

中央转发武汉市委关于汉口特务纵火事件报告的批语	323
(1951年6月2日)	
关于三兵团休整和接防问题致彭德怀电	324
(1951年6月2日)	
提高斗志停止敌进稳定局面	326
(1951年6月2日)	
关于处理涉及重要民主人士及其戚友的案件的批语	328
(1951年6月3日)	
准备粉碎正面之敌及侧面登陆之敌	329
(1951年6月4日)	
在审阅《人民日报》关于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的社论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330
(1951年6月6日)	
关于修筑进藏公路的批语	331
(1951年6月8日)	
六七两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	337
(1951年6月11日)	
为了解敌占金化、铁原后的动态及我军部署致彭德怀电	338
(1951年6月13日)	
转发华北局关于通县传达贯彻“死缓”政策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339
(1951年6月15日)	
在华南分局关于叶剑英患病的电报上的批语	340
(1951年6月16日)	
对民主德国举行“德中友好月”的感谢电	341
(1951年6月18日)	
转发华东局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整理“中层”的经验报告的批语	342
(1951年6月19日)	

转发华北局关于山西省直属机关审干情况报告的批语	344
(1951年6月19日)	
关于抓紧镇反和清理工作致陈毅电	345
(1951年6月19日)	
在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几处提法的请示 信上的批语	346
(1951年6月21日)	
请苏联提供六十个师装备并在六个月内运至中国	348
(1951年6月21日)	
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可能成为我军现代化的骨干	350
(1951年6月21日)	
给李烛尘的信	353
(1951年6月23日)	
给李介侯的信	355
(1951年6月23日)	
空军应抓紧做好参战准备	356
(1951年6月24日、27日)	
中央转发罗瑞卿关于犯人参加生产建设的报告的批语	358
(1951年6月25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镇反工作指示的批语	359
(1951年6月25日)	
在符定一来信上的批语	360
(1951年6月26日)	
请会商朝鲜和平谈判准备问题	361
(1951年6月29日)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等问题	363
(1951年6月29日)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时间地点等事宜	365
(1951年6月30日)	
停战谈判代表以朝鲜人民军为主	367
(1951年6月30日)	
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	369
(1951年6月)	
对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总结部署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371
(1951年6月)	
多打小规模的歼灭仗	372
(1951年6月)	
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的第二阶段作战方针	373
(1951年6月)	
关于准备和谈会议有关问题致彭德怀电	376
(1951年7月2日)	
停战谈判期间军事上应采取的对策	378
(1951年7月2日)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我方应提出的条款	380
(1951年7月3日)	
关于共同筹备谈判会场及开会事宜致金日成电	383
(1951年7月4日)	
关于保障开城地区的安全致彭德怀电	384
(1951年7月4日)	
关于速去开城准备停战谈判事宜致金日成等电	385
(1951年7月4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统战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387
(1951年7月6日)	

关于纪念武训的学校、碑文和建筑等处理办法的批语	388
(1951年7月7日)	
空军部队不要进驻朝鲜北部机场	389
(1951年7月7日)	
停战谈判不要提赔偿等问题	390
(1951年7月9日)	
对总政关于纪念建军二十四周年指示稿的批语和改写的话	391
(1951年7月9日)	
关于对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的意见致李克农电	392
(1951年7月9日)	
关于坚持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列入议程等致李克农电	394
(1951年7月11日)	
在薄一波关于傅作义情况的来信上的批语	395
(1951年7月11日)	
同意步兵师新编制	396
(1951年7月11日)	
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和给胡乔木的信	397
(1951年7月)	
关于同苏联谈判订购军事装备和军工建设问题	406
(1951年7月12日)	
关于容许新闻记者进入开城地区问题致李克农电	408
(1951年7月12日)	
中央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推迟召开的电报	409
(1951年7月12日)	
在胡乔木关于翻译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410
(1951年7月13日)	

关于拍发、广播对李奇微的复文修正稿致李克农电	411
(1951年7月14日)	
关于同意李奇微划中立区的提议致李克农电	412
(1951年7月14日)	
关于限定谈判代表团人数和划定中立区面积问题致李克农电	413
(1951年7月14日)	
关于不必再发记者问题公报致李克农电	414
(1951年7月14日)	
关于修改和广播对李奇微的复文致李克农电	415
(1951年7月14日)	
关于金日成、彭德怀电复李奇微原则同意将开城地区划为暂时 中立区的电讯稿	417
(1951年7月14日)	
给黄炎培的信	420
(1951年7月15日)	
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421
(1951年7月17日)	
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的修改	422
(1951年7月20日)	
关于做好尤金来华的接待工作致高岗电	423
(1951年7月20日)	
在关于修改谈判议程问题发言稿给李克农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424
(1951年7月24日)	
停战前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完全必要	425
(1951年7月26日)	
给张元济的信	426
(1951年7月30日)	

九月战役的兵力部署和粮弹储备.....	428
(1951年8月1日)	
在胡乔木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	429
(1951年8月1日)	
给张云逸的信.....	430
(1951年8月5日)	
给李介侯的信.....	431
(1951年8月10日)	
为革命老根据地人民题词.....	432
(1951年8月11日)	
对袁仲贤关于尼赫鲁催要毛泽东诗词的报告的批语.....	434
(1951年8月20日)	
对航空工业建设问题的批语.....	435
(1951年8月21日)	
对敌实施战术反击的意见值得认真考虑.....	439
(1951年8月21日)	
准备对付可能在镇南浦登陆之敌.....	440
(1951年8月26日)	
以十月二十五日为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441
(1951年8月28日)	
对西安市在清理积案中组织罪犯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经验的批语.....	442
(1951年9月1日)	
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胡志明主席的贺电.....	443
(1951年9月1日)	

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致斯大林电	444
(1951年9月2日)	
在中央关于对西藏各寺院及乞丐发放布施给张经武的电报稿上 加写的一段话	445
(1951年9月3日)	
给毛宇居、文梅清、张有成的信	446
(1951年9月4日)	
给张元济的信	448
(1951年9月5日)	
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草案的批语和修改	449
(1951年9月)	
对南京市委关于宗教改革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452
(1951年9月8日)	
关于荆嗣佑工作安排的信	454
(1951年9月8日)	
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	456
(1951年9月9日)	
在马寅初关于北京大学教员政治学习问题给周恩来的信上的批语	459
(1951年9月11日)	
给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的信	460
(1951年9月12日)	
给王自勉的信	462
(1951年9月12日)	
入藏部队的当前任务和兵力部署	463
(1951年9月13日)	
致米丁电	465
(1951年9月20日)	

给黄炎培的信	466
(1951年9月22日)	
致邓子恢电	467
(1951年9月24日、25日)	
关于印发纠正文字缺点的文件给刘少奇等的信	469
(1951年9月25日)	
致饶漱石电	471
(1951年9月25日)	
接受缅甸大使吴拉茂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472
(1951年9月27日)	
对章士钊反映张之洞、段祺瑞遗属情况来信的批语	474
(1951年9月29日)	
中央同意新疆分局对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检讨的电报	476
(1951年9月30日)	
对刘亚楼等关于空四师空战报告的批语	479
(1951年10月2日)	
关于更换谈判会址问题致李克农电	480
(1951年10月3日)	
给徐冰的信	481
(1951年10月4日)	
为马毛姐题词	482
(1951年10月4日)	
对李维汉关于给班禅送礼等事的报告的批语	483
(1951年10月6日)	
给谭熙春的信	484
(1951年10月7日)	

给戴毓本的信	485
(1951年10月10日)	
给贺晓明的信	486
(1951年10月10日)	
给文炳璋的信	487
(1951年10月10日)	
给雷瀚的信	489
(1951年10月11日)	
在关于扩大中立区问题给李克农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490
(1951年10月12日)	
在铁道部工程师韩伯林反映住房及房租问题的来信上的批语	491
(1951年10月12日)	
中央关于由邓华转达中央对志愿军战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的电报	492
(1951年10月14日)	
给陈叔通的信	495
(1951年10月14日)	
关于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	496
(1951年10月17日)	
转发西南局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批语	498
(1951年10月17日)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499
(1951年10月23日、11月1日)	

# 同意青海骑兵支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

(1951年1月17日)

宗逊<sup>[1]</sup>，并告仲勋<sup>[2]</sup>及贺、邓<sup>[3]</sup>：

一月九日电悉。同意你的提议，用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的粮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后由西南负责解决给养问题。请即照此作准备，并请注意：（一）从青海藏人中招收少数志愿兵，例如二三百人马，给以训练武装，加入骑兵支队；（二）班禅<sup>[4]</sup>集团随军入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三）该支队受十八军指挥，并编入十八军序列。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

[1] 宗逊，即张宗逊，当时任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2] 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3]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4]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在青海。

# 在杨尚昆<sup>[1]</sup>关于朱德患肺炎 需要休养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1年1月18日)

同意朱总司令休养计划，时间应长一点。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

---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 致新疆省和田专区各族人民电

(1951年1月18日)

新疆省人民政府转和田区各民族人民：

和田区军民联欢大会一月一日来电已悉。感谢你们积极拥军优属，并为抗美援朝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努力，祝你们永远的团结和进步！

毛泽东

子巧

# 和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 统战工作同志谈话纪要

(1951年1月19日)

□□□简述此次统战工作会议两项议题中第一议题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情况。谈及工商界、上层知识分子及宗教界均已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时，主席指出——

对佛教问题的处理，要研究一下，要使他们参加到运动中来。佛教改革如何做，要他们里面的开明分子商量一下。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没有信佛教的自由，庙都被占了。信佛教的人也不少，不要不理会。北京市恐怕要给他们腾出几个庙来，五台山关系蒙、藏两个民族，恐怕要重修一下。

主席问西北、西南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回答此运动已在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中展开。主席指示——

应该趁此时机展开，这是一个极大的教育。小城市如天水的商人最近曾有电报给我，说他们已经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次运动应普遍开展，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进来。

谈到运动如何进一步开展时，主席指示——

可找几位这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谈，好好研究一下。

有同志反映，朝鲜战争中，特别美帝在仁川登陆后，谣言较多，思想混乱，当时我们在宣传上还做得不够。主席指示——

在宣传上应当采取攻势，对特务造谣，镇压一下好。

反美、土改、镇压反革命，是当前三大运动。

中南同志反映，在土改中，农民进城捉人影响工商业。主席指示——

不可不捉，不可多捉。匪首恶霸是要捉的，但应合法地捉。

中南和西南同志报告，武汉和西南设立了城市联络组和减租退押调处委员会，作为适当处理土改和减租退押及城市联络问题的机关。主席指示——

设立这样的机关好，在几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要设立（县城是否设立，可以考虑），并且民主党派参加，由市政府管理，可捉者捉之，不可捉者则不捉，双方兼顾，合理解决，以免发生无政府状态。退押是要退的，也可经过这类机关商量。退多退少，适当处理，能多退则多退，不能多退则酌量少退。

主席问到华东情况，回答苏南各地现在情况好一些。主席说——

黄炎培先生准备去苏南看看土改，我向他说：你去看看很好，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和地主富农三方面的意见。

各地同志反映，地方上有些同志对民主人士去视察尚不免有所顾虑。主席指示——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

地方同志反映，对于民主人士的视察和批评，缺乏积极的欢迎态度。主席进一步指示——

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

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情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十个指头有九个是好的，最多只有一个指头不好。你们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计不足。要知道除了恶霸、匪首和特务分子以外，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而要采取积极态度。这个办法屡试屡验，结果总是好的。一切消极态度都是不对的，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有人看到毛病要骂怎么办？共产党连帝国主义都不怕，还怕人家骂？对民主人士要进行教育，并让他们参加活动。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这是不对的。

关于统战会议的第二个议题，即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发展问题，  
主席指示——

这一问题要好好解决一下，不然我们所做的和所讲的不一致，下面同我们不一致，就不好。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他们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这个问题应当写出几条，指示一下，应该在运动中使民主党派进步，放手让他们去做，好处多坏处少。这是积极的有益的方针。

各地同志反映，关于民主党派发展问题，有些地方干部思想上还有若干阻碍，如果没有党委有力的支持，就不易贯彻。主席指示——

应该使全党了解，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可以进步的。这次绥远二十三兵团已经调到冀中，这个部队的军长师长都是原来的人，过去和我们打过很多仗，连这个部队都可以进步，为什么民主党派

和民主人士就不可以进步呢？我们应采取积极态度去办，不要怕麻烦。要使他们了解抗美、土改、肃反是必要的，并且使他们参加。搞国家政权总是有麻烦的，怕麻烦就不要政权好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过去找他们来都不来，现在来了，你们又怕麻烦。

□□□提到，有关统战部门本身的工作还缺乏一个章程，此次会议准备拟出几条。主席指示——

对统战部的编制、任务、范围和做法均有所规定，这是好的。直到地委一级均应有统战部门的组织才好，如何办，也研究一下。

有同志反映，主席去年说过，注意统战工作的，在党内还是少数，这个状态，今年在若干地区没有多大改变。主席指示——

这个少数派是正确的，只要坚持土改与肃反，这就不是右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要用积极态度去组织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们，使他们参加斗争，带领他们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少数派会慢慢扩大，主要依靠好好说服人家。应当每年开两次统战会议，一次大的，一次小的，各中央局至区党委都应如此。不要怪别人，只怪你们自己没有招兵买马、积草囤粮。不要使自己陷于孤立，要好好做出成绩来给大家看。你们要很好地取得党委书记和组织、宣传等部门的帮助，善于经过党委和党委负责同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你们当中要出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

中南同志提出镇压反革命分子应与土改中反霸斗争有所区别。主席指示——

此一问题，□□□同志已经发了指示。江西四十七军向中央报告，在一个多月里，二十多个县里，杀了匪首□□□人，得到老百姓的欢呼。

# 对彭德怀<sup>[1]</sup>在中朝军队 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稿的 批语和加写的话

(1951年1月19日)

—

德怀同志：

在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稿收到。这个报告的内容很好，但为了避免由中国人对朝鲜的政策和工作作出决定的语气，为了避免泄漏军密的可能（许多事实和数字可以口说不要写出），并为了使行文更为简洁，现将你的报告稿在文字上和某些意思上略加修改发上，请再依据情况予以斟酌，并请事先送金首相阅正，商得其同意。

毛泽东

一月十九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二

以金日成<sup>[1]</sup>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在朝鲜五年来的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建立了英勇的人民军，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又正在和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sup>[2]</sup>匪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

[1]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人民军最高指挥官。

[2] 李承晚，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中朝兩國同志愛親如兄弟般的  
團結在一起，休戚與共，生死相依，  
為民族同敵人而奮鬥到底。中國同志  
必須將朝鮮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  
樣，保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  
鮮人民的一針一樣，如同我們在國內  
的看來和做的一樣，這就是勝利的政治基  
礎。只要我們①能够這樣做，勝利就  
一定會得到。

毛泽东起草的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示的手稿（部分）。

# 华东应准备独力歼灭可能进犯之敌<sup>[1]</sup>

(1951年1月21日)

(一) 同意即将二十五军开往福建，使福建共有四个军。(二) 浙江的二十一、二十二两军，上海附近的二十三、二十四军，照你们部署不变，浙江加紧督促剿匪，务于二、三两月内完成任务。(三) 杨得志部<sup>[2]</sup>准备入朝参战，但二野三个军已集中河北，第二批三个军亦可于六月以前集中河北。如江浙有事，可给你们三个军使用。但你们应尽现有力量加强整训，准备独力歼灭台匪可能的进犯。

---

[1] 这是毛泽东致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并告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电的主要内容。

[2] 杨得志部，指第十九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 中央关于转发河南省委镇反工作 报告的批语和致中南局电

(1951年1月21日)

—

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并请转发所属省市区党委：

我们认为河南省委一月十三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sup>[1]</sup>是正确的，特发给你们参考。我们希望各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有一个关

---

[1] 中共河南省委1951年1月13日给中央的报告说：河南省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纠正右倾倾向后，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重大的革命行动，在社会各方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工农基本群众很高兴；地主阶级不再气焰高涨；民主人士中除左倾者积极拥护外，另一部分表示“摸不着底”，缄默寡言；工商界也表示沉默、小心，有“莫谈国事”之味；城市学生和机关新干部中，也有些震动。而有些地区的领导已为胜利所迷惑，开始出现不清醒的现象。根据上述情况，省委决定一般停止逮捕，杀人要更加讲究策略，严禁草率从事的现象。该放者经过一定手续，通过群众，迅速处理释放，有意识地把空气松弛一下。同时结合抗美援朝及土改等群众运动，广泛进行宣传工作，讲明政策，说明理由，稳定各阶层群众。但对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则继续追踪缉捕，务使归案。

中央关于转发河南省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致中南局电

于镇压反革命的总结性的报告。

中央  
一月廿一日

—

中南局并转河南省委：

我们收到了河南省委一月十三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是很好的，业已转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中南局亦将这个报告用电报转发湘鄂赣粤桂五省参考，请这五省每省写这样一个总结性的肃反报告。

中央

# 关于镇反部署致上海市委电

(1951年1月21日)

上海市委，并告饶、陈<sup>[1]</sup>：

你们一月六日关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二月的综合报告，由华东局转来，业已收到，甚好，甚慰。在这个报告中提到了今年一、二月份的几项中心工作，也是好的。其中说到你们准备在一月份中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有力打击，望你们对此进行周密的侦察布置。布置好了，同时动作，做一次准确的逮捕。然后好好清理审讯，处决一大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请你们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斟酌情形，妥善处理。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

[1]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 祝贺意大利共产党 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

(1951年1月21日)

隆哥<sup>[1]</sup>同志和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同志们：

值此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意大利共产党在过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以及在现在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计划、争取人民民主的意大利的斗争中，已经得到巨大成绩，因而使自己成为全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全意大利爱国人民的核心。我们坚信你们的正义事业在托里亚蒂<sup>[2]</sup>同志和意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

[1] 隆哥，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

[2] 托里亚蒂，今译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 关于建议再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 致邓小平<sup>[1]</sup>电

(1951年1月22日)

小平同志，并告漱石，子恢，仲勋，一波，高岗<sup>[2]</sup>各同志：

一月八日综合报告<sup>[3]</sup>收到阅悉。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假如可能的话，在今年五月一日以前，请你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主要是对工会工作，对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对城市政权问题，加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指邓小平1951年1月8日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11、12两月工作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着重汇报了农村减租、退押运动开展的情况和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情况。报告说，关于减租退押，目前主要还是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以免“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等到退押浪潮过去，大部分退了的时候，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关于城市工作，已专门召集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收获，在于自此以后，我们将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研究和指导。会议中着重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了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

关于建议再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致邓小平电

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为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准备材料。  
四中全会准备在五月开，请按此部署工作。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1951年的毛泽东。

#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

(1951年1月22日)

叶、黄、肖、林<sup>[1]</sup>，并告中南局：

一月十七日电悉。广东情况已明了，你们的部署是正确的，希望努力完成任务。此外，望注意镇反工作。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凡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如此分三方面进行，可期迅速，又较妥当。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敌焰，伸张正气，望妥慎布置施行。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

[1]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指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副司令员。肖，指肖向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林，指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 关于四十五军等部队行动部署 致陶铸<sup>[1]</sup>电

(1951年1月22日)

陶铸同志，并告邓、谭，叶、方<sup>[2]</sup>：

一月十五日电悉。四十五军争取早日结束剿匪待命开韶关广州线整训备战；廿一兵团确定在广西境内剿匪及驻防；四十九军争取在五月或六月以后能集中使用，望按此意图进行部署。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被派往广西帮助剿匪工作。

[2]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 关于编印土改材料给彭真<sup>[1]</sup>的信

(1951年1月22日)

彭真同志：

前次收集土改材料中，可择其不需要修改的若干篇，连同『在』江西省委一月七日指示<sup>[2]</sup>一件，印一本发党内及民主人士。需修改的，则不列入。篇数少点不要紧，有六七篇即可。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又有一件，是关于纠正错划阶级成分的，浙江省委向所属的指示<sup>[3]</sup>，华东局和中央都加了案语转发华东各省及全国，此件待电报发出后，请你找来加印进去。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共江西省委1951年1月7日关于纠正土改中缺点给各地委的指示。

[3] 指中共浙江省委1951年1月13日关于纠正错划阶级成分给各地委的指示。

# 对河北阜平、曲阳灾区 救济问题的批语<sup>[1]</sup>

(1951年1月22日)

周<sup>[2]</sup>:

应当批准此项要求。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1951年1月14日关于阜平、曲阳两县灾情及解决办法给省人民政府转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等的报告上。报告说：河北阜平、曲阳山区，今年雹、水、风、虫各灾均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尤以阜平为甚。历史上山区人民衣着困难，灾后棉衣破烂、棉被缺少情况更严重。许多灾民衣不蔽体或以夹填棉，冰天雪地无法出门生产。阜平全县及曲阳山区均系老区之老区，华北机关曾长驻此地，群众与我血肉相关。中央前拨我省寒衣数量较之募得总数比例很小，可否再增拨棉被、寒衣各十几万套。同时，阜、曲两县山田滩地冲毁沙压，畜牧业远非战前可比，如不从长期扶植生产封山育林着手，则山地困难不易解决，故逐年贷款扶助生产实有必要。以阜、曲两县言，今年贷150万斤米，以本省全省山地生产贷款补助说，有2000万斤米之数，即可做出很多事情。如是三五年后，可以收很大效果，较之年年救济并不多费。

[2] 周，指周恩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 给张澜<sup>[1]</sup>的信

(1951年1月22日)

表方先生：

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sup>[2]</sup>一件，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顺致  
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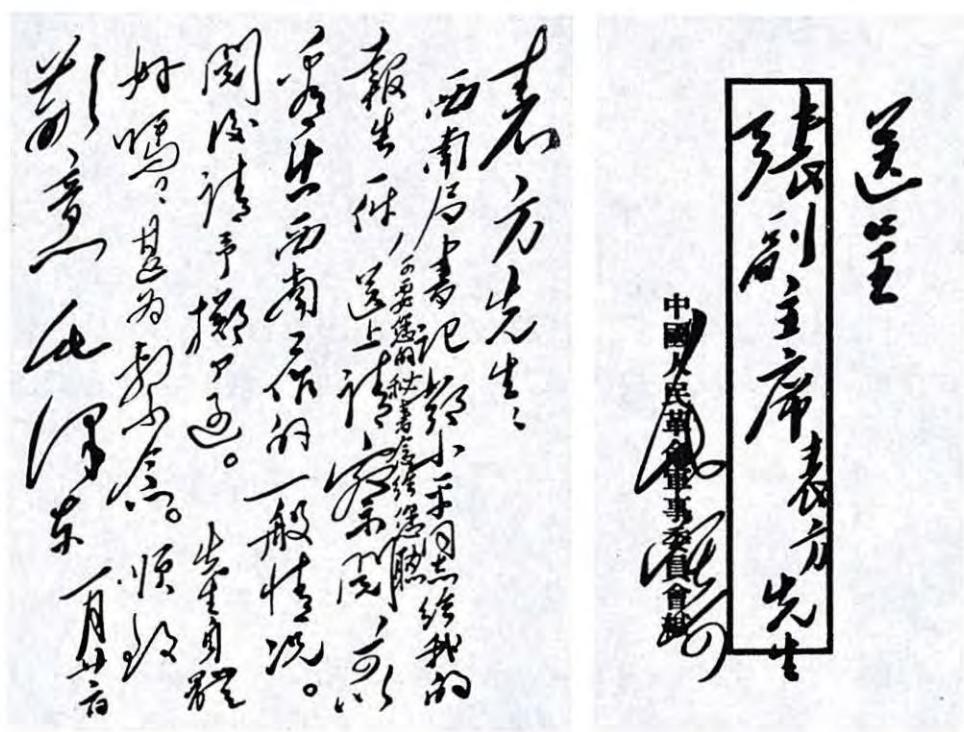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

[1] 张澜，字表方，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2] 指邓小平1951年1月8日关于西南局11、12两月工作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毛泽东致张澜信的手稿。

#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抗美援朝 和推销土产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1月23日)

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东北局，并请转发所属各分局，省委市委区委党委：

华北局负责同志在下列报告中提出的两项经验<sup>[1]</sup>值得注意，特别是关于推销土产的经验，应在全国推行起来，请你们务必加以研究，仿照推行为要。

中央  
一月二十三日

---

[1] 指薄一波、刘澜涛1951年1月20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总结的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和推销土产两项经验。（一）关于抗美援朝运动，主要是将运动深入到各阶层，用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并给各种工作以新的推动力。（二）关于推销土产，已获得如下经验：1. 国营商店、合作社和私商，应积极恢复和开辟新旧商业网，这是给土产找出路的最重要的一环。2. 根据产、运、销三者有利，和双方遵守合同信用的原则，广泛推行代购、代销、运输等各种形式和各方面的合同。3. 选择经济要地，建立有强大吞吐能力的货栈。4. 经过合作社，在社员中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赊购存货业务。5. 动员和组织私商经营土产，城市和地方党政要在各方面给以帮助。6. 组织群众性的运输，克服运输力不足的困难。7. 动员群众进行远距离的推销。

# 关于撰写介绍《实践论》文章 给陈伯达<sup>[1]</sup>的信

(1951年1月23日)

伯达同志：

我还是和过去差不多，拟于一周后去附近地点正式休息一期，行前当找你一谈。关于介绍《实践论》，《学习》上有了一篇<sup>[2]</sup>，我没有全看，你写文章时请翻阅一下。你文章写成时，如有时间，可以给你看一遍。

毛泽东  
一月廿三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指1951年1月15日出版的《学习》杂志第三卷第八期社论，题为《〈实践论〉——学习和工作的指南》。

# 关于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 和复张云逸<sup>[1]</sup>电

(1951年1月23日、24日)

—

陈、饶<sup>[2]</sup>及华东军区党委会，邓、谭<sup>[3]</sup>及中南军区党委会，贺、邓<sup>[4]</sup>及西南军区党委会，张、习<sup>[5]</sup>及西北军区党委会，聂、薄<sup>[6]</sup>及华北军区党委会，并请转发所属各军区、兵团及军的党委会：

请你们检查一次军队中军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及负责同志对于中

---

[1] 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3]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4]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5] 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6]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薄，指薄一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央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关于纠正正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是否引起了注意，是否传达了这个指示，自己在剿匪工作及帮助地方工作中是否有过这种右倾偏向及是否克服了这种偏向，将检查结果向军委做一次报告。根据广西方面的报告，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警〈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以致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广西于去年九月起开始纠正此种错误，三个月中，正确地杀了匪首惯匪及其他首要反动分子三千余人，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现将中南军区政治部一月十六日转来广西报告<sup>[1]</sup>一份转发给你们阅看，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报告，希望你们认真研究，并做出自己的结论报告我们。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二

云逸同志，并告子恢、剑英<sup>[2]</sup>：

一月十六日电悉。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九万余，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民气大伸，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云逸同志患病亟须休养直到病愈为止，到广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1951年1月16日关于广西执行镇压政策前后情况给总政治部的报告。

[2]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州后请叶方<sup>[1]</sup>妥为照料。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

[1] 叶，指叶剑英。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 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局十一、十二月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1年1月24日)

漱石，子恢，剑英，仲勋，一波，高岗<sup>[1]</sup>同志：

兹将邓小平同志一月八日的报告<sup>[2]</sup>转给你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概况。其中提到西南已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等语。现在华东、中南、西北各区正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等项工作的高潮，许多同志当然很忙，但请你们考虑，腾出一段时间，在五月一日以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为四中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准备意见。四中全会拟在五月召开，请你们按照

---

[1]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2] 指邓小平1951年1月8日关于西南局11、12两月工作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这个时间部署工作。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 对东南沿海设防和构筑工事的意见

(1951年1月24日)

邓、谭、赵、苏<sup>[1]</sup>，并告陈、唐、张、周<sup>[2]</sup>及剑英、漱石、陶铸<sup>[3]</sup>及广西军区：

一月十七日电悉。(一)过去未经你们察看设计，盲目地构筑工事，浪费甚大，是一教训。以后凡需支用经费，构筑工事、要塞，修建道路、房屋、仓库等项，均需经过你们派人察看设计，做出预算，经过中央审核批准，然后动手兴建，否则不予报销。(二)虎门要塞修建计划已定，费用照发。(三)榆林港是否照虎门那样建筑一个炮兵团的要塞，你们可设计作预算电呈考虑。(四)对海外守岛部队做出两个方案是对的。珠江口外各岛中必须坚守者，应有物质准

---

[1]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1907—1988），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赵，指赵尔陆（1905—1967），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苏，指苏静（1910—1997），福建海澄（今龙海）人，当时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

[2]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唐，指唐亮（1910—1986），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指张震，湖南平江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参谋长。周，指周骏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参谋长。

[3]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备，也是对的。（五）汕头至大亚湾一线及其他海岸线与内地，根本不要修筑什么工事或要塞，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军队须离开海岸线，驻在便于按照上述意图歼灭敌人的适当地点，从事整训，不要去守海岸线。为稽查特务潜入及打灭少数匪众登陆，应由保安队及地方武装担任。（六）修复公路上的桥梁是必要的，但只要普通军车能行即可，不要特别大修，按此规模修建的费用可以照发，否则不发。（七）敌人进攻，只有蒋匪，不会有外国人。蒋匪有五十万军队，其中海军、空军、军事学校、军事机关、地方部队、军人家属等占了二十余万，能作战的正规陆军最多三十万人，至少须留十万人守备台湾，故能动用侵粤侵闽侵浙者最多不过二十万人。即使他集中二十万人打一处，只要他登上大陆，我均可以两三个军至多三四个军各个歼灭之。在我们方面，只有虎门、厦门、舟山、吴淞四处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岛必须确保，不令侵入。其余一切海岸线，都不要守而要让他进来，以利聚歼。海南岛不是能养活十万以上军队的地方，敌在十万人以下登陆，我有一个正规师及冯白驹<sup>[1]</sup>部在岛上坚持，再将四十三军主力加上去，即可各个歼灭之。许多共产党员打了二十几年的仗，忽然把经验都忘了，到处修工事，畏敌如虎，你们应加教育，叫他们不要如此。（八）在厦门、舟山、吴淞三处修建阵地及福建、浦东等地修理道路桥梁，请陈、唐、张、周指示下面注意只择十分必要者好好设计修建之，务须避免浪费。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

[1] 冯白驹（1903—1973），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反 应注意之点的电报的批语

(1951年1月24日)

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sup>[1]</sup>同志：

华东局给福建省委电所说肃反应注意之点，我以为是对的。即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为盼。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

[1]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1月24日)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市区党委：

关于取缔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的总结<sup>[1]</sup>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反革命重要分子。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准备和实行取缔一贯道的大规模

---

[1] 指中共山西省委1951年1月9日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给华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山西省取缔一贯道的工作，着手于1949年冬，经过一年的准备，于1950年11月中旬才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全面取缔。这些准备工作包括：（1）打入侦察，确切地掌握一贯道的全面情况；（2）选择重点试验，取得具体经验；（3）不断地进行宣传揭露，组织宣传攻势；（4）经过整风和党员训练班，批判麻木不仁的态度，端正政策思想；（5）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堵塞工作中的漏洞。凡此一切，都给全面取缔工作准备了条件。全省范围同于11月12日动手搜捕，10天内，各地均照预捕名单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取缔工作分3个步骤。第一步，捕捉职业道首，摧毁其领导机关，陷其整个组织瘫痪。第二步，对小道首教育训练，令其登记、悔过，分别情况，给予管制。第三步，经过深入的揭露工作，组织道众诉苦、控告，在有觉悟的基础上展开退道运动。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斗争中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故成绩甚大，值得全党研究。

中央  
一月廿四日

# 关于编印学校反美斗争文件 给彭真的信

(1951年1月24日)

彭真同志：

请考虑，将学校反美斗争文件，清出若干件，例如西南局一月廿日的报告及早一晌〈向〉南京市委的一个报告<sup>[2]</sup>，印一本，发各民主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共南京市委1950年12月7日关于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给华东局并中央的报告。

# 关于转送张澜<sup>[1]</sup>复信致邓小平<sup>[2]</sup>电

(1951年1月24日)

小平同志：

你一月八日报告<sup>[3]</sup>我送给张表方先生看了，现将他的复信<sup>[4]</sup>转给你看。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

[1] 张澜，字表方，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2]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3] 指邓小平1951年1月8日关于西南局11、12两月工作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4] 指张澜1951年1月24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邓小平同志1月8日报告已详阅。关于退押进行情况，言之甚详，处理亦甚当。西南押租，系预防佃户不能缴纳佃租而为之预押，要到退佃时才退押，实在是一种剥削。今天土地权收归国有，主佃关系已不存在，当然应该退押。报告上说，等到退押浪潮过去，大部分退了的时候，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对于确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多在“缓、少、不”三字上做文章，对顽固的则交法庭处理。将来能够切实审慎照此做是很好的。

# 转发苏南区党委关于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1月25日)

罗迈<sup>[1]</sup>同志：

此件<sup>[2]</sup>可印发到统战会议的各同志，并可要他们带回去给更多的同志看看。请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统战部一律定期召集，或有大事召集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开会，如苏南这次会议一样，并向中央统战部作报告，不开会不报告者认为失职。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中共苏南区委员会统战部1950年12月26日关于苏南区第一次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情况给华东局并华东局统战部的报告。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召开的这次民主党派座谈会，就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和民主党派的工作交流了情况，统一了思想，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到会各党派代表都非常满意。

# 给傅作义<sup>[1]</sup>的信

(1951年1月26日)

宜生兄：

廿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sup>[2]</sup>一份，送上请察阅，阅后请予掷还。  
廿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廿六日

---

[1] 傅作义，字宜生，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政治部1951年1月12日关于部队纪律和军民关系情况给华北军区并绥远军区、省委的报告。第二十三兵团是由董其武率领的原傅作义所属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报告谈到该部于1950年12月22日从绥远出发，1951年1月4日全部到达河北景县龙华镇一带，在遵守群众纪律和军民关系上有显著进步，当地政府和群众比较满意，部队也受到了教育。

# 在印度大使举行的 印度国庆会上的祝词<sup>[1]</sup>

(1951年1月26日)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庆祝印度国庆，祝贺印度人民，祝贺你们的总统。

---

[1] 1月26日是印度的国庆日。这是毛泽东在印度大使举行的印度国庆会上的祝词。

# 给齐白石<sup>[1]</sup>的信

(1951年1月27日)

白石先生：

来信收到，已转寄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请他酌情处理。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廿七日

---

[1] 齐白石，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 关于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 和审判反革命罪犯的批语<sup>[1]</sup>

(1951年1月28日)

—

刘、周、陈、彭真<sup>[2]</sup>同志：

此件<sup>[3]</sup>关涉军事及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事前召集政协常委及政府委员，法院，司法部，检察署，公安部人员开一次座谈会取得同意；在此次会上，应有人报告最近时期镇压反革命的情况。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刘少奇关于惩治反革命条例起草中的几个问题的来信上的两条批语。第二条批语是针对刘少奇信中的一句话而写的，这句话是“审判反革命罪犯仍以照现在办法归各地军事法庭为好”。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3]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修正草案）。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正式公布了这个条例。

二

在军管时期应当如此。

# 关于嘉奖西南剿匪部队的电报

(1951年1月28日)

贺、邓、张、李<sup>[1]</sup>并告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及福建，广东，广西军区：

你们一月六日送来的一九五〇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sup>[2]</sup>，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枝，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四万人而奋斗。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

[1]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张，指张际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指李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关于1950年剿匪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说，自成都战役结束后，即以全力剿匪作为全军的中心任务。一年来，全军不分上下，不分兵种，不分部队与机关、学校，均参加了这一斗争。剿匪斗争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 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2) 集中兵力，重点进剿。(3) 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三者密切协同。(4) 开展捕捉匪首运动与镇压匪首工作。(5) 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

朱德贺龙邓小平转来对西南剿匪工作  
的嘉奖电报。此件不  
8月15日-16日  
附：  
内有  
贺龙华中、南门四月六日送来的  
今年第一年第一季西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  
路经正确，方法适当，成绩显著，甚为  
欣慰。现将<sup>军械武器八十五万斤，子弹三  
十箱万枝。</sup>一  
行房予以嘉奖。  
希望继续努力，为彻底消灭西南匪军而  
奋斗。你等所做<sup>工作</sup>在敌我双方都极好，  
望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此致  
毛泽东

毛泽东致贺龙、邓小平等电的手稿。

# 给张澜<sup>[1]</sup>的信

(1951年1月28日)

表方先生：

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八十余万，缴枪四十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四万，两三个月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sup>[2]</sup>一件，假如您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

[1] 张澜，字表方，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关于1950年剿匪工作的总结报告。

# 志愿军必须立即准备 发起第四次战役<sup>[1]</sup>

(1951年1月28日)

德怀同志：

(一) 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四时给我的电报及给各军准备作战的命令均已收到。

(二) 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

(三) 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主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计划。

(四) 中朝两军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发表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川，然后停战。

(五) 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六) 我军没有补兵，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干会议上进行说明。此次会议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议。

(七) 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以后，再进行两个月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

(八) 宋时轮兵团<sup>[1]</sup>，应即移至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区域休整，并担任巩固该区域，防止敌人在仁川及镇南浦登陆。在将来的第五次战役中，该兵团即担任西部战线之作战。

(九) 执行第四次战役时，请你考虑将中朝两军主力分为两个梯队，各带五天干粮，第一梯队担任突破及一段追击，第二梯队担任又一段追击，以便能使战役持续十天至十二天，歼灭更多敌人。

(十) 你的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十九时

---

[1] 宋时轮兵团，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宋时轮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关于不要到处修工事致张云逸<sup>[1]</sup>等电

(1951年1月29日)

张、莫、李、卢<sup>[2]</sup>，并告中南军区，广东军区，华东军区：

一月廿五日电悉，所提修建边防工事计划，根本不适合我军的作战要求。如敌来攻，海上者应当让其登陆，而不要阻止其登陆；越南者应当让其侵入，而不要阻止其侵入。不论敌从海上来，从越南来，均应当让其深入内地，不要怕失掉钦州、廉州、防城、龙州、南宁及其他城市，而应当让它进这些城市。我军应当位于纵深机动地区，待敌深入，然后包围歼灭之。这就是我军历来战胜敌人的办法，为什么你们忘记了。你们计划到处设防，到处修工事，摆成被动挨打的姿势，使我军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是完全错误的。目前你们工作的重心，应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有步骤地有把握地实行土地改革，严厉镇压反革命，大杀几批匪首，惯匪，恶霸，及罪大的会门头子与特务分子，这些，就是最重要的巩固国防的工作。广东方面，除虎门必须筑要塞及珠江口外某几个岛上应修必要的工事和堡垒之外，其他地方亦一概不修工事，不守海

---

[1] 张云逸，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张，指张云逸。莫，指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李，指李天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卢，指卢绍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参谋长。

岸线，敌来诱其深入，聚而歼之。华东方面亦只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的某些必要地点修筑要塞和工事（这些是确定要修的），其余亦一概不修。广西地处大陆，距台湾很远，逃越匪部人数甚少，完全没有什么可怕，不应该修任何工事。

毛泽东

一月二十九日

# 关于华东沿海构筑工事问题致陈毅<sup>[1]</sup>电

(1951年1月29日)

陈毅同志，并告饶<sup>[2]</sup>及中南军区，广东军区，广西军区，华东军区：

鉴于广东方面过去时期未经中南军区勘察指导设计，到处做工事，结果无用，浪费极大，此次华东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修筑要塞或工事，在福建修南平同安公路，务请你们注意事先给以指导。第一，不要在指定地区不经研究设计随便修建，以致无用浪费；第二，在指定地区内亦只择最需要者做，不要到处做；第三，大陆海岸线及内地根本不要做；第四，大陆兵力，位于纵深地区，敌来应让其登陆然后相机歼击之，不要到处防守，不要阻其登陆；第五，建筑材料，必要者不可吝惜，照需要支给，但仍须防止浪费，注意废物利用，注意节省。

毛泽东

一月廿九日

---

[1]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 军委查询十八军人藏物资 准备情况的电报

(1951年1月29日)

西南军区：

一月二十四日西北军区给你们的电报，你们谅已收到。该电第二项所述入藏部队必须携带之皮衣、皮帽、帐篷、饭锅、水桶、黑矾、大蒜、料袋、牛绳等二十余种物品，十八军是否业已准备好，望查告。

军委

一月二十九日

# 军委关于对越南同志 要取耐心说服态度的电报

(1951年1月29日)

韦国清<sup>[1]</sup>同志：

一月廿七日电悉。(一)同意你所提的整训计划。(二)对越南同志的缺点要取耐心说服的态度，使他们能够接受你们的意见，而不要引起他们的反感。他们现有的缺点正是中国军队在幼年时期所曾经有过的，并不足怪，只有用说服态度帮助他们并在长期锻炼中才能使他们逐步改进。

军委  
一月廿九日

---

[1] 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顾问团团长。

# 关于统一领导完成广西剿匪 和土改等任务致陶铸<sup>[1]</sup>电

(1951年1月30日)

陶铸同志，并告广西省委，中南局及叶、方<sup>[2]</sup>：

一月廿七日电<sup>[3]</sup>悉。布置甚妥，照此执行。四十五军在三月间调走后，广西尚有四十九军，廿一兵团及地方部队，必须把一切股匪潜匪肃清，一切匪首捉起，一切非法枪支起掉。干部不足，即由四十九军，二十一兵团及地方部队中抽出大批干部，配合地方干部，用包干制办法，划分区域，负责到底，将剿匪、清匪，起枪，捉杀匪首、恶霸、特务，减租，退押，直到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全套工作做完，方算完成任务。为要完成此任务，所有军队，必须统一于省委地委领导之下，实行领导的一元化。张云逸<sup>[4]</sup>同志现去广州休养，提议陶铸代理省委书记，不要回武汉，

---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被派往广西帮助剿匪工作。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3] 指陶铸1951年1月27日关于广西剿匪部署给中南局转毛泽东的报告。

[4] 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委书记。

关于统一领导完成广西剿匪和土改等任务致陶铸电

或者回来报告一次立即去广西。总之广西极为重要，工作必须做好，上述提议是否适宜，请中南局考虑电告。

毛泽东

一月卅日

# 关于注意玉树地委开展医疗贸易 工作的经验致邓小平<sup>[1]</sup>电

(1951年1月30日)

小平同志：

此件<sup>[2]</sup>，不知西北局发给你们没有，如未，可看一看，并请转告十八军同志注意玉树的经验。

毛泽东  
一月卅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2] 指中共青海省委1951年1月12日向西北局转报的玉树地委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医疗贸易工作的报告。青海省委指出：玉树地委的报告证明，在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医疗贸易工作是接近群众与联系群众的一种很好的工作方式，今后更应重视。

# 在华东军区关于修建 水吉至建瓯公路的请示电上的批语

(1951年1月30日)

周<sup>[1]</sup>:

此件<sup>[2]</sup>请你与陈薄<sup>[3]</sup>商复。据称已四次请示未得复。

毛泽东

一月三十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副主任唐亮、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周骏鸣1951年1月28日关于福建水吉建瓯新线公路不应停建给军委并报华东局并告华东交通部的电报。电报说：水吉建瓯新线公路修建，在军事上极为重要。就其目前加强闽、粤沿海战备，大批物资南运，尤觉该线之修筑刻不容缓。如按华东交通部转中央交通部指示，即行停工，造成损失尚属事小，而今后入闽战略交通，不能保障，事关重大。我们曾四次请示，迄未获复。

[3] 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 土改工作应注意的主要之点<sup>[1]</sup>

(1951年1月)

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要求一点不出乱子是很难的，只要省、地两级掌握得好，随时纠正偏差，使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地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的手里，那就很好了。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发动群众做好土改工作给江西、湖南省委的指示所写批语的主要内容。

# 为《察哈尔日报》<sup>[1]</sup>题写报头

(1951年1月)

察哈尔日报



毛泽东为《察哈尔日报》题写的报头。

[1] 《察哈尔日报》，中共察哈尔省委机关报，1949年1月13日在张家口创刊。1951年元旦由四开四版扩大为对开四大版时，毛泽东为其题写了报头。1952年12月16日《察哈尔日报》随着察哈尔省制的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终刊。

# 为《钢铁小报》题写报头<sup>[1]</sup>

(1951年1月)

钢铁小报

A large, bold, black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s '钢铁小报' (Steel Little Report).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or semi-cursive style, with thick, expressive strokes. The background behind the calligraphy is a light gray, textured surface.

毛泽东为《钢铁小报》题写的报头。

---

[1] 《钢铁小报》，即《太钢日报》的前身，创刊于1950年1月8日。1951年1月，毛泽东为其题写了报头。

# 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sup>[1]</sup>

(1951年2月1日)

中央及军委各部委、政务院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地委、军区、兵团、军，及专员公署以上政府的党组负责同志及民众团体的党组负责同志：

## 《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

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或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使人便于阅读，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兹分别规定纠正办法如下：

### (一) 不许滥用省略。现在许多电报文件中，对人名、地名、年

---

[1] 中共中央这个指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当时这个指示没有公开发表，只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印发给各级党委及所属部门。1951年2月25日，毛泽东就发表这一指示的问题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写信，说：“可以印成小本发给党内外较多的人看，不要在报上发表，因此件并无给群众看的必要。而一般文法教育则应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

月日、机关名、事物名，滥用省略，使阅者很费记忆和猜想的工夫，有时简直莫名其妙。这种现象，应依以下规定予以纠正：

甲、除对大家习知的中央某些负责同志，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某些负责同志，野战军（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有时（不是一切时间，也不是多数时间）在电报上下款可以写姓不写名，或姓下加职衔，例如“毛主席”“周总理”“陈饶”“彭习”等以外，一般情况，无论在电文中，或在上下款，须一律写姓名，不得只写姓不写名。必要时，还须在姓名之前加上职衔，例如“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

乙、地名一律用全名，例如“上海”“福州”“广州”“重庆”，不得写成“沪”“榕”“穗”“渝”，“福建”不得写成“闽”，“湖南”不得写成“湘”。仅在两个以上著名城市或著名省份联写在一起使人一看就明白的时候，例如“京津”“沪宁”“豫鄂湘赣”“粤桂边界”等，或者和其他文字结合在一起成为流行的特殊用语的时候，例如“沪东”“皖北”“津浦路”“天兰路”等，始得用简称。

丙、普通文电，均须注明月日。紧急文电，须注明月日时。正式公布文件，须注明年月日。凡月日时，概用普通数字，不得用地支<sup>[1]</sup>和韵目。例如“二月一日十四时”，不得省称“丑东未”。年份概用全数，不得省略。例如，“一九五一年”，不得写成“五一年”。

丁、机关名称，概用全名。例如，“东北局组织部及宣传部”不

---

[1] 地支，又叫十二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统称，传统用作表示次序的符号，这里用作代表月份的符号。

得省称“东北组宣”，“空军司令部”不得省称“空司”，“全国总工会”不得省称“全总”。

戊、事物名称，除其省称确已为全国人民所普遍熟悉者，例如“中共”“反帝”，得于非正式场所使用外，其余，一律用全名。例如，“减租减息”“生产救灾”，不得省称“双减”“生救”；“土匪特务”（指土匪与特务），或“特务匪徒”（指特务为匪类），不得省称“匪特”。在一切正式文电中，则应尽量避免省称。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得省称“马、恩、列、斯”，美帝国主义不得省称“美帝”。

己、凡有特别生僻的语词，其意义为多数阅者所不能了解者，应作必要的注释。

(二) 必须遵守文法。电报文句虽应力求简洁，但不得违背文法。必要的主词、述词、宾词，必须完备无误。单句、复句，必须分清。代名词，必须紧跟所代的名词。形容词、副词词尾，尽可能分用“的”“地”，加以区别（形容词是形容名词的，例如“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故在名词之前用“的”字区别之。副词主要是形容动词的，例如“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故在动词之前以“地”字区别之）。如此，方能使条理分明，意义确定。至于信件和公布的文件，不但文字应当完全，标点亦须正确。为解决此一问题，《人民日报》不久将连载文法讲座，望全党予以注意。并望地方县委、县政府以上，军队师以上负责干部，至少有一人学会文法，以便负责修正文电字句。

### (三) 纠正交代不明的现象。

甲、凡请示的文电，均须写明情况和自己的要求和意见（转发下级请示文电，亦应说明自己意见），并写明希望何机关或何人于何

时答复何项问题。凡答复的文电，均须写明系答复何机关或何人于何时提出的何项问题。凡指示的文电，对下级的要求，亦应规定明确。例如，应由何机关如何办理，或于何时报告办理情况等。总之，每件事都要交待六个“什么”，即什么事、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样子、什么原故。仅在绝对明了时，始可有所省略。

乙、为了便于交待清楚，除了综合性的报告及指示以外，必须严格执行一事一报制度，禁止在一个文电中包括不相干的几件事，禁止用党内的文电来兼代党外的文电。

丙、不论报告、请示或指示的文电，如为不但向着一人一机关，而且有兼告他人他机关之必要者，应于写明主管的人或机关之后，写“并告”二字，再接写他人或他机关，以明责任。

丁、凡转发文电，须全文转发或摘要转发者，应将受件的人或机关、为什么转发此文电的道理、转发的人或机关及转发的时间，写在该转发文电的前面，而将该转发文电列在后面，以清眉目；并须将转发文电的上下款及年月日照旧保留，不可省略。

戊、凡文电中引用他人他机关文电语句，首先须写明何人何机关于何时说的，然后写上引用的语句，在该语句前后作引号（方括弧），接着写上“等语”二字。如引用的语句的内容不是意见而是事情的叙述，则接写“等情”二字。下面再写自己的意见，以清眉目。

(四) 纠正眉目不清的现象。除简短者外，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长的文电分为几段时，每段亦应采用此法。一个文电有几层意思或几

项要求时，必须注意按照条理，分清层次，以数目字标明段落和项目。

(五) 凡文电必须认真压缩。各级领导同志责任重大，事务繁剧。向领导同志或机关请示或作报告时，必须反对两种倾向，即应请示报告而不请示报告的倾向和不应请示报告而随便请示报告的倾向。在写请示文电或写报告时，必须注意文字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现在有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嫌杂乱。其原因，是未经压缩，说了许多无须说的空话，或者没有分清条理，把杂乱无章的草稿随便往上送。其结果，使领导同志对这些文电很难看，或者就没有看，等于白写。今后一切向上级机关请示或报告情况和对下级发布指示的文电，所有起草和批阅文电的同志，必须以负责的精神，至再至三地分清条理，压缩文字，然后发出，否则应受批评。但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

以上各项，望各级党委切实执行。

为了顺利执行这个指示，请各级负责同志将本指示印发各机关所有负责起草及批阅文电的同志，在适当的会议上做传达，并在党内刊物上予以登载。

为求确实生效起见，中央责成中央办公厅及各中央局办公机关，按照本指示所提出的各项标准，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底，将本年度一月至四月份收受文电分别作第一次检查，对执行得好的机关予以通报表扬，对执行得不好的予以通报批评。以后每四个月作一次

检查，一九五一年共作三次检查，年终一次为一年的总检查。每次均须写出总结，经中央审定，通报全党各主要领导机关。

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对已存缺点认真地加以改革。在对同志进行教育时，应选择几篇大体上合于上述标准的文件，作为范例，使人们阅读，并有人给以讲解，这是进行教育时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 关于颁布队列条令草案、内务条令 草案、纪律条令草案的电报

(1951年2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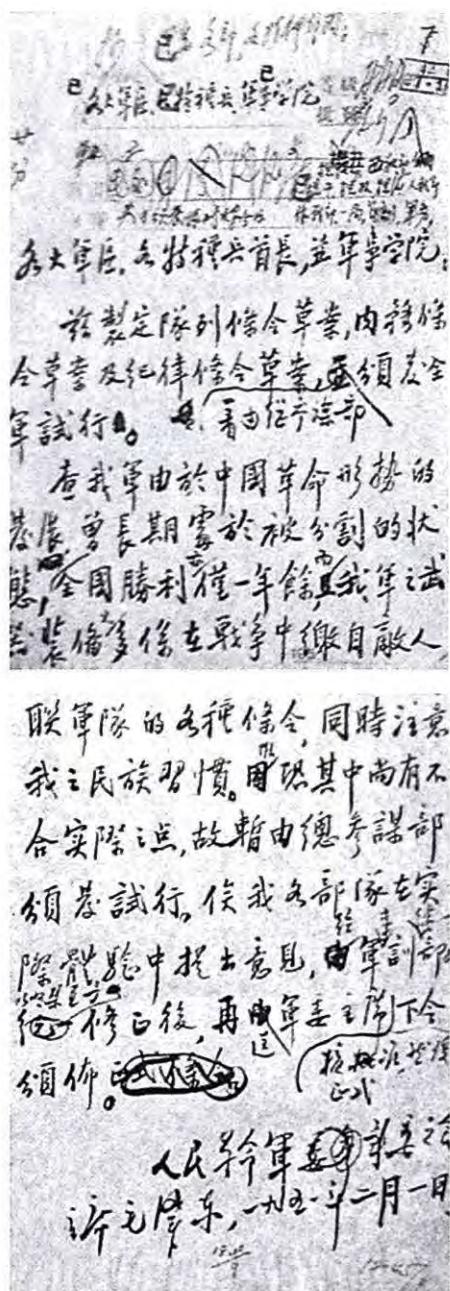
各大军区、各特种兵首长，并军事学院：

于制定队列条令草案，内务条令草案及纪律条令草案，委由总参谋部发全军试行。

查我军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曾长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全国胜利亦仅有一年余，而我军之武器、装备大多系在战争中缴自敌人，种类及其庞杂。仅以上这些原因，就造成了我们过去在编制上、装备上、动作上，甚至在某些制度上的不统一。全国胜利后，为了实现国防军正规化、近代化的新任务，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动作，统一制度，就成为全军一致的要求。为此，军事训练部曾召集各区军事教育干部共同讨论制定以上三种条令草案，作为目前统一的准则。这三种条令草案的制度，主要参照苏联军队的各种条令，同时注意我之民族习惯，故暂由总参谋部颁布试行，俟我各部队在实际体验中提出意见，经军事训练部以收集并予修正后，再送军委主席核准，然后正式下令颁布。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1951年2月，毛泽东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布队列条令草案、内务条令草案和纪律条令草案。图为关于颁布这三个条令给各军区等的电报。

種類極其龐雜。以上這些原因，就造成我們過去在編制上、裝備上、動作上，甚至某些制度上的不統一。全國勝利後，為了鞏固防衛規範的新任務，統一編制，統一裝備，統一動作，統一制度，成為全年一致的要求。因此，軍事訓練部曾召集各區軍事教育幹部共同討論，制定以上三種條令草案，作為目前統一的準則。這三種條令的制定方案，並在監督

人民軍隊的各種條令，同時注意我民族習慣。雖然其中尚有不合實際之處，故暫由總參謀部頒發試行。俟我各部隊在實際體驗中提出意見，由軍訓部修改之後，再由軍委會下達頒佈。

人民革命軍司令部  
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 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兵力编成

(1951年2月7日)

恩来<sup>[1]</sup>同志，并告聂<sup>[2]</sup>：

在你计划轮番作战兵力时，请将杨得志<sup>[3]</sup>三个军，西南三个军（先开两个，另一个军于到达河北后教育两星期接着开），杨成武<sup>[4]</sup>两个军（在六十六军及五十军回来接防后开），四十七军（二月底集中岳州<sup>[5]</sup>，三月初开东北，训练两星期开前线）及董其武兵团<sup>[6]</sup>两个军（先补充一万人，武器方面似亦须有所改善，准备四月间开前线负守备任务），编成为第二番作战兵力。而以现任第一番作战兵力中的第十三兵团六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三个月至四个月（其中五十军、六十六军并同时担任天津、营口线守备，其他四个军位于平壤、沈阳之间休整），改为第三番作战兵力。九兵团全部则回华东任守备。补充计划，九兵团回华东再补，十三兵团需于撤到休整地点后即予补足。西南已到之两个军，杨成武两个军，董其武两个军，须令其立即开始出境作战的各项教育，应召集这些军的负责人来京

[1] 恩来，即周恩来。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3] 杨得志，当时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员。

[4] 杨成武，当时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5] 岳州，即湖南岳阳。

[6] 董其武兵团，指第二十三兵团，兵团司令员董其武。

开会授予任务。西南第二期三个军，须令其于二月准备完毕，三月开始出动，四月到达河北。

毛泽东

二月七日

# 中央关于抓紧春耕 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电报

(1951年2月7日)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各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

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在短时间内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从事春耕，争取今年的丰收年成，这是极端重要的。在春耕期内，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除指导春耕，总结土改经验，训练土改干部，清理镇反积案，总结镇反经验等项工作之外，请划出一段时间，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总结一九五〇年一年城市工作经验，将城市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例如：（一）依靠工人的思想问题；（二）工厂管理问题；（三）工会工作问题；（四）城市建设问题；（五）城市建党问题；（六）城市肃反问题；（七）城市统一战线问题等，加以研究和总结，指导所属增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并为五月开会的四中全会准备意见。上列各项问题当然一次不能讨论完毕，应分开几次专题会议，各市委尤其应作此种专题讨论。下面是成都市委的报告，发给你们作参考。

中央  
二月七日

# 土地改革要有秩序分阶段进行

(1951年2月7日)

中南局，华南分局，并告华东局及福建省委，西南局，西北局：

一月二十六日中南局转来杜润生<sup>[1]</sup>同志一月十九日电已收到，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我们所说广东土改工作应当加快进行，并不是要求广东同志违反这样的秩序，群众还没有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就要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而是要加快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进行分田。广东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抓紧发动群众、整顿基层这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所以现在一提到分田就感觉吃力，但现在这样去做还不算迟，还应该这样做。

中央  
二月七日

---

[1] 杜润生，1913年生，山西太谷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 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7日)

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广西省委：

(一) 分局一月十九日关于粤桂两省肃反工作的报告<sup>[1]</sup>收到了，此种检讨甚好。请分局将这个报告发给粤桂两省所属各地委，市委，县委，有关剿匪工作的军队党委，及政府党组，引起大家注意。(二) 报告的末尾说分局正在重新拟出具体的肃反办法，此项办

---

[1] 这个报告的时间应为1月29日。在报告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汇报了广东、广西两省的镇反情况、群众反映和匪特活动情况，检讨了镇反工作未能很好开展的原因。检讨的主要内容是：(一)不少地区党委领导重视不足，抓得不紧。分局有时对此大力推动不够，实际支持不足。宣传部门对反特宣传很不重视，对中央关于镇反宣传工作指示未作动员布置。公安部门具体组织力量也缺乏主动。(二)有些地区未能把镇反与土改很好结合，强调了土改，放松了镇反工作。(三)有些干部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仍认识模糊，不根据具体情况周密布置，便轻率盲动且又不及时请示报告，造成某些地区的紊乱现象。(四)广东大部分地区机械地运用宣传动员、大力突击侦调、统一行动三个阶段的划分，至今仍未全面行动，仍停留于第一、第二阶段。(五)在镇反工作中暴露了我侦察工作的严重弱点，材料不够确实，掌握敌情很差，造成乱捕、乱杀现象。

法是否业已拟好，望早日电告中南及我们。

中央  
二月七日

# 中央关于转发华东工会工作会议 情况报告致饶漱石<sup>[1]</sup>电

(1951年2月7日)

漱石同志：

你一月三十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sup>[2]</sup>很好已转发各地仿行。华东方面你可将这个报告发给各省委市委及区党委，叫他们照做，改善工会工作。

中央  
二月七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 指饶漱石1951年1月30日关于华东工会工作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要顺利开展生产竞赛，必须解决和生产密切相关而为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发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树立面向生产的思想，使生产运动在工人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持久巩固下去。工会工作的好坏主要以生产的好坏作标准，而且也只有当工会工作以领导生产运动为中心，并在发展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展开工人福利事业、文化教育工作及建立工会工作制度等，工会工作才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

# 为柳亚子居所题词<sup>[1]</sup>

(1951年2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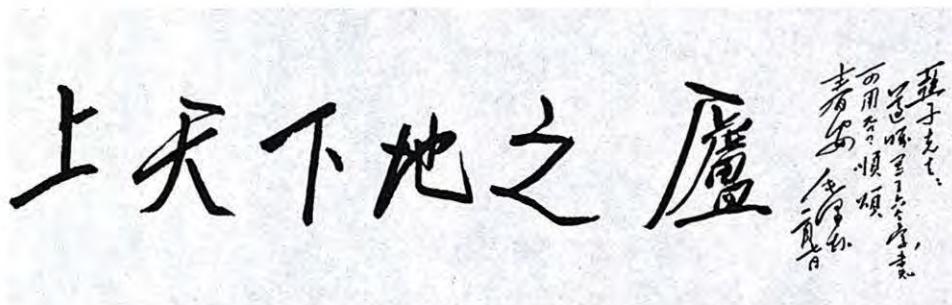
亚子先生：

遵嘱写了六个字，未知可用否？顺颂春安。

毛泽东

二月七日

上天下地之庐。



毛泽东为柳亚子居所的题词。

[1] 1951年，柳亚子一家迁至紫禁城西之北长街，毛泽东为其居所题词：上天下地之庐。

# 关于转发山东分局 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8日)

一波、澜涛、高岗、秀山<sup>[1]</sup>同志，并告漱石<sup>[2]</sup>及山东分局：

看了山东分局二月五日致华东局及中央的电报<sup>[3]</sup>，甚为高兴。漱石及山东分局所采方针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首会门特务活动猖獗情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情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毛泽东

二月八日

---

[1]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澜涛，即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秀山，即张秀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3]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电报中提出，山东属于老区，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但过去对地主恶霸土匪特务镇压不够，群众对我宽大无边不满。因此掌握目前时机，将真正为群众所痛恨的地霸匪首、反动道会门首要及特务分子坚决镇压一批，仍为十分必要。为了使各种镇压能博得群众同情，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波动，将采取分批、分地、分机关的镇压办法及事前事后进行确当的宣传。

# 中央对华北局部署镇反及审查留用人员报告<sup>[1]</sup>的复电和批语

(1951年2月10日)

---

[1] 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这个报告指出，由于1950年10月以前杀的反革命分子很少，在1500万人口的新解放区的土改中几乎没有杀人，因此朝鲜战争起来后，新解放区社会秩序极不安定。10月以后，各地都杀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予一贯道以普遍的严重的打击，因而人心振奋，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但还有些该杀的没有杀，该捕的没有捕，为此作了镇反的进一步计划，并提出了执行计划时应掌握的几点：1. 必须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行动开始后，要及时汇报，以便互通声气，及时指导。2. 明确镇反对象，第一是特务，第二是匪首和惯匪，第三是道门主要是一贯道，第四是恶霸地主，第五是还乡伪军政人员中反革命有据的分子。重点放在前三种。3. 老区、半老区和新解放区三种地区分别对待，不能混淆。老区只杀少数还乡的反革命有据的反革命分子和进行复辟的地主恶霸分子。半老区还不彻底，应捕杀一批。用和平方法土改的地区和绥远新区，要狠狠地杀几批。4. 该杀而轻判或错释了的反革命分子，可以翻案复判。5. 在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同时，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将狠狠地杀一批和广泛地团结一批结合起来。在处理较大的民主人士时，应报告中央批准执行。对起义军官应本起以前不咎、起义后有反革命活动者必须有确凿证据再行逮捕，并商起义将领后处理的原则办事。报告还指出，为了整顿我们的队伍，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在留用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普遍进行一次查历史、查立场、查工作的三查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取得经验，决定先在京津两市、各省省会和天津铁路局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推广。

—

华北局：

二月九日关于重新部署镇压反革命及对留用人员试行三查的报告，收到。同意你们的计划和办法，望坚决执行之。

中央

二月十日

—

华东局，山东分局，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西南局，东北局：

下面是华北局二月九日关于重新部署镇压反革命的计划，可以看出华北存在的问题及应取的方针。华北局的报告中又提出了用整风方式审查留用人员及新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在华北是应该开始做了，在取得经验后再向你们通报。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区则尚未到时机，还须等待一个时期，但亦应当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据湖北公安厅报告，已在省级机关中逮捕匪特、地霸、盗匪、反动党派、会门等一百六十名，其中省委占百分之二十二，省府占百分之七十四，中原大学占百分之三，军区占百分之一，内有处长五名等情，可见问题之严重，故必须开始引起注意。

中央

二月十日

#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补充指示的批语

(1951年2月10日)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

兹将华东局二月七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补充指示<sup>[1]</sup>转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所述的方针，策略和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  
二月十日

---

[1] 中共中央华东局镇反补充指示指出，华东地区过去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中心，目前又处国防前线。因此抓住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的时机，在华东全境有计划地消灭人民痛恨的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恶霸与真正有证据的重要匪首及会门头子，是完全必要的。目前除浙江、皖南抓人杀人较多的地区应当停一下，以便清理积案，总结经验，然后再杀第二批外，其他杀得不够的省（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根据各地经验，只要首先把镇压的锋芒，对准为群众所痛恨的匪首、恶霸及确有证据的特务、会门头子和解放后继续活动的国民党重要党团分子，就不致抓错杀错。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必须强调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的原则，必须注意事前事后向各界人民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注意掌握此紧彼松、此松彼紧、一紧一松的策略。

# 中央关于引导民主人士 参加土改工作的批语

(1951年2月10日)

各中央局：

从西南局中南局两个报告<sup>[1]</sup>证明，对民主人士应采积极态度，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项工作，有极大益处。

中央  
二月十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2月6日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给中央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中南局1951年2月1日关于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问题给分局、各省市委、区党委并报中央的报告。西南局的报告中说，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党外人士，对提前土改一致赞成。这次会议得出经验，应该对民主人士多做工作，特别是吸引他们到农村去参加土改运动，这不但可以教育他们，而且能够减少许多叫嚣和运动的阻力。中南局的报告谈到，北京民主人士土改队领队李俊龙由湘返汉，向民主人士作了参观土改的报告，反映甚好。经验证明，对民主人士参加或是参观土改，我们必须主动，让他们下去做工作，使他们了解指导农民运动的难处及我们指导运动的观点和方法，明白告诉他们运动的真相及我们纠正偏向的决心和办法，对他们的家庭，又主动地依法予以照顾，这样做可换得他们主动和我们站在一边去反对无理叫嚣。

# 转发陈丕显关于苏南 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11日)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市区党委：

下面是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给饶漱石<sup>[1]</sup>同志的报告<sup>[2]</sup>，发给你们作参考。我认为陈丕显同志的进一步镇反计划是完全正确的，那些镇压反革命尚不甚坚决和明确的地方，应当以此为法。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 陈丕显1951年2月4日关于进一步镇反计划的报告指出，要加紧剿匪，再抓一批恶霸地主，捕杀一批职业会道门头子、典传师、大坛主，加强对特务的侦破和镇压，全面登记反动党团和特务，抓杀一批为群众所痛恨的罪大恶极者和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者。

# 给马叙伦<sup>[1]</sup>的信

(1951年2月12日)

夷初先生：

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学文化三字照写<sup>[2]</sup>，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

[1] 马叙伦，字夷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2] 指毛泽东为《学文化》半月刊题写刊名，该刊于1951年3月1日创刊。

# 为《学文化》半月刊题名<sup>[1]</sup>

(1951年2月12日)

学文化



毛泽东为《学文化》题写的刊名。

---

[1] 1951年1月，为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当时的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筹办《学文化》半月刊，并致函毛泽东请其题写刊名。2月12日，毛泽东挥笔写了“学文化”三个字并复函云：“学文化三字照写，不知可用否？”随后，周恩来为《学文化》创刊号题词：“努力学习文化，好提高政治、技术水平。”该刊于1951年3月1日创刊。

# 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 致斯大林电

(1951年2月1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大元帅：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请接受我对阁下、苏联政府与人民的衷心感谢与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谨此，祝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更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北京

# 给黄炎培<sup>[1]</sup>的信

(1951年2月17日)

黄任老：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sup>[1]</sup>

(1951年2月18日)

中央于二月中旬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各项重要问题，兹将决议要点通报如下。

## 一 二十二个月的准备工作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 二 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

### 三 土改

1. 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
2. 争取今年丰收。
3. 依靠县农民代表会及训练班。
4. 积极造成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
5. 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
6. 同意华东分期退押的办法。
7. 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
8. 土改后，增划区乡，缩小区乡行政范围。

### 四 镇压反革命

1. 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
2. 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
3. 注意“中层”<sup>[1]</sup>，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 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
5. 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

[1] 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分为外层、中层、内层。清理“外层”，是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 五 城市工作

1.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今年必须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议程如中央所通知，向中央作两次专题报告。
2. 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3. 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4. 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
5. 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
6. 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
7. 全国总工会及各上级工会应着重解决下面的具体问题。
8. 党委及工会应着重典型经验的创造，迅速推及各处。

## 六 整党及建党

1.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
2. 整党、建党，均须由中央及各中央局实行严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动。
3. 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但城市可以在一九五一年进行

整党。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sup>[1]</sup>清洗出去。然后对“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不要伤感情，不要重复一九四八年“搬石头”<sup>[2]</sup>的经验。

4. 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在头两年内乡村支部一般不要超过十个党员。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

## 七 统一战线工作

1. 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
2. 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
3. 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

---

[1] 1951年整党时，把党员划分为四种人：一、具备党员条件的；二、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三、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

[2] 指1948年整党运动中曾经发生的“左”的偏向。所谓“搬石头”，即抛开原有的党支部，将原基层干部一律撤职，有的地区甚至大批停止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的党籍。中共中央及时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明确规定整党的主要内容为“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以及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使整党工作克服“左”的偏向，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4. 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

## 八 整风

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

等級 AAAA

台來

已送

並No.382

類

195

No. 601

附註

中央政治局各項重要問題決議要點通報  
要點（事件）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各中央局、並轉分局、省委、大市委：

中央於二月中旬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各項重要問題，茲將決議要點通報如下。其中有些意義不甚明確的詞句，由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在召開會議時向你們說明。

中央

二月二十五日

（一）二十二個月的準備工作：

「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幹部都明白。準備時間，現在起，還有二十二個月，必須從各方面加緊進行工作。

（二）抗美援朝的宣傳教育運動：

（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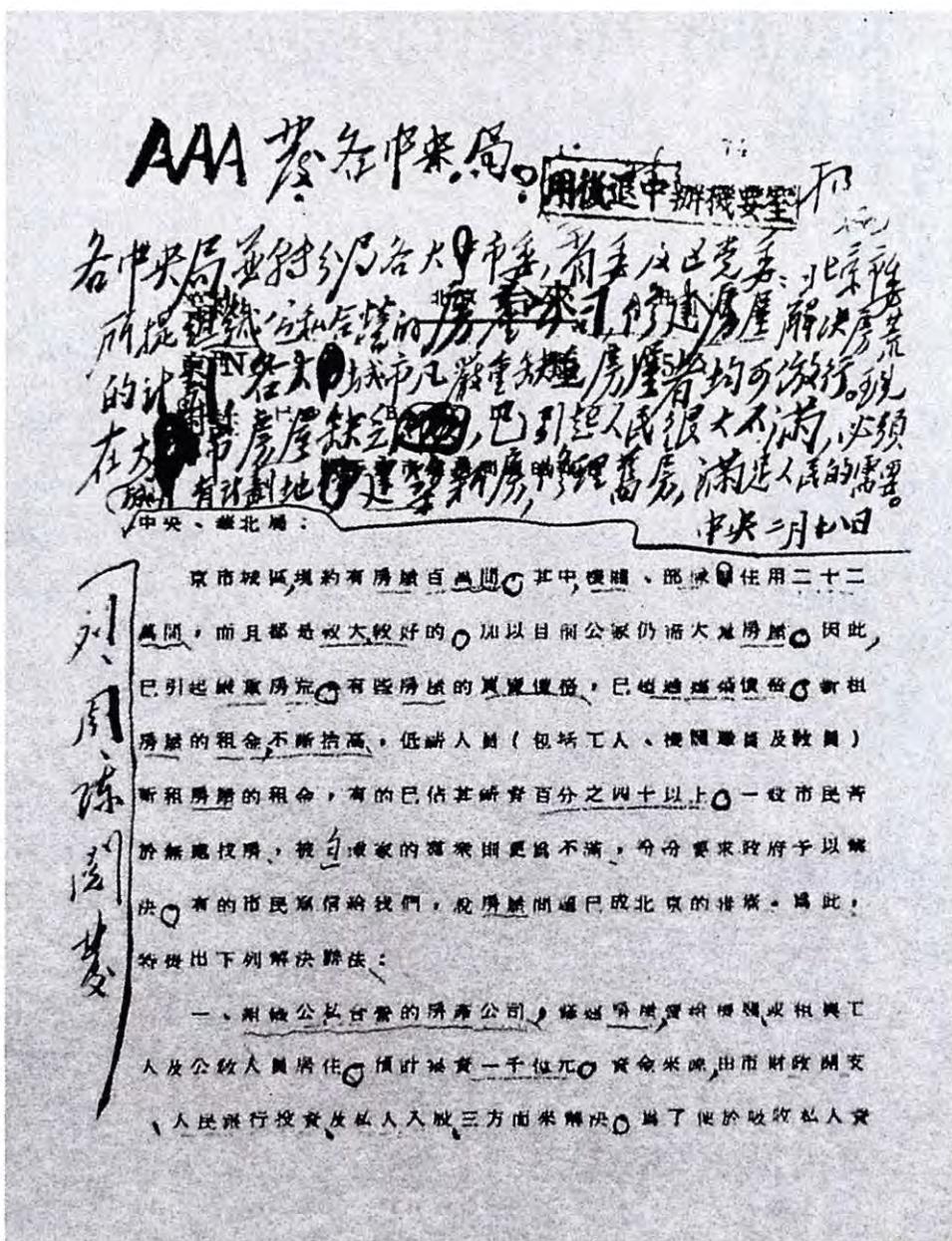
# 大城市必须有计划地修建居民住房

(1951年2月18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大市委、省委及区党委：

北京市委所提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各大城市凡严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中央  
二月十八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城市必须有计划地修建居民住房》的手稿。

# 中央转发察哈尔省关于取缔 一貫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21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

消灭一貫道，第一要有充分准备，同时动作，方能一网打尽；第二要布置展览会，向群众作宣传工作。这两点是和消灭国民党特务组织时所应采的办法大体相同。除山西消灭一貫道的经验<sup>[1]</sup>已通报你们外，现又有察哈尔一个成功的经验<sup>[2]</sup>，值得参考。

中央  
二月廿一日

---

[1] 指中共山西省委1951年1月9日关于取缔一貫道的情况给华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

[2]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2月20日给中央并各省委、京津两市委的电报中总结的察哈尔省取缔一貫道的经验。他们的主要做法是：1950年11月至1951年2月5日，全省各地对一貫道道首统一进行搜捕。在搜捕前后，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利用各种形式（报纸、电台、漫画、展览会、诉苦会、群众会、公审会等），揭穿一貫道的反革命罪行，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水平。目前各地正集中力量进行甄别审讯，追捕漏网道首，号召退道，控诉道头，进行揭发宣传，以扩大战果。

# 给符定一<sup>[1]</sup>的信

(1951年2月21日)

宇澄先生：

来示敬悉。退押事及房契一件已交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与先生商酌处理，请与统战部接洽，章先生信奉缴。

顺颂

日安

毛泽东

二月廿一日

---

[1] 符定一，字宇澄，文字学家。辛亥革命后，他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任校长时，毛泽东在该校读过书。

# 中央关于印发和组织学习 三个镇反文件的通知

(1951年2月22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并转分局，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及师以上人民解放军党委：

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二月二十一日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报纸上已发表了这个条例及彭真<sup>[1]</sup>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并写了《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长篇社论，以上三个文件，请你们迅即印成一本，广泛发行，并组织干部及民主人士普遍地进行学习，务使镇压反革命问题在全党及全国人民中获得正确的了解，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以达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的目的。

中央  
二月二十二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 在《新民报》北京社社会服务部 来信上的批语

(1951年2月23日)

富春<sup>[1]</sup>同志：

此事<sup>[2]</sup>请你处理一下，查明纺织工业部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态度，并请该部负责人给我写一报告。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三日

---

[1]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指《新民报》来信中反映的纺织工业部漠视北京市田建发明的浆纱剂，使其得不到推广应用一事。

# 转发罗瑞卿<sup>[1]</sup>考察广东、广西、江西 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25日)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同志，并转分局，各省委，  
大市委，区党委负责同志：

下面是罗瑞卿同志考察广东广西江西三省镇反工作的报告<sup>[2]</sup>，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指罗瑞卿1951年2月23日关于广东、广西、江西三省镇反工作给公安部转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四点值得注意的经验：（一）镇反牵涉到统一战线中的人物按以下原则处理：对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群众痛恨者，照顾群众要求，坚决镇压；同时对统一战线人物进行充分工作，说服有关民主人士，使他们心服。对罪恶不多或有若干功劳，群众也可以说通的，则说服群众照顾统一战线，免予判罪，有些则免其死罪，但仍须判刑。（二）对全区性、全县性的恶霸必须全部杀掉，全乡性的恶霸必须一部分或大部分杀掉，不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有些恶霸必须先杀掉，否则群众不敢起来。（三）对散匪采取群众、民兵、武装、工作队互相结合的剿匪办法，彻底加以肃清。对逃到外县外省的匪首恶霸，必须以追到天涯海角的精神予以处死，这样才既不贻患于未来，亦可彻底打消群众的顾虑。（四）从江西和其他地方经验看，我们还留给了反革命一些逃匿的空隙：一是从乡下逃向城市，二是从陆上逃到水上，三是逃向边沿地区，四是躲藏在我们机关、学校、工厂、矿山内部。一下子把所有这些空隙弥补起来是困难的，但自觉地采取适当的步骤，扫除反革命逃匿的死角则甚为必要。

其中所说经验，请加注意并采用之。各中央局及各省对自己所属地区的镇反工作，亦须派得力领导同志出去巡视，帮助当地同志总结经验，加强领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

#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

(1951年2月2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各大城市市委：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下面是北京的镇反计划，请你们研究仿办。其中说到拟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

中央

二月二十五日

# 转发川西军区清匪报告的批语<sup>[1]</sup>

(1951年2月25日)

华东、中南、西北、华北各大军区及中央局：

下面是川西军区的清匪报告，发给你们参考。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相结合进去，必须杀掉匪首、惯匪与恶霸，并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以上经验请加注意，凡你区尚有匪祸地区，请指导当地同志研究这些经验。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清匪报告写的批语。

# 军委关于撤回新疆入藏部队问题 致王震<sup>[1]</sup>电

(1951年2月25日)

王震，并告西北局，西北军区：

丑养电<sup>[2]</sup>悉。先遣部队既如此困难，请考虑于开山后将该部队撤回新疆，尔后新疆即解除入藏任务，你是否同意这样做，盼告。

军委  
二月廿五日

---

[1]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2] 指王震1951年2月22日给军委、西北局、西北军区并请转西南军区的电报。电报说，新疆独立骑兵师入藏先遣部队，已进驻藏北僧可日区之札麻忙保。该区海拔在4000米以上，天气变化无常，时冷时热，空气稀薄，人马呼吸均感困难，病员逐渐增多。据先遣部队报告，该部135人，已病亡6人，现病34人，马匹病亡更加严重。我们除给入藏先遣部队以慰勉外，告其检查治疗，并令军区卫生部研究预防治疗方法，候开山后补送药品。

#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 市政建设计划的批语

(1951年2月26日)

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

兹将北京市委市政建设计划<sup>[1]</sup>一件发给你们，请转发各大中城市市委作参考。

中央

二月二十六日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1年2月21日关于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代表会议在市政建设方面拟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给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代表的选举业已完毕，拟于26日开会。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拟解决下列问题：（一）城区、郊区和村两级人民政府，一律经过区人民代表会议或村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二）进一步改组全市工业，使之尽可能适合农民需要（同时照顾城市人民的需要）；进一步组织公私力量开展城乡贸易。（三）组织公私力量，为增建新房1.5万至2万间而斗争（政务院拟建之1万间除外），以减少本市房屋恐慌。（四）指导、帮助并强制所有30人以上之工厂、作坊，特别是大工厂，单独或联合设立卫生所或小型医院，以解决工人治病的问题。（五）增加业余学校的技术学习，并扩大业余学校。（六）由公安局系统地报告两年来反革命分子在本市进行破坏活动之具体情况，以提高群众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通过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决议。（七）关于下水道、道路等项市政建设，因限于经费，本年只能进行一些极必要的建设，并对已有的加以修整。

# 关于继续肃清福建一切股匪 致叶飞<sup>[1]</sup>等电

(1951年2月26日)

叶、成、刘、陈<sup>[2]</sup>，并告陈、饶<sup>[3]</sup>：

二月二十日一月份福建剿匪简报，已收到阅悉。剿匪成绩甚大，极慰。望继续不懈，坚持到底，于三月底以前肃清福建一切股匪。如那时尚有残匪未清，仍须以地方武装及民兵继续坚持清捕，直至完全消灭匪众为止。在清匪斗争中，对于一切为民众痛恨的匪首惯匪及恶霸，必须在人民同意下坚决迅速地处以死刑，是为至要。

毛泽东

二月二十六日

---

[1] 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

[2] 成，指成钧，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副司令员。刘，指刘培善，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副政治委员。陈，指陈铁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副参谋长。

[3]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 中央转发川东区党委镇反 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27日)

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

下面是川东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完全正确。其中所说给胆怯同志撑腰，派干员出去检查，强调策略，严格批准手续几点，都是很必要的。

中央  
二月二十七日

# 中央转发川西区党委 关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27日)

中南局，华南分局及广西省委，华东局及福建省委：

下面是川西区党委关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他们称为四大运动）的报告，很可以作参考。这样做，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掌握基层，给土改扫清道路。这样做了，土改就很容易完成了。

中央  
二月二十七日

# 中央关于向各界人士解释 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的电报

(1951年2月28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各省军区：

请注意利用中央政府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机会，结合当地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中央司法部长史良所写的《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sup>[1]</sup>一文，写得很好，她是司法部长，又是民主人士，各地应注意利用此文说服那些存有错误思想的社会人士及胆怯的人们。将史良此文和中央的条例，彭真的报告<sup>[2]</sup>及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二日社论印成一本，广为传播，并组织党内外学习。

中央

二月二十八日

---

[1] 载于195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2] 指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1951年2月20日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载于1951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 转发西南军区 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sup>[1]</sup>

(1951年2月28日)

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北军区，华北军区，东北军区，并告西南军区各负责同志及党委会：

下面是西南军区党委会二月十五日的报告，其中所述各项，值得十分注意。望你们自己及所属省军区，对于镇压反革命及管训旧军官两大问题，参考西南经验，作正确的处理。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军队中混入反革命分子问题，必须引起充分注意，并着手审查清理，以其结果上报。

毛泽东

二月二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 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28日)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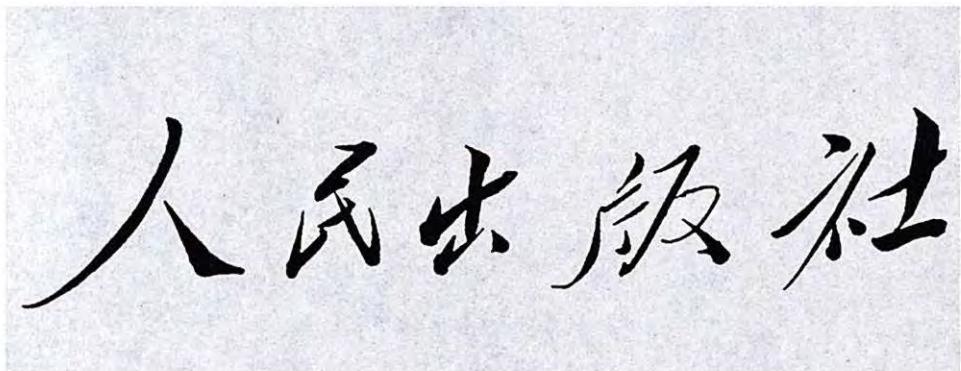
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中央  
二月廿八日

# 为人民出版社题名

(1951年2月)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为人民出版社题写的社名。

# 为《军学》题名<sup>[1]</sup>

(1951年2月)

军学

---

[1] 《军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刊。1951年2月，刘伯承决定在军事学院创办一个刊物，即《八一杂志》，并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不久，毛泽东在刘伯承的报告上批示：“中央军委准备出版一个刊物，已定名为《八一杂志》，你们的刊物就叫《军学》好了。”随即，毛泽东为《军学》杂志题写了刊名。

# 关于志愿军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sup>[1]</sup>

(1951年3月1日)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一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三个军（有两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四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六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

---

[1] 这是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的一部分。

中的四个军共十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六月中调用。上述十个军中的四个军，因打了五个月，必须补充休整，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接替前线任务后，即调至平壤、元山地区休补，兼顾海防。第一番志愿部队中其他两个军，则调回国内整补。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与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十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十二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再补充三十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三、根据一、二两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三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六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于四月上旬达到前线以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而以第二番志愿部队六个军及朝鲜人民军四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但必须估计，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 给胡乔木<sup>[1]</sup>的信

(1951年3月2日)

乔木同志：

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sup>[2]</sup>《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sup>[3]</sup>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

三月二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萧乾，当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

[3] 指政务院参事李俊龙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载于195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胡乔木

三月一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有萧乾在土地  
革中写了一文，写的很好，但未为广播  
各地转载。且曾为出单行本，或和李  
俊彦所写之文一并出一本。请即转  
寄此组稿过数周后，各块社局将有  
有一篇或数篇。

毛泽东

三月二日

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手稿。

# 关于修改《矛盾论》 给陈伯达、田家英<sup>[1]</sup>的信

(1951年3月8日)

伯达、家英同志：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象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毛泽东

三月八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们都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 转发罗瑞卿<sup>[1]</sup>关于浙江省 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9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及区党委：

(一) 兹将罗瑞卿同志关于浙江情况的报告<sup>[2]</sup>一份转给你们，其中所述浙江各项镇压反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登记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和采用。关于此项登记工作，凡未办及未办得好的，请你们做出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并向中央作报告。(二) 目前几个月，各地领导同志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向下面指导的重心，仍然是对那些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给以检查和督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指罗瑞卿1951年3月4日关于浙江镇反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浙江登记反动党团、特务的工作成绩颇大，其中若干经验值得注意。他们不仅在大中城市作了这种登记，而且在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亦做了这种登记工作，因而大大发挥了革命政治威力，暴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与政治积极性，保证了秋收、土改的顺利进行。反动党团登记必须充分地掌握材料，同时又要抓紧时机，坚决贯彻。登记工作必须坚持中央政策，不得随意扩大登记面，但又要按具体情况办事。登记工作又须分别内外，讲究策略，对不同的对象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在登记后的审查处理阶段，先将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匪首、惯匪及其他有证据的政治反革命分子，将一般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的处理工作放在后面。

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当然，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

毛泽东

三月九日

# 给杨尚昆<sup>[1]</sup>的信

(1951年3月9日、20日)

—

尚昆同志：

镇反工作的重要材料，请随时送给我。另件请传阅发出。

毛泽东

三月九日

—

尚昆同志：

凡各地镇反电报及综合报告，均请清出送我。此外，其他电报，你认为值得看的，也请清出送我。另报六份，请传阅办理。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上次我批发的关于西南财经机关清理反动分子的电报<sup>[1]</sup>，请抄发中央、军委各部门（包括各特种兵）首长及薄一波，叶季壮，滕代远，乔木，彭真<sup>[2]</sup>。

---

[1]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1951年3月8日关于财经交通部门清理反动分子的总结报告。

[2]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叶季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滕代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彭真，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 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压 反革命分子的指示<sup>[1]</sup>的批语

(1951年3月11日)

军委直属各军事领导机关及军事学院，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省军区党委：

请你们也照西南军区党委会一样，对于学习四个镇反文件及传达报告的问题，对于清匪问题（在有清匪任务的地方），对于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问题，此外还有在机关中部队中混入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及保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论过去已有检讨或尚未有检讨，均一律重新作一次检讨，并对自己直属机关部队及各兵团军师，发出必要的指示并定期完成任务。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你们的检讨及指示，应送军委一份。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

---

[1] 指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1951年3月6日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给各军、各军区等单位并报军委总政的电报。毛泽东在转发这个电报时除写了上

述批语外，还在电报中多处加了批注。电报和批注如下：

自去年接到中央镇压反革命指示之后，我军区部队在西南局统一领导下是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指示的，因此在剿匪与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在军队内部缺乏专门研究布置，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各级党委的普遍重视。（毛注：西南如此，各军区各省各军恐怕也有此种情形。）有的对反革命存在着“重案轻处”“重纪律犯轻政治犯”或“地方严部队宽”的倾向。对待旧机关旧职员的态度不够严肃，对其中有严重问题的分子注意不够。党内干部中轻敌麻痹遗失机密的现象不断发生。军区党委认为上述缺点必须立即纠正，这不仅关系到清匪发动群众和社会治安，而且是直接关系到部队内部政治上组织上纯洁与巩固的重大问题。（毛注：正是这样。）为此决定：

一、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之惩治反革命条例、彭真同志关于同一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2月22日社论、史良部长“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专论等4个文件，各区必须认真地组织干部学习，并结合实际进行一次检查。师及军分区以上党委应将检查结果分别向党内党外干部进行传达报告。凡对反革命丧失警惕，重案轻处，甚至和平共处的倾向，务必得到揭发批判与纠正。（毛注：必须如此。）

二、继续加强清匪与捕捉匪首运动，密切结合群众斗争，防止因剿匪胜利而麻痹松懈。对现有管押的积案应立即组织清理，遵照惩治反革命条例迅速判刑。今后凡属处理土匪案件，应统由军队结合地方执行，并每月向大军区报告一次。

三、加强对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工作。各部队与机关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毛注：很对，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对这些人员除继续进行团结争取改造外，对其中个别有破坏活动的分子也必须坚决逮捕法办。对伪装投降起义混入我军之一切反革命分子，应迅速加强审查侦破，弄清材料，分别处理。只有坚决地肃清与镇压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才能更好地团结教育多数。片面地强调教育改造，放松了对他们政治上的警惕是错误的。（毛注：很对，应当这样办。）

四、各地现有集训尚未处理的旧军官旧人员中的特务恶霸分子，应即作出计划，迅速分别处理，不得拖延。上述第三、四两项军区另有专门指示，望注意研究执行。

# 给戴毓本<sup>[1]</sup>的信

(1951年3月11日)

毓本同志：

临行一信，到兴城一信，均已收到。达到你所愿望的工作岗位，为你庆贺。已与习梅<sup>[2]</sup>兄见面，谈了许多乡情。他不久可进学校。

顺祝健进！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

[1] 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2] 习梅，即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

# 给胡乔木<sup>[1]</sup>的信

(1951年3月14日)

乔木同志：

三月十三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 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sup>[2]</sup>。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sup>[3]</sup>。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1951年3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题目改为《天津市天主教徒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

[3] 载于1951年3月15日《人民日报》。

# 关于校对《矛盾论》给田家英<sup>[1]</sup>的信

(1951年3月15日)

家英同志：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 中央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黃祖炎 被刺杀事件的通报

(1951年3月18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省军区各兵团各军：

据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黃祖炎同志于三月十三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

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中央  
三月十八日

# 转发黄敬<sup>[1]</sup>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

(1951年3月18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市委，省委，区党委：

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来。从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重庆两市动起来了，这是好现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

[1] 黄敬，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

# 转发福建省公安厅 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18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军区党委及公安机关：

福建公安厅的这个报告<sup>[1]</sup>写得很好，有分析，有内容，方针正确，态度坚定，值得各地同志研究仿行。我们希望各省市都能写出这样的报告。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

[1] 指福建省公安厅1951年3月1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给华东公安部并报中央公安部的报告。报告指出，福建省镇反工作去年11月以后有显著转变，但当时发展不平衡，大部分地区镇压得不狠，个别地区未动。主要是领导思想上一下转不过弯子，存在“怕乱”“怕纠偏”等顾虑。在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作了进一步动员，并采取一系列步骤后，各地镇反工作开展很迅速，收效很大。一般的步骤是：第一步先地委讨论，经党内外自上而下的充分动员，结合有重点的具体检查督促，达到明确思想，解决策略与材料来源等问题。第二步是结合土改等中心工作发动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开展群众性调查研究工作，结合公安部门既有材料，确定该捕对象，召开农代会核对补充材料，经一定组织审查批准，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党政军民力量，实行全区性的大逮捕。第三步是发动群众控诉，经人民法院或军法处依法判处，政府机关组织公审大会和群众大会公布处决。

# 转发西南公安部关于财经交通部门 清理反动分子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18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在留任人员中清理反动分子，湖北省一级已有一个经验，现在西南方面又有了一个更完全的经验。可见这不但是应当做的，而且是现在就可以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认真去解决。西南的经验是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的财政、经济、交通机关留用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九千余人中，逮捕了七十余人，管制了七十余人，管训了一百九十余人，清洗了八人，共计三百五十余人，占旧人员总数百分之三点九。此外，又登记了国民党及会道门分子五千七百余，占旧人员总数百分之六十四。这个经验很值得研究。请你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加以考虑，定出实施计划，取得经验，加以推广。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 组织民主人士 参观或参加土改、镇反工作

(1951年3月18日、30日)

—

漱石、子恢、小平、仲勋<sup>[1]</sup>同志：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sup>[2]</sup>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

[1]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2] 吴景超（1901—1968），安徽歙县人，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当时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二

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说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请你们计划一下，在今年夏、秋、冬三季的土改工作和镇反工作，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几十批组织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员、资本家下乡去参观，或参加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更要让他们参加，整个城市的人民都要讨论镇反工作，大家注意对付反革命。下面是川西区党委的报告，请你们看一看。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

# 给周世钊<sup>[1]</sup>的信

(1951年3月19日)

惇元兄：

三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您。一月二十九日的信及学生们的签名信也收到了。你的三项计划很好。进研究院很有意义，可以安心读几个月书。读完去东北华东考察一次也极好。第三项计划可能有些困难，如在两三年后实施也有可能办到。

我在乡下住，没有病，专为休养，暂不进城。容后面叙。

祝安好！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 转发中南局关于 城市镇反指示的批语

(1951年3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市委及五万人以上的中等市委：

城市镇反工作极为重要。最近华北东北两区各大中城市均已动作起来了，反映极好。重庆亦已实行第一次大逮捕，反映如何，待报。中南局已于三月十六日发出城市镇反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参考。应在一切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包括县城及大市镇）布置镇反展览会，此种展览会作用极大。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 转发薄一波、刘澜涛<sup>[1]</sup> 三月份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并告志愿军党委：

下面是华北局三月十日给中央的报告<sup>[2]</sup>，所述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及研究城市工作等项经验均值得注意。其中关于镇压反革命及抗美援朝两项经验比较完整，各地均可仿行。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

[2] 指薄一波、刘澜涛1951年3月10日给毛泽东的3月份综合报告。报告总结的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是：1. 必须开好干部会议，把镇压反革命的策略和步骤交代清楚，不能一声喊杀就干起来。2. 必须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杀，并且在杀的过程中继续发动群众，用一切可能的和有效的办法暴露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激发群众义愤。3. 一定要让各阶层代表人物、民主人士参与其事。报告总结的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是：1. 各级党委不仅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抗美援朝的政治内容，而且专门作了关于开展抗美援朝的决定，召开专门会议训练了干部和积极分子。2. 要有固定的组织。3. 要有具体计划。4. 必须结合当前的中心工作。5. 宣传方式要多样灵活，不要老一套。

# 对邓小平<sup>[1]</sup>关于清查处理西南军政机关 不纯问题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1951年3月20日)

—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省军区，兵团及军，并告志愿军党委，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

兹将邓小平同志三月十三日的报告<sup>[2]</sup>转给你们，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加以研究。这个报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军政机关成份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央直属各军政机关，各大区军政机关，各省市军政机关，均是如此，不过略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必须立即开始研究清查和处理的办法，并有计划地布置清查处理工作。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财经机关九千余人中清理反动分子的经验，早几天我已通报你们了，请你们根据此项经验，着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属的军事机关，财经机关，政法机关，和文教机关，先作重点布置，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2] 邓小平1951年3月13日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西南军政机关成分复杂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云南党组织不纯问题。

取得经验，再行推广，尽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邓小平同志报告中所提的第二个问题，凡新区的党都应注意，不可忽视。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二

小平同志：

三月十三日报告收到，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已转发全党仿行。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人民群众 拥护镇反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直至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坚决地正确地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们应将镇反经验及群众欢迎镇反的反映随时通报各地，使此项经验及反映迅速传播，以利仿行，并使胆怯的同志振奋起来。下面是北京人民欢迎镇反的反映，可以看看。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 中央转发山东分局就黄祖炎被刺杀 对所属市、地委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3月20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省军区，兵团及军，并告志愿军党委及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

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sup>[1]</sup>，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三月十八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sup>[2]</sup>一道加以讨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

中央

三月二十日

---

[1]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951年3月14日的指示指出：黄祖炎同志被刺牺牲，说明了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具体之际，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同样也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山东分局在指示中提出了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工作等七点意见。

[2] 指中共中央1951年3月18日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

# 给胡乔木<sup>[1]</sup>的信

(1951年3月20日)

乔木同志：

(一) 宣传会议<sup>[2]</sup>可自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开十天，如十五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 理论教育决定<sup>[3]</sup>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 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会议作了报告和结论。会议于1951年5月7日开幕，23日闭幕，历时17天。

[3] 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1951年3月20日将这个决定草案下发各地。决定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决定要求全党按照党员理解能力的发展程度，将学习分为三级：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第三级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决定还对学习时间、考试制度、理论教员、学习顾问以及地委书记以上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章<sup>[1]</sup>，待看后送你，四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

[1] 指拟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前在《人民日报》《学习》等报刊上提前发表的毛选中的一些文章。实际上，这些文章从1951年7月1日开始在《人民日报》和《学习》杂志上发表，七八月间先后发表的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8篇。

#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关于军队干部 参加地方领导工作的意见的批语

(1951年3月22日)

华南分局，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

(一) 华南分局三月十五日电报<sup>[1]</sup>中所述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中南军区对在粤各军发出指示，在指示中应指出军队干部必须和本地干部发生正确的关系，好好地帮助他们而不要看不起他们，这点极为重要。分局应召集有军队和地方两方干部在一起的会议，明确地指示任务和双方发生正确关系的重要性。(二) 广东这种办法，请其他中央局考虑，是否在某些干部弱工作难于开展的地方，有采用广东办法的必要。

中央  
三月廿二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1年3月15日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领导工作的意见给中央并中南局、中南军区的电报。电报说，为加强地方工作的领导，在不变更现行区域及不太多牵动干部的情况下，决定成立粤东、粤西两区党委和三级军区。军队经营地方的实施方法，采取军队就地兼任与军队调出干部参加地方工作两种。各野战军除就地参加兼任地方工作外，另决定每军调出干部500名至700名专任地方工作。

#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反中 如何对待民主党派成员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3月2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委：

镇反问题中各民主党派有组织关系的登记，审查，逮捕，审讯等事，华东局于三月九日有一个文件<sup>[1]</sup>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各省市均可照办。

中央  
三月二十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年3月9日关于镇反中如何对待民主党派成员给山东分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示指出：上海在反动党团特务的登记中，公安局曾动员各友党成员登记，甚至并无充分证据，即行逮捕友党分子。此事现已制止。华东其他各地亦有类似事件发生，应从速纠正。根据中央公安部指示，凡加入各民主党派者，一般不要登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波动。至于民主党派中的暗藏反革命分子，用侦察解决而不用登记解决，各地须切实遵照执行。各友党成员的历史问题，应由各友党作为审干问题解决，自行处理。各友党中现行犯可以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对其他有证据的特务分子及反革命分子，应由公安部门与统战部商定后，方可逮捕。对现行犯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审讯，应尽量争取其所属党派人士参加。

# 中央转发罗瑞卿<sup>[1]</sup>关于几个大中城市 镇反工作考察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2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所属公安部门：

兹将罗瑞卿同志三月二十日关于镇反问题的考察报告<sup>[2]</sup>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即当作中央的意见予以执行，并据以检查镇反工作。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指罗瑞卿1951年3月20日关于几个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根据考察了解到的情况，提出了城市镇反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有些同志对城市反革命估计不足，认为城市与乡村不同，乡村有大量的土匪、恶霸，城市只有特务。第二，对城市镇压反革命可能引起的震动估计过高，加重了自己的顾虑，决心反复动摇，硬是杀不下去。第三，过于相信自己的一点侦察工作基础，忽视了广大群众反奸的伟大力量，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小手小脚，跳不出狭隘的圈子。第四，特情关系太滥，又缺乏严格的控制和监督。第五，大中城市的公安干部量小质弱，管理城市的经验深嫌不足，已有的经验也未很好总结，领导上一般的也应加强，否则应付复杂而尖锐的斗争确实是有困难的。为此，公安部门应更加主动地取得党委的领导，密切向党委请示报告；城市党委则要更加关心公安工作，要设法补充干部，并给以具体指示和帮助解决具体困难。

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的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

中央  
三月廿三日

# 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沧县地委 镇反工作经验的通报的批语

(1951年3月23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志司，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省军区及地委同志们：

这是沧县地委的镇反经验<sup>[1]</sup>，请你们发给所有中央局委员，大军区委员，分局委员，省委区党委委员，省军区委员，大中市委委员，大中市委所属区委书记，每人一份，并请每人看一遍，至要至盼。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三日

---

[1] 中共河北省委1951年3月14日通报中介绍的沧县地委镇反工作的主要经验是：一、广泛深入教育干部和党员，明确敌我界限，在党内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斗争，统一思想。二、召开县的人民代表会议，贯彻镇压反革命的精神，通过代表将镇压反革命的精神贯彻到群众中去。三、广泛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工作。

# 关于同意上海市委镇反计划 致饶漱石<sup>[1]</sup>电

(1951年3月24日)

饶漱石同志转上海市委：

同意三月十五日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这次计划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首先要取得党内思想的一致，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沧县地委的经验。其次要取得各界人民的拥护，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北京市委的经验。他们是先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一个一般拥护中央镇压反革命条例的决议，然后进行大逮捕。如果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久要举行，也可以这样做，否则可以先逮捕。北京市取得各界代表人物拥护的方法主要是一次一百多人的小型会议，又一次五千人的大会。前者除说明情况外，还陈列典型的证据和案情给他们看，结果引起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坚决镇反。后者已于三月廿四日召开，主要由苦主登台控诉，以期争取五千个代表人物的拥护，会后即大杀一批。由北京的经验看来，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是可以取得他们拥护的，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

---

[2]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

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将一二两项同时做，例如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清理工作已经在做，并且有成绩。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 转发河北省公安厅关于天津专区 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2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

此件<sup>[1]</sup>请一直转至地委，希望各地捉反革命都照天津专区（天津市不在内）的办法办理，以防滥捕。

毛泽东

三月二十五日

---

[1] 指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1951年3月10日关于天津专区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给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报告。报告说，天津专区于3月3日晚动员了区以上干部，各种武装，连村干部共万人以上的力量，以闪击之势，捕获敌伪党特军政及惯匪恶霸道首等重大反革命分子，做到了对象准确，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行动迅速，一网打尽，并无一错抓。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反动分子惊恐胆寒。他们的经验是：1. 充分准备，周密组织，分工负责。2. 凭票捕人，拘票注明姓名、年龄、特征、住址及犯罪性质，这不仅坚持了法定手续，而且抓得准确，避免了错抓乱抓。3. 逮捕前宣布纪律，高度增强了干部的责任心，使完成这次艰巨任务未发生混乱，做到秩序井然。

# 给李达的信

(1951年3月27日)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sup>[1]</sup>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sup>[2]</sup>，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

[1] 指《新建设》杂志，《〈实践论〉解说》第一部分，发表在1951年出版的该刊第三卷第六期。

[2] 毛泽东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稿第二部分的主要修改有下列几点：一、在《解说》中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中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解说》中说：“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召开市协商委员会 扩大会议讨论镇反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2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北京的办法<sup>[1]</sup>很好，请你们均照这样做。你们如何做的，请写报告来。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1年3月20日给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谈到的召开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的做法。报告说，采取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小型代表会议讨论镇反，是为了便于集中讨论，使各界人民代表了解真实情况与得到充分发言的机会，并激起他们对反革命的仇恨。会议的报告要着重列举反革命罪犯的罪行，把典型案卷和典型罪犯的事实集中起来报告，这样虽然道理讲得少，却具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会上将反革命罪犯的罪证加以陈列展览，效果也很好。

# 给胡乔木<sup>[1]</sup>的信

(1951年3月29日)

乔木同志：

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载吴景超<sup>[2]</sup>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又：三月廿八日人民日报左下角一条新闻《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讨论镇压反革命的录音》，亦请用文字广播。惟其中有几句是讲三月廿八日要求听众做什么的，广播稿应改写一下，写成一条北京的新闻。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吴景超，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國人民革命軍委員會

毛澤東

三月十六日光的電報，我深蒙歡迎。你  
和彭真作的不得，要及時的，誰會不會的  
都報事以待其報，並要到軍委會去報告他。  
子：請你有空的回報，右下角一條到軍委會  
月底以前，亮台對談，應和反革命的領導者  
之譖言，據用筆，將其大意向是溝通，真  
的要本末而做有名無實，獨行私政等事，  
寫成一條，北京的時間。

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手稿。

# 转发黄克诚<sup>[1]</sup> 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1951年3月30日)

黄克诚同志，并告子恢，漱石，小平，剑英，仲勋，一波，高岗<sup>[2]</sup>同志：

我认为黄克诚同志三月二十三日的意见<sup>[3]</sup>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

---

[1] 黄克诚，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指黄克诚1951年3月23日在给邓子恢并报毛泽东的电报中关于湖南镇反问题提出的意见。电报说，湖南全省执行中央10月镇反指示以来，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大多数人民是拥护的。这个坚决行动，打落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斗志，清醒了干部头脑，收获极大。但目前已个别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下面干部劲头很大，如果继续坚决而猛烈地镇压下去，杀人将很大地超过中央规定的限度。今后，主要将是对付暗藏的反革命，且现已开始牵涉内部，与隐藏的反革命斗争更需要精细，采取目前猛烈的办法，一定会发生混乱。因此，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大杀，转入经常工作，杀捕范围加以限制，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

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凡各地有如黄克诚所说“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畏缩不前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请你们严密注意这两种情况，好好掌握，不要出乱子。如你们认为有必要，请将此电转发各省市。

毛泽东

三月卅日

# 转发山东分局 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30日)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 转发中南局关于 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3月30日)

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及地方军区，并告中央各直属部门：

对镇反工作宣传不足是普遍的现象。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报纸揭露太少。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北京天津两市最近两星期来大有进步，对镇反大张旗鼓，广泛宣传，普遍揭露，利用几十人，百余人，几百人，几千人乃至万余人的会议，利用报纸和广播电台，利用展览会，大肆宣传，使家喻户晓，使全体人民及各界民主人士均参加镇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义，小手小脚，畏首畏尾的作风，收效非常之大。中南局现亦发了指示，扩大镇反宣传，可为各地参考。

毛泽东

三月卅日

# 转发空军党委 关于镇反工作的检讨和决定的批语

(1951年3月30日)

各大军区党委，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并告中央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党委：

关于镇反问题，除已经作了必要的检讨和决定者外，凡未做者或做了尚不充分者均请你们照空军党委的办法做出同样的检讨和决定。此项文件中央各直属部门直送中央，各省军区经各大军区转送中央，务于四五两个月内普遍检查一次。不做此项检讨和决定者，应受到批评，并追究责任。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

# 关于组织民主人士 参观土改、镇反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1年3月30日)

刘、周、陈、罗迈<sup>[1]</sup>同志：

今年还有九个月，应从北京天津两市组织四五批至七八批参观团或参观组，到南方各省（主要是华东、中南，如有飞机也应去西南）去参观土改和镇反工作。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一级人员凡愿去的都让他们〔去〕。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

---

[1]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 对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

(1951年3月30日)

看过，同意。

毛泽东  
三月卅日

第十七页上删去两句<sup>⑩</sup>，因为不能或不愿加入那些人民团体的人们，例如资产阶级，富农，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并不都是不良分子或落后分子。

代表们讨论中或者有些好意见，可据以修改或充实这个报告。

---

[1] 刘少奇报告稿第三部分“关于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中原来的一段话是：“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团体，例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会、农民协会、合作社、妇女联合会、文化工作者的团体等，都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也是党向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场所。凡有这些团体组织的地方，那里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或其他劳动人民入党，必须是这些团体的团员或会员，不能或不愿加入这些团体的人，也就是说，人民中的不良分子或落后分子，一般的不应该接收他们入党。”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也就是说，人民中的不良分子或落后分子”。

又：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

# 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人物开会 通报镇反情况的电报

(1951年3月30日)

东北局：

三月十九日电悉。你们开座谈会讨论镇反工作的经验很好。在各城市及新区进行有计划的大批逮捕反革命之前及逮捕以后，要召集更多的各界代表人物开会，北京曾召集一次五千五百人的会，天津曾召集一次一万多人的会，均是各界代表人物，不是普通群众。在下面则应召集代表人物的和普通群众的两种会，使家喻户晓。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

# 关于播发许建国<sup>[1]</sup>等 在天津镇反大会上发言的电话稿

(1951年3月31日)

用电话告乔木<sup>[2]</sup>:

将三月三十日天津报纸所载镇压反革命大会上许建国的报告全文，黄敬<sup>[3]</sup>结论全文及王淑云<sup>[4]</sup>的控诉词（采用进步日报的稿子）加以广播，并将天津这次开会情〔况〕写一条新闻广播。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

[1] 许建国，当时任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公安局局长。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3] 黄敬，当时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

[4] 王淑云，被恶霸迫害致死的搬运工人王士英、王士宏的妹妹。

# 关于彭友胜工作安排问题的信

(1951年3月31日)

## 一

友胜先生：

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以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二

星龄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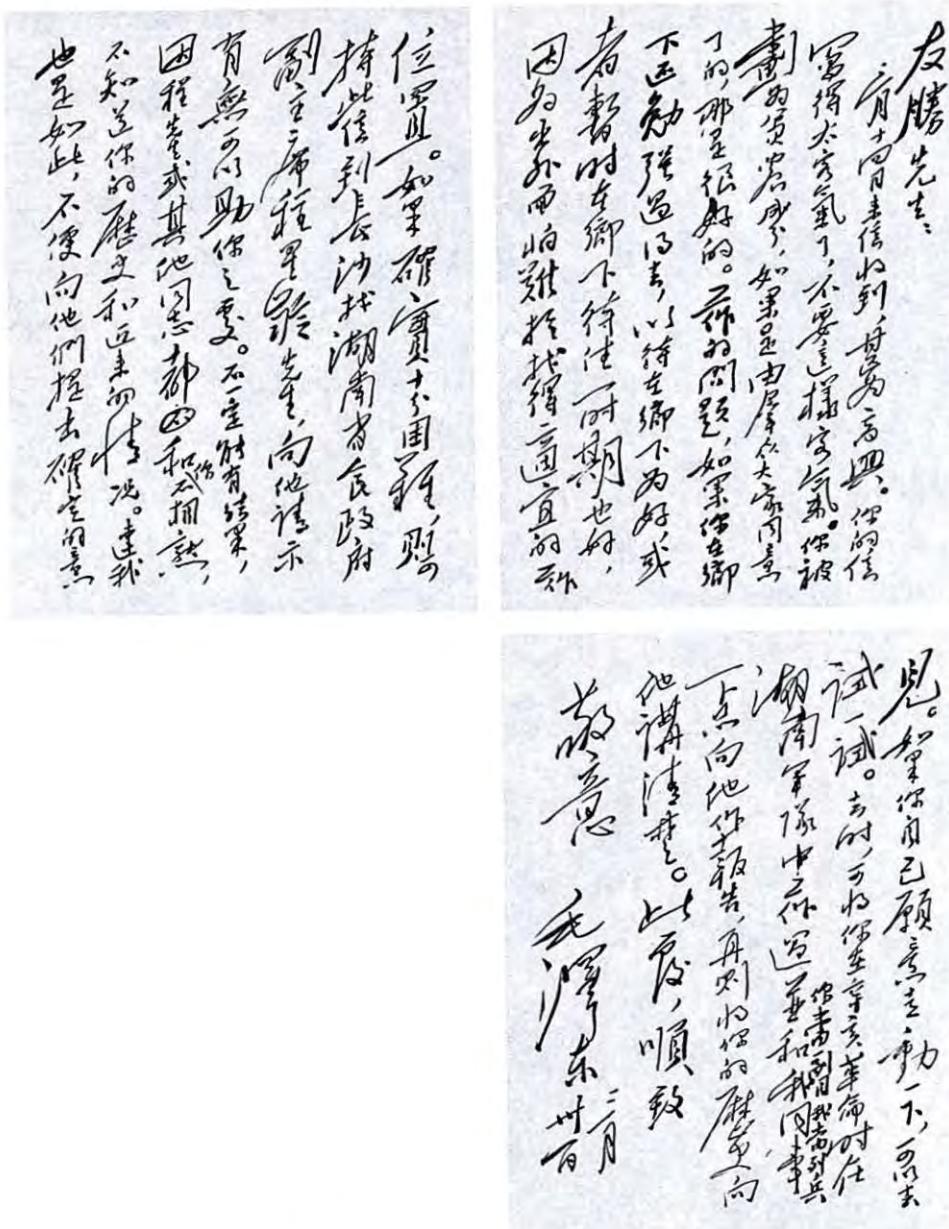
此人叫彭友胜<sup>[1]</sup>，据我过去的印象是个老实人，四十年的历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军队充副目（即副班长），我在他那一班充列兵，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现来信叫苦，我已复信叫他待在乡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难，又出于自愿，不怕无结果，则可持我的复信到长沙找你，向你请示：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我在复信上已说明，不一定有结果，因为程先生他们不清楚彭的历史，连我也不清楚，不便提出确定的意见。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项办法。请酌定。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

[1] 彭友胜，湖南衡东人，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



#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的指示

(1951年3月)

一、旧技术人员是国民党的遗产，是很有本领，但还不能依靠，应争取团结。

二、全国大中学生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儿女，也是国民党的遗产，但经培养改造，其中有一部分能依靠，也有一部分不能依靠。

三、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培养技术干部的骨干，最重要的是培养我们党、军队中十多年的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是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可抽调大部分去训练。另一部分从工农速成中学、从工农子弟中培养一部分，即是说要这两类人经过培养后，团结上边这两种人。

# 关于继续努力消灭残匪致叶飞等电<sup>[1]</sup>

(1951年4月1日)

叶、成、刘、陈，并告陈、饶，邓、谭<sup>[2]</sup>及鼎丞，剑英<sup>[3]</sup>同志：

三月二十五日的报告收到。你们在一、二两月消灭股匪万余，成绩甚大，极为欣慰。尚望继续努力，消灭一切残匪。只要消灭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在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改，厦门平潭的防御工事又做好了，福建的形势就改变了，台匪如敢进攻，你们就有完全的胜利把握了。广东现已集中了六个军，全省也在做这些工作。你们两省互相配合，力量是很雄厚的。

毛泽东  
四月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副司令员成钧、副政治委员刘培善、副参谋长陈铁君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3] 鼎丞，即张鼎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政治委员。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给田家英<sup>[1]</sup>的信

(1951年4月1日)

家英同志：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

毛泽东

四月一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 转发饶漱石<sup>[1]</sup>关于镇反中 清理外中内三层等问题的报告<sup>[2]</sup>的批语

(1951年4月2日)

漱石同志，并告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德怀<sup>[3]</sup>同志：

同意漱石同志三月廿九日报告的各项意见。关于镇压反革命，目前重点仍在“外层”，但对“中层”“内层”的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必须及时加以清理，对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必须及时进行处理，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华东局并规定了几项清理和处理的步骤和办法，都很正确和必要，请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加以注意。志愿军虽然处在作战的环境，亦须加以注意，保证各级首脑机关及各要害部门的安全和纯洁。

毛泽东

四月二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 指饶漱石1951年3月29日关于目前华东几项主要工作进展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除汇报华东地区的抗美援朝、土改、春耕等项工作外，着重就镇压反革命中有关清理外中内三层问题提出了意见。报告提出，由于

主观力量不足，并为了收集更多的材料，华东地区目前镇反工作仍须集中力量首先做好外层，然后转向中内层。但目前对中层及内层的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必须及时加以清理，对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必须及时进行处理，否则危险极大。对一切家属被斗被杀之党员干部及政府工作人员，如其本人在政治上未经过考验及仍与恶霸家庭继续保持联系，则应一律调离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并须进行审查。对政权机关中现已自动坦白登记的反动党团特务普通分子，可暂留职考查，以便收集更多材料，为进行全面整风审干作准备，但必须立即调离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对区分部以上的反动党团特务骨干分子，虽属自动坦白、登记，亦应有计划地采取留职调训的办法，进行一面学习一面审查。对一切隐蔽在我党政军内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不管其为主要或胁从分子），一经发现并获有确实证据，即应一律坚决镇压。

[3]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转发中南局传达讨论 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2日)

子恢<sup>[1]</sup>同志，并告漱石，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剑英<sup>[2]</sup>同志：

子恢同志三月二十二日的报告收到了，同意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方针和计划。将土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sup>[3]</sup>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跃。土改后，农村的任务规定为生产教育民主三项，也是对的，即除生产教育两项任务之外，还有一项建立民主生活的任务。在中南这样的地区，各省召集一次苏区代表会议是必要的，但请注意在报纸上公布消息时采用老红色区域的名称，不要用“苏区”这个名

---

[1]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3]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1年3月22日的报告中提出，土改必须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退押减租，打掉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

称。在工厂企业内，凡未进行过控诉旧制度和克服官僚主义这两项工作的，均普遍进行一次，很有必要。在镇反问题上，报告内指出要强调加紧宣传、防止不准两点是很对的。防止不准的办法是，拘捕前由地委市委一级精细地审查名单，然后按名单进行拘捕。这即是说，将过去规定的县有捕人权，收回至地委一级来。报告内说“河南各县实行县开名单，交农代会讨论，专署批准，办法很好，应推广执行”，应当就是将县一级的捕人权收回至地委一级。天津专署的办法也是如此，这个办法是最稳当的。关于党政军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的清理，应当在现在就定出计划，着手进行。西南的经验<sup>[1]</sup>已通报你们了。最近饶漱石同志的报告<sup>[2]</sup>规定了具体的步骤和办法，已发通报，请仿照去做。

毛泽东

四月二日

---

[1]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1951年3月8日关于在财经、交通等部门清理反动分子问题给各公安厅并报中央公安部的总结报告。

[2] 指饶漱石1951年3月29日关于镇反中清理外中内三层等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 进行镇反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2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地委：

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方法，请各地一致仿效。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毛泽东  
四月二日

# 给李介侯的信

(1951年4月2日)

介侯兄：

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sup>[1]</sup>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sup>[2]</sup>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

毛泽东

四月二日

---

[1] 徐冰（1903—1972），河北南宫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2] 这里有误，应该是李介侯妹妹的女儿（宋明）。李介侯在1951年3月28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现在中国进口公司机械科负责，我家眷已来到北京。北京方面的生生活完满地解决了，一切都是由于你的帮助。可是，我父亲（即李漱清）把被人遗弃的我妹妹的女儿宋明，也交我家眷带到北京。我父亲来信请求你替她找一个免费的中学读书。拟请设法进入产科、护士等免费学校或半工半读的学校读书。

# 给张澜的信<sup>[1]</sup>

(1951年4月3日)

表方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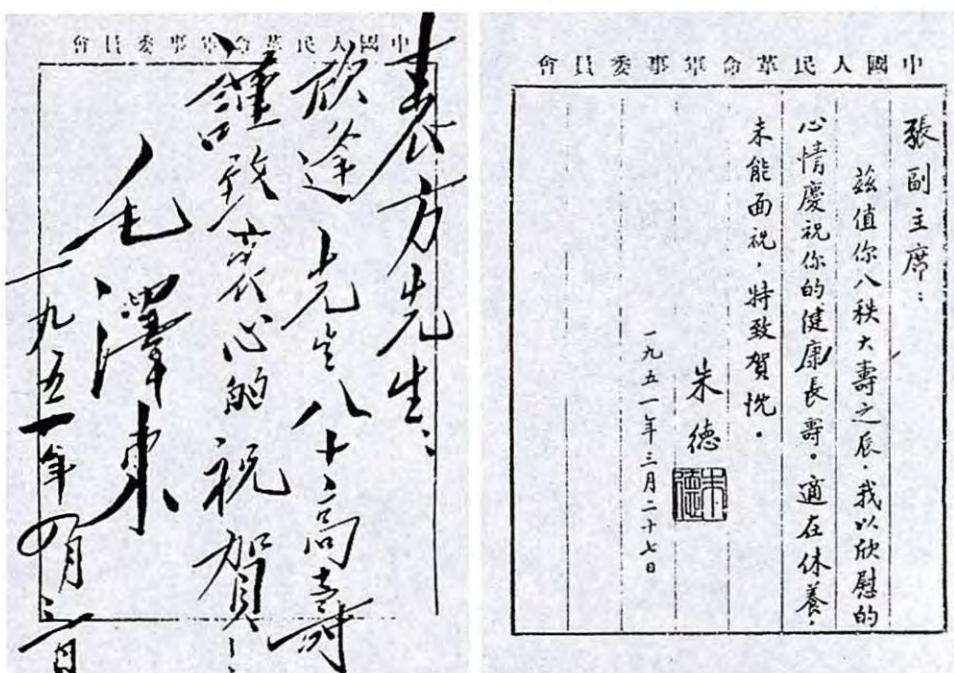
欣逢先生八十高寿，谨致衷心的祝贺！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

---

[1] 1951年4月3日，是张澜80岁生日，毛泽东为他专函祝贺寿辰，并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亲临张澜住宅致以祝贺之忱，还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为张澜祝寿，到会数百人。



毛泽东、朱德致张澜信的手稿。

# 给张云逸的信

(1951年4月3日)

云逸同志：

三月十四日的信收到了。病况甚为系念，宜注意充分休养，可作半年休养计划，以便安心调治，不为工作所牵挂，待病好再恢复工作。此复，即祝健康！

毛泽东

四月三日

# 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派遣工作组 检查和帮助镇反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4月3日)

陈、饶、邓、贺、习、张<sup>[1]</sup>:

请你们检查所属各省各分区有无广东那样的情况<sup>[2]</sup>，如有这种情况，请你们仿照广东办法，由各省军区派遣工作组分赴各分区各县加以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坚决而正确地执行镇反任务。地方镇反工作亦须由省级机关派遣工作组，分赴各专区和各县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此事甚为重要，请加注意为盼。

毛泽东

四月三日

---

[1]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2] 指中共广东军区委员会派赴珠江、北江等地的工作组在工作中发现的上述地区某些县在镇压反革命中存在的严重右倾现象。如英德县关押53名罪大恶极者未加处理，其中有一匪首张玉周曾杀害我同志及革命群众，拘押年余，仍未处理，群众提出控诉也被置之不理，后经人民代表在县人代会上提出控诉始批准处决，但仍未执行。

#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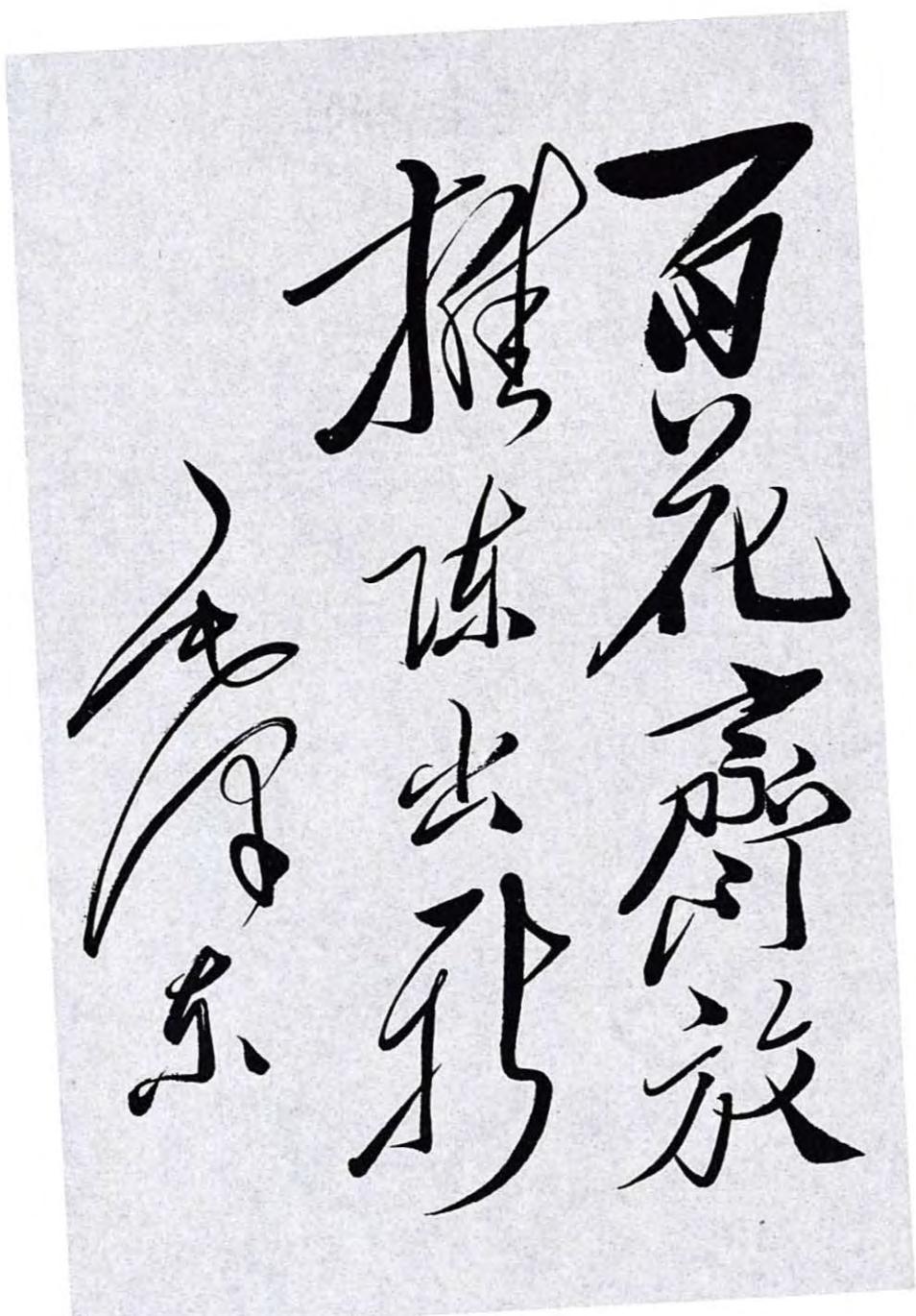
(1951年)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毛泽东

---

[1] 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其写了这个题词。



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

# 给毛宇居的信

(1951年4月5日)

宇居兄：

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sup>[1]</sup>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

复颂

兴居佳胜！

毛泽东

四月五日

乡友便祈致候

---

[1] 指毛宇居撰写的《毛主席轶事》。文中记述了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热爱劳动、关心农民疾苦和勤奋学习等一些情况。

# 转发福建省公安厅 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7日)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兹将福建公安厅关于福建镇反工作的报告转给你们参考。福建有些地方情况特殊，反动派多，处决的比例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别地自不应援例也杀这样多，但有些情况相似者，亦可仿照办理。福建方面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是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关于工作组，我认为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请你们研究推行为盼。

毛泽东  
四月七日

# 中央转发山东分局 关于城市镇反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城市镇反工作，山东有一个很好的经验<sup>[1]</sup>，华东局已给批准并转发华东各地参考。请你们也参考此项经验，正确地展开城市的镇反工作。

中央  
四月七日

---

[1] 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公安厅1951年4月3日关于全省统一行动逮捕反革命的经验报告。他们的做法是：（一）召开全省公安、司法、检察会议，统一部署，订出行动计划。（二）对材料的搜集与审查，事先均经城乡交流，互相查对，保证不错捕一人。（三）进行思想与舆论的动员。（四）以市公安局为主，结合驻军，组织行动指挥部，并对所有人员进行政策、业务、保密等的教育训练，制定行动守则，颁布纪律。（五）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城乡联络委员会，参与对某些人犯材料证据的审查。（六）为保证此次行动不发生内部意外事件，在行动前，将警察中的坏分子先行清洗和关押一批，将潜伏在工厂企业内部的罪证确凿、有现实危害可能的反革命分子先抓了一批。

# 为翻译《斯大林全集》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51年4月7日)

菲里波夫同志：

中共中央热烈地希望得到你的允许在北京将《斯大林全集》翻译为中文。我们认为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人民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

为了迅速地和正确无误地进行这个工作，我们准备采取下列步骤：（一）组织一个专门的翻译和校订的委员会担任这一工作。（二）与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部密切合作，包括采取分工翻译互相校订的方法。（三）请联共中央指定在北京的适当的苏联同志帮助我们的工作。

如荷允许我们的要求，请即指定一位同志与我们联系，以解决各项技术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

# 给田家英<sup>[1]</sup>的信

(1951年4月7日)

家英同志：

- (一) 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
- (二) 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
- (三) 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毛泽东  
四月七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 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

(1951年4月9日)

德怀<sup>[1]</sup>同志：

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我方企图撮要见告。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在新的战役中除以一部位于元山、咸兴防敌登陆外，主力（应补充新兵）似宜位于战场附近，担负歼灭敌可能降落的伞兵，协助各兵团作战，待战役完结该兵团始进入正式休整。这样是否妥当。又朝鲜人民军已补充否。

毛泽东

四月九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给李维汉<sup>[1]</sup>的信

(1951年4月9日)

罗迈同志：

此人<sup>[2]</sup>当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在国民党时代似乎没有做过坏事，他有许多子女在人民政府工作。本人现六十九岁，来京住湘潭会馆，生活困难，要求照顾。请你派人找他谈一下，给以生活上的照顾。

毛泽东

四月九日

---

[1] 李维汉，又名罗迈，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罗正纬，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创办人之一。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在该校读过书。

# 转发天津市委关于企业系统 查出内奸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10日)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荣臻，伯承，陈毅，贺龙，宗逊，谭政<sup>①</sup>诸同志，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及省级军区各负责同志：

---

[1]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宗逊，即张宗逊，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据天津市委报告，在企业系统查出十三名混入党内的奸细，其中满玉华窃取了工会副主任职务，杨友亭窃取了天津市各界代表会的代表，市府救灾委员会委员，纺织工会执行委员，中纺三厂工会主任等要职等情。请你们密切地注意这个内奸问题，从天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毛泽东  
四月十日

# 关于镇反工作中两个突出经验的通报

(1951年4月1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城市〔市委〕，区党委：

据中央公安部三月廿二日报告称：最近一时期的镇反工作有两个突出的经验：第一，有计划有准备地大规模地在同一时间内搜捕大批反革命分子，从北京、天津、河北、平原、察哈尔的实际行动，证明这是一种搜捕社会反革命的有效的不可少的步骤。这种方式给敌人打击最大，给群众教育极深刻，社会波动亦不大。只要掌握准备充分、对象准确、组织严密、指挥统一、行动迅速、严明纪律、及时宣传等项原则，就可以保证不会抓错，而取得群众拥护与社会同情。第二，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城市的经验证明，召开城市中市级和区级的各界代表会和协商委员会扩大会，并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宗教界，工商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参加，以揭露反革命罪恶，宣传镇反政策，消除民主人士的思想疑虑，动员各阶层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法，是成功的。综合这几个地方的经验：一、是负责首长亲自主持，公安机关作镇反情况报告，有准备地分类作案件介绍，只介绍重大案件和首恶人犯，不是报告所有犯。用活人、活事讲解政策，激发对反革命的仇恨，取得各界人士的拥护。二、是会上展览反革命罪证、图片、案卷、供词和真凭实据，打消各种疑虑。三、会前要充分准备，会中要坚持原则。既定

处决的案犯，坚持不能变动。四、要上下结合，动员群众的力量，说服民主人士。五、要分别对待，对诚心拥护但有疑虑者要耐心解释，提高其认识；对别有用心者要用事实铁证使他无话可说。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应当推广等语。这两点总结很好，请你们注意照办。

毛泽东  
四月十日

# 转发济南市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1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下面是济南市委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sup>[1]</sup>，很好，请各大中市委注意研究，照此办理。我希望各大中市委均有一个报告给中央。现已收到北京、天津、青岛、济南、重庆、兰州等六处的报告和上海、南京、杭州三处的计划，均很好。请各未报告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例如各省省城及汕头、梧州、衡州、宜昌、九江、安源、芜湖、无锡、苏州、宁波、厦门、石家庄、唐山这一类城市，均向中央做一个镇反工作的报告。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

[1] 指中共济南市委1951年4月5日关于济南市4月1日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大逮捕的情况给山东分局的报告。大逮捕后，济南市委组织大批干部深入群众宣传，多方收集了对这次镇反行动的反映。

# 转发东北军区党委 镇反工作计划的批语

(1951年4月13日)

各大军区党委，并告军委直属各部门及各特种兵司：

看了东北军区党委四月八日关于在东北军事系统内执行镇反工作的计划<sup>⑩</sup>，很高兴。这个计划很周密恰当，是对于这个严重问题做了认真的研究然后定出来的，请你们一致注意研究这个文件，作为在自己系统中进行镇反工作的参考。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

[1] 中共东北军区委员会镇反工作计划的要点是：（一）组织全体干部学习镇反文件。根据文件精神检查干部思想，并将这些文件在全军传达、教育。（二）根据现有线索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布置与加强调查力量，进一步发现问题，充实材料，准备抓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并在抓捕后抓紧审讯，以扩大战果。（三）审查的重点，军区党委应抓紧军工、后勤、特种兵与机要部门，各单位亦应根据自己的条件决定各自的重点。对案子和人员的审查，也应分主次，掌握重点。（四）处理原则：（1）过去有重大罪恶的与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查有实据者处死刑，恶霸地主送原籍交法院判死刑。（2）胁从分子，罪恶不大者，集中管训后遣回原籍，交地方公安部门管制。（3）重大嫌疑分子集中管训，继续严格审查，弄清后再予处理。（五）各级政治部门必须把这一工作作为目前的中心任务，各个部门的审查与镇反工作应由首长负责。凡判处死刑者，须经军区首长批准，并组织公审借以教育群众。（六）必须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与人事录用制度，用人必须经过团以上机关审查批准，保卫部门应予加强。

# 转发南京市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1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关于在镇反工作中有计划地统一逮捕和有计划地广泛宣传这两点，现在华北华东东北三大区均已实行，或者正在准备实行。请中南西南西北三大区亦研究这样做。如不能做到各大中城市同时动手统一逮捕，至少应做到一个城市统一逮捕（重庆兰州已是这样做了）。至于事前事后使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宗教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真正与闻其事，并向全体人民展开宣传讨论，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更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南京市委的报告，可为参考。过去该市手面太小，不敢大张旗鼓杀人，现已彻底转变，做得很好，大有成绩，并且跑到许多城市的前面去了。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 防敌从元山登陆

(1951年4月13日)

德怀<sup>[1]</sup>同志：

四月十日廿四时电<sup>[2]</sup>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二)为防敌从元山登陆，似须以四十二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请酌定。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51年4月10日24时彭德怀关于第五次战役部署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我作战企图，拟从金化至加平线，利用这一带大山区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用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对西线敌人进行战役两翼迂回，第三兵团正面攻击，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力求在三八线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纵深发展。攻击时间，如敌进展快，我拟4月20日前后开始，各兵团4月15日可集结完毕，时间较仓促些；如敌进展不快时，待5月上旬出击。

德懷同志：四月廿日的電<sup>急</sup>悉  
全同意你的預定部署望依情況堅決  
執行之  
毛泽东四月十三日

(二) ~~爲~~為防敵從元山登陸  
似須以四十二軍主力~~及下級部隊~~  
位於元山城內及其附近~~，~~  
確保元山，請酌定。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手稿。

# 给田家英<sup>[1]</sup>的信

(1951年4月16日)

家英同志：

此九篇请送陈伯达<sup>[2]</sup>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sup>[3]</sup>，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

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3] 这4篇文章，后来都收入了《毛泽东选集》。前两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目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四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目为《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 转发西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 指示的批语

(1951年4月1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西北局这个指示<sup>[1]</sup>强有力地指出在镇反工作中展开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规定了五条办法，一切地方都应当这样做。凡属现在仍然小手小脚，不敢大张旗鼓作宣传，不敢吸引广大党外人士共同参

---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51年4月14日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宣传工作给所属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示中对加强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工作，提出了五条办法：（一）各级党委均应组织所有干部学习有关镇压反革命的四个文件，各地负责干部须就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区镇反情况、干部思想动态召开干部大会，作专门报告。（二）宣传内容掌握要点。对特务、匪首、惯匪、恶霸、一贯道的反革命活动历史罪与现行罪大大揭露，宣传人民政府支持群众要求，保护群众利益，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精神，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正确政策。（三）宣传方法多种多样。最有效的：第一是控诉会，第二是展览会，第三是报纸、广播、文艺活动的全面配合。（四）宣传队伍不断扩大。全党动员进行宣传，经过政府委员会议、协商委员会议、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使广大党外人士与闻其事，并组织他们向群众宣传。在3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则应以公安部门为主，吸收党的宣传、统战部门及报纸、广播电台负责干部，组成镇反宣传委员会，作为推进这一工作的指挥机关。（五）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均应在接到这一指示的一星期内，专门讨论这一工作，订出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具体计划。

加镇反工作，以致引起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的地方，尤其要即刻改变作风，并且愈快愈好。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 转发天津市通过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 进行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1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

天津镇反工作做得很好，团结和教育了各界人民，一切地方均应照此<sup>[1]</sup>办理，坚决地打破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作风。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

[1] 天津市公安局1951年4月9日总结的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进行镇反的报告中说，天津市于3月27日召开第三届各界协商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之后又于29日召开1.5万人的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大会实况由电台广播，组织了50万市民收听。会议进行了5个小时，到会群众情绪一直高涨，会后各界反映很好。

# 转发宿县地委关于运用农代会 布置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1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皖北宿县地委运用农民代表会议布置镇反工作，审查镇反工作及审查基层干部和党团员的经验，一切新区均应照此办理，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 转发山东军区关于镇反 和审查不良分子的计划<sup>[1]</sup>的批语

(1951年4月17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治委员向明1951年4月13日给华东军区党委并报总政、华东局的报告中提出的镇压反革命和审查不良分子的方针和办法。报告指出：必须严厉地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对于已经掌握了材料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逮捕处理。在审查不良分子中，首要的是把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我们的要求是，绝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暗藏或打入我们的部队，但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报告要求对各种不良分子、雇用留用录用人员、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家庭被斗对土改不满者、一贯贪污腐化及违法乱纪者和一贯思想落后对抗组织者六类人员的审查，必须分清政治问题，阶级成分问题，社会成分问题，纪律问题和思想问题，作不同对待和处理，绝不能混同。除确属反革命分子必须逮捕处理者外，须按不同情况采取清洗、集训、调训、调离要害部位、给予纪律处分及教育争取等不同方法处理。我们的要求是绝不能让一个不能改造的不良分子留在或打入我们的部队，但也绝不随便抛弃一个还可以改造的不良分子。报告还指出，在方法上，要做好团党委以上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使其认识到反革命活动的危害性，分清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审查不良分子的界限，掌握不同对象不同对待的方针。并在干部中连队中加强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提高阶级觉悟，站稳阶级立场。在组织执行上，必须是党委统一领导，首长亲自负责，组织保卫委员会主持，实行保卫部门与组织部门和军法部门相结合，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内部工作方法与公开工作方法相结合，审查处理与教育相结合等。

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并告军委直属各部门及各特司<sup>[1]</sup>：

山东军区布置镇反工作很认真，规定方针和办法也很恰当，可为各军区参考。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各特种兵司令部。

# 注意对付敌可能降落的伞兵

(1951年4月17日)

德怀<sup>[1]</sup>同志，并告高岗<sup>[2]</sup>同志：

四月十四日电<sup>[3]</sup>悉。你对于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的部署及开辟中间运输道路的计划，均甚好。但尚有一事请注意，即敌人若从中间各地降落伞兵，例如敌冒险以一个伞兵团在熙川、球场、德川区域降落，以一个伞兵团从破邑、谷山、遂安、伊川区域降落，到处乱窜，扰我后方，此种可能性很大，请速筹对策。五十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以用于这一地区的防卫。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51年4月14日13时彭德怀关于海岸部署意见给中共中央军委并转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估计敌大举登陆与正面进攻是结合的，只有让敌登陆，离开其海军炮火的有效掩护，再行围歼之。以小部队担任沿海警戒，布置水雷、地雷，予登陆的敌人若干阻难，争取调动部队、部署战斗的时间。第三十八军、第四十二军原地加速整补，令其在元山、高原线离海岸20里至30里准备战场，看好地形，做必要工事。同时加紧修筑熙川至破邑的公路，修通德川至球场、龟城至球场的铁路。

# 给湖南浦<sup>[1]</sup>的信

(1951年4月17日)

南浦兄：

一月十四日惠书敬悉，深感厚意。望仍在原地经营旅业，不必来京。谨此奉复。

并致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

[1] 胡南浦（1881—1953），湖南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私塾同学。当时在云南经营旅店，1952年返回韶山居住。1951年11月19日，毛泽东曾为其搬家赠送人民币500万元（折合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500元）。

# 转发罗荣桓<sup>[1]</sup>等关于黃祖炎 被害事件调查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19日)

中央军委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各大军区，志司，并转各省军区，军分区，兵团军师，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黃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sup>[2]</sup>一件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

---

[1] 罗荣桓，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

[2] 指罗荣桓、罗瑞卿（公安部部长）、傅钟（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4月12日关于黃祖炎被害事件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谈到了黃祖炎同志被害的经过，凶手王聚民的罪恶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从这一事件中应当记取的教训。关于王聚民的问题，报告说，凶手王聚民现年34岁，恶霸地主出身，1940年混入我军，1941年混入我党，土改时因家中被斗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作处理。1950年11月调惠民军分区后，企图借组织力量向群众倒算，遭到群众联名告发，除揭发其父亲的历史恶迹外，还揭发他在1938年曾向敌密告我两个地下党员，要求给予他处分。军分区政治部领导唯恐影响其情绪，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发觉群众控告后，情绪突变，军分区亦未引起警惕，3日后仍令其到军区开会，致使阶级异己分子王聚民乘机直接行凶报复。

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

毛泽东

四月十九日

# 对陈毅巡视福建工作报告的 复电和批语

(1951年4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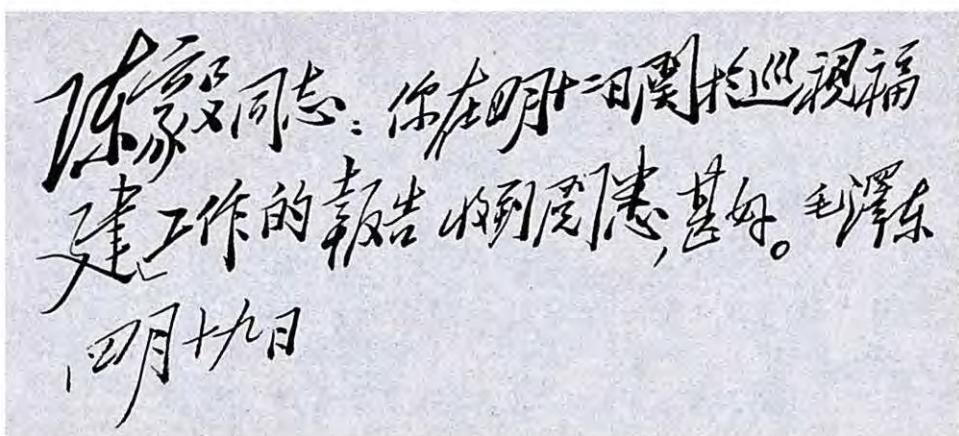
—

陈毅同志：

你在四月十二日关于巡视福建工作的报告收到阅悉，甚好。

毛泽东

四月十九日



毛泽东复陈毅电的手稿。

—

邓、谭、赵<sup>[1]</sup>并剑英<sup>[2]</sup>:

兹将陈毅同志关于福建军队整训、厦门防御部署及核减海防经费七百多亿等项情况的电报发给你们参考。广东现在集中了六个军，虎门修了防御工事，希望你们加以检查，做了〈出〉像福建那样的成绩。

毛泽东

四月十九日

---

[1]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赵，指赵尔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

[2]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转发河北省农业厅 审查旧人员的经验的批语

(1951年4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志司，中央军委直属部门及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华北局这个关于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典型经验<sup>[1]</sup>极好。有了这个经验，就使我们对于全国现有参加工作的百余万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审查有了充分的把握，请你们充分地利用这个经验。

毛泽东

四月二十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4月12日关于河北省政府农业厅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经验向中央的报告。主要经验是：1. 高级领导机关首先需要三查（查历史，查思想，查工作），也有条件进行三查。2. 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行政与支部彼此配合，动员全党及一切党外积极分子才能做好。3. 必须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提出三查的内容和目的，转弯抹角反而引起不必要的混乱。4. 在非党干部中进行三查要和党内有区别，工作方式要灵活，可多采用个别谈、小会讲的形式，避免陷于僵局。5. 必须抓住重点，即抓住问题严重的分子，抓住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钻到生活细节中，更不要扭在次要人的身上。6. 妥善解决三查和工作的矛盾。

# 给杨尚昆<sup>[1]</sup>的信

(1951年4月20日)

尚昆同志：

此件<sup>[2]</sup>第（二）项所说“论忠诚与老实”“思想反省笔记”（华北革命大学学员反省的材料），这两个文件，请你向华北局要来送我一阅。

毛泽东  
四月廿日

---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4月12日关于河北省农业厅三查经过及经验的报告。

# 转发师哲<sup>[1]</sup>关于陪同费德林<sup>[2]</sup> 访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21日)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同志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下面是师哲同志的报告<sup>[3]</sup>，其中说到各地招待外宾的缺点，请加注意，尔后不要过分和不适当。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一日

---

[1] 师哲，当时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

[2] 费德林，苏联汉学家、作家，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3] 指师哲1951年4月20日关于陪同费德林访问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到一些地方同志组织不必要的夹道欢迎和宴会。在浦口车站和上海站，为了让友人通过，让成千的群众不准行走。还有个别领导干部随便送礼物，不适当题字，乱送不适当的材料和文件，在某些场合讲些有失立场和无分寸的话，造成不好影响。

# 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

(1951年4月22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中央军委各直属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一) 关于在政府系统中和军事系统中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工作，各地各部门现已开始着手进行。在答复“包下来”的问题时，我们看见有说得不适当的。例如“有的人说，解放接收时原封不动包下来了，今天又来处理，是否有矛盾？”答复：“没有矛盾。镇压与宽大结合的政策，并无变动。以前包下来是为迅速恢复生产，安定工作。特务分子不积极生产，而积极破坏生产。今天既然已了解他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还不处理？”（滕代远<sup>[1]</sup>同志在铁路工会的报告）。这样答复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约法八章的布告，内称：“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现在审查旧人员（还有新知识分子），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

---

[1] 滕代远（1904—1974），湖南麻阳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

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同时对于那些并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这些人占大多数），则因为清出了那些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而使他们显得历史清白或虽有问题但不严重，利于团结和改造。这后一类人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清白没有问题的；第二部分是有些问题，但不严重，只要坦白承认错误，可以继续工作的（其中有些人须调动工作岗位）。（二）所谓有严重的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惯匪，特务，欺压过许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属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军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三）下面是李立三<sup>[1]</sup>同志给中央的信，其中所说工厂和矿山的恶霸应予惩办，这是毫无疑义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二日

---

[1]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51年，毛泽东在北京郊区。

# 转发中南局关于镇反工作 补充指示的批语

(1951年4月2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兹将中南局四月十七日关于镇反工作的补充指示<sup>[1]</sup>一件转给你们参考。这个指示全部说的是宣传工作，规定了具体办法和具体时间，请各地仿照办理。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

[1] 这个补充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统限于电到7日内成立镇压反革命宣传工作委员会。（二）各级党委之报告员工作业已建立者，4、5两月内每人应向群众作5次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报告员工作未建立者，即应建立，并执行本条规定。（三）镇压反革命应成为五一节前各群众团体（工、青、妇、文等）主要宣传内容之一。（四）无广播的地方，注意在处决罪大恶极之反革命分子前，召开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公审会和控诉会、诉苦会。（五）中南人民出版社最短期内（不得超过10日）应将中央人民政府之惩治反革命条例编成一种通俗读物，制成纸型分送各省翻印。各省之出版部门亦应于最短期内组织编写通俗读物。（六）各地党报应密切配合作充分的报道和宣传。统战部并须组织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写文章或广播。（七）请各省委考虑目前这样小批不断处决的办法是否合宜，还是在适当时期整批地处决一次，以便集中较大力量作一次普遍而深入的宣传工作为得计。（八）今后除杀人出布告外，还应注意一并将被处徒刑和被释放者也在报上公布或张贴判决书，以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之完整精神。

# 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工厂、企业、学校中 开展镇反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4月2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这是华北局关于在工厂企业学校中开展镇反工作的指示，发给你们作参考。这方面的镇反工作是必须进行的。如经验不足，可先择重点进行，取得经验，作充分的准备布置，然后普遍进行。特别注意宣传和准确。

毛泽东

四月廿三日

# 对订制军用雨衣 被奸商诈骗情况简报的批语<sup>[1]</sup>

(1951年4月26日)

必须严格处理，教育干部。<sup>[2]</sup>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六如1951年4月24日简报的批语。

[2] 李六如关于军委订制200万件军用雨衣被奸商诈骗，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事件的简报说，此项雨衣是1950年10月至11月由华北军区后勤部代表军委后勤部通过中央轻工业部在北京、天津、青岛三地订制55万件，另由上海等地承制145万件。单就天津承制30万件说，由于奸商预知订制雨衣之消息，并乘我军需急迫即串通活动，大量抬高雨衣成本，致使国家财产损失近90亿元（人民币旧币）。如果按京、津、青三地订制55万件计算，国家损失140亿元（人民币旧币）以上；如果按全国订制200万件计算，国家损失更大。

# 转发华东局关于十六个大中城市 统一镇反行动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2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在大中城市中，在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各里弄（街巷或胡同）建立群众的肃反委员会，有检举控诉和监视反革命分子的权力，但除现行犯外无捕人的权力，各城市均可仿行。下面是华东局在十六个大中城市统一镇反行动的报告，可作各地参考。

毛泽东

四月廿七日

# 给司徒美堂<sup>[1]</sup>的信

(1951年4月27日)

美堂先生：

四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健康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

---

[1] 司徒美堂，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正在广东省鹤山县（今高鹤县）农村参观土改。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美堂先生：

四月十四日惠信收到，甚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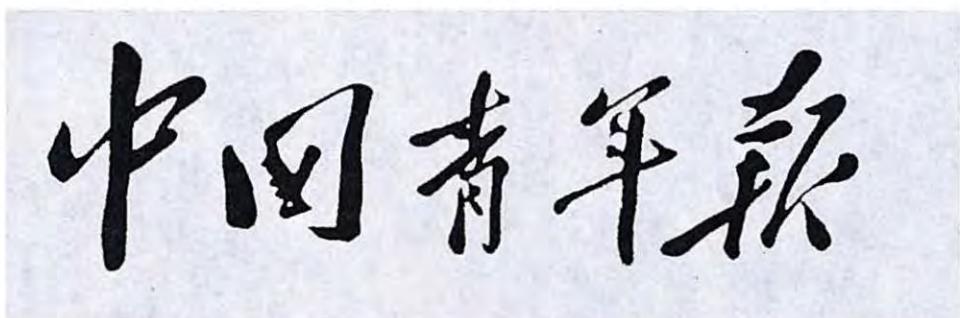
為山西農民同志們送來的禮物  
也收到，特此先生转達他們至  
致謝意。先生在南方轉電  
時期很好，希望先生於八月  
上旬返京，而時數甚短。盼  
健。余  
毛泽东  
四月廿七日

毛泽东致司徒美堂信的手稿。

# 为《中国青年报》题写报头<sup>[1]</sup>

(1951年4月27日)

中国青年报



毛泽东为《中国青年报》题写的报头。

---

[1] 1951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创刊号正式出版，报头由毛泽东亲自题写。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为《中国青年报》题写报头。

# 注意在第五次战役中 给敌以尽可能大的打击<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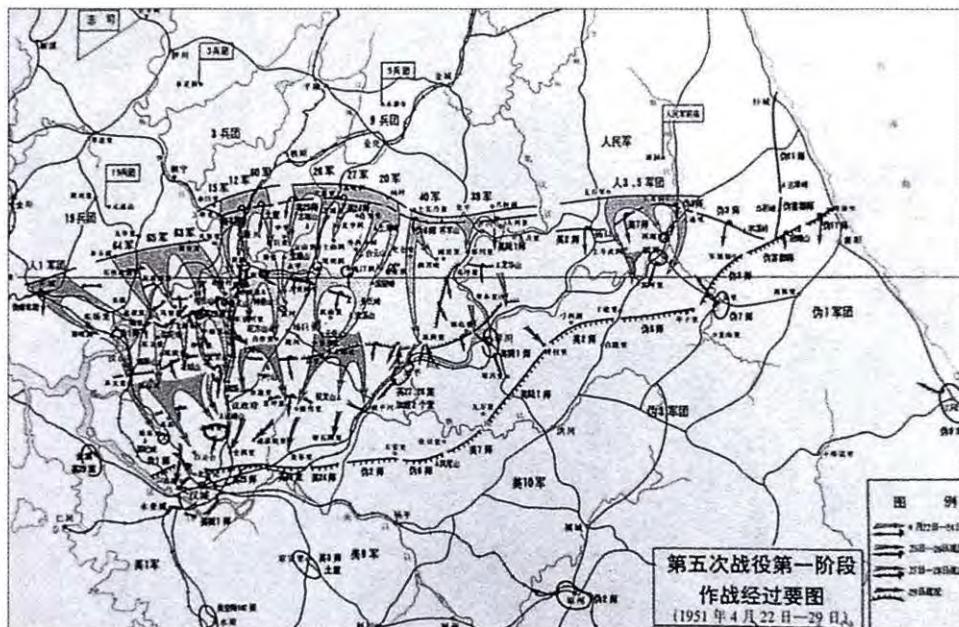
(1951年4月28日)

请注意在此次战役<sup>[2]</sup>中，对伪一师、美三师、二十五师、二十四师、土耳其旅及英二十八旅给以尽可能大的打击，目前这几天似乎还有此种可能，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次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上加写的一段话。

[2] 指第五次战役。是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共投入15个军的兵力，连续奋战50天，歼敌8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我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峰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迫使“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五战五捷，把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南。图为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经过要图。

# 给陈文新<sup>[1]</sup>的信

(1951年4月29日)

文新同志：

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sup>[2]</sup>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

问候你的母亲。

祝进步！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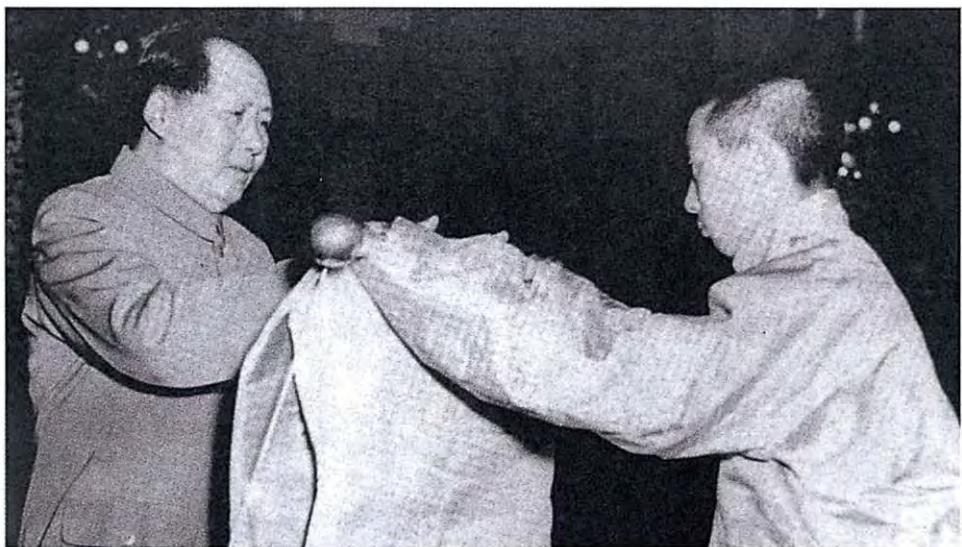
---

[1] 陈文新，当时是武汉大学农学院的学生。

[2] 即陈昌，新民学会会员，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1930年牺牲。



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行到达北京，进行和平谈判。图为到车站迎接的周恩来、朱德、李济深等和班禅额尔德尼步出车站月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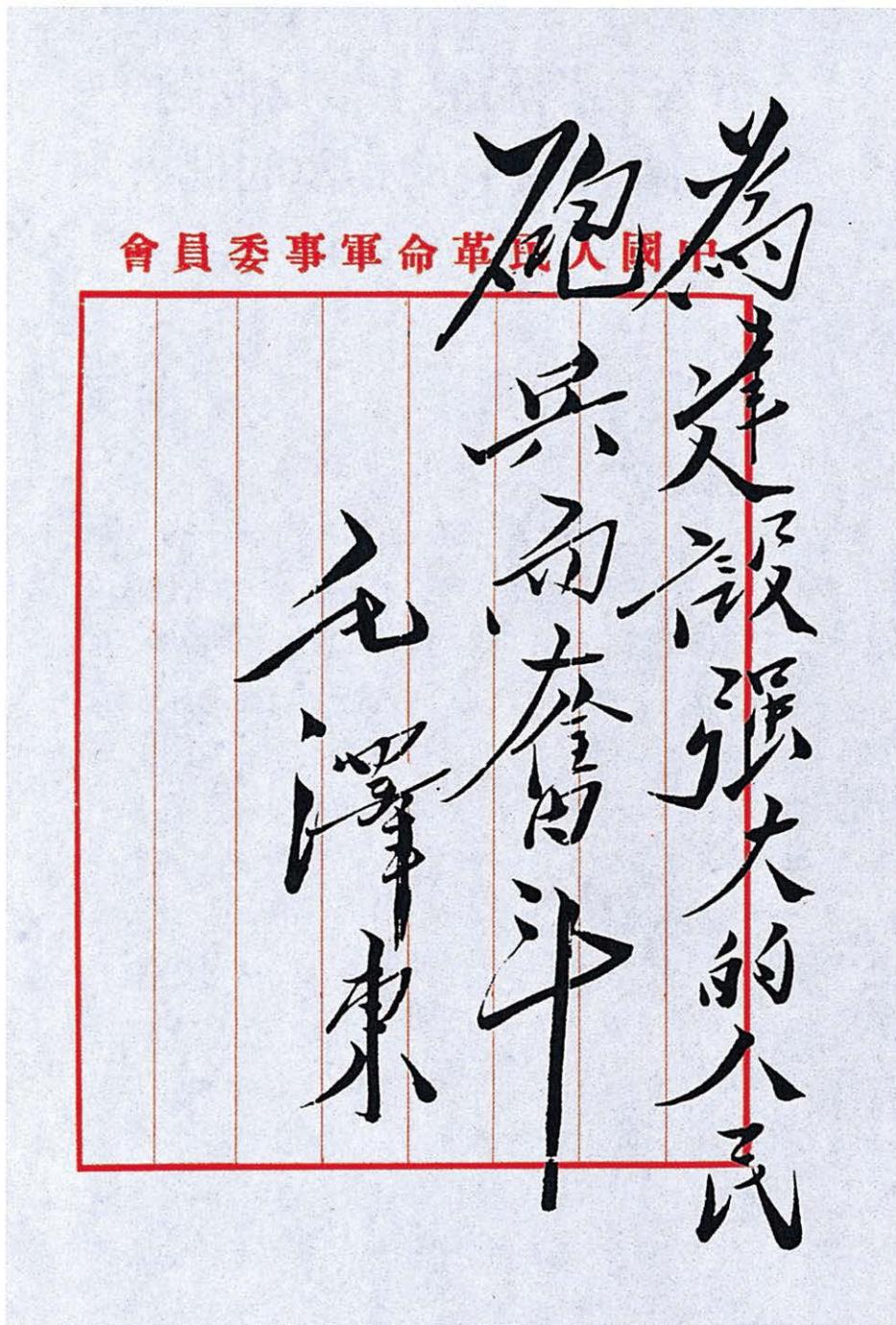
1951年4月，班禅额尔德尼向毛泽东敬献锦旗。

# 为炮兵学校题词

(1951年4月)

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的题词。

# 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 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4月30日)

各中央局，并即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

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其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这个问题，即将提到五月十日在北京开会的公安人员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

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的批语

来，或打电报来。下面是西南局给川北区党委胡耀邦<sup>[1]</sup>同志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合于上述原则精神的，特转发以供参考。

毛泽东

四月三十日

---

[1] 胡耀邦，当时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



1951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班禅额尔德尼敬献的哈达。



1951年5月1日，阿沛·阿旺晋美向毛泽东敬献哈达。

# 转发二十三兵团党委 关于开展民主运动的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4日)

邓、谭，贺、邓，张、甘，王震<sup>[1]</sup>：

这是廿三兵团党委的报告<sup>[2]</sup>，可作你们改造廿一兵团廿二兵团及其他起义部队的参考。廿三兵团即傅作义<sup>[3]</sup>部，董其武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全部由绥远开至河北整训，现已基本上得

---

[1]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甘，指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2] 指中共第二十三兵团委员会1951年4月24日关于起义部队开展民主运动的总结报告。报告说：全兵团的民主运动，经过40天艰苦工作，已于本月10日全部结束。这个运动的结果，改变了部队的基本形势，创造了今后工作的有利条件。目前部队的主要情况是：(1)战士的阶级觉悟提高，许多战士已经站立起来，成为部队的主人翁和有生力量。(2)打垮了军阀主义思想体系，揭露了许多惊人的罪恶事实。(3)部队积极因素和进步力量占了绝对优势。(4)部队组织较前纯洁。(5)补充了1万名翻身农民，增加了部队新的血液，改变了部队成分。

[3] 傅作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

到改造。廿一兵团及廿二兵团的改造情形，请邓谭及王震责成该两兵团党委向军委作一次报告。

毛泽东  
五月四日

# 关于转发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4日)

此件<sup>(1)</sup>发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局，作为在机关学校部队中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参考，这个经验是很有用的。

毛泽东  
五月四日

---

[1] 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1951年4月29日关于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开展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界限，解除很多学员思想中不必要的顾虑，使之安心学习；同时暴露和镇压隐藏在学员中的反革命分子，纯洁学员队伍，以利于争取改造大多数，巩固统一战线。这次运动的主要经验是：1. 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不是搞思想意识、生活作风或学习态度等问题。2. 主要首长作动员报告，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说明政策，号召有问题的人看清前途，相信政策，扫除顾虑，老实坦白。掌握的原则是：①自觉自愿不追不逼；②只搞属于政治性的问题；③不拘形式，写讲均可；④实事求是，不扩大也不缩小。3. 及时解决群众的顾虑，统一认识，分清敌我，划清界限，分化和孤立反动分子，形成群众性的拥护镇压反革命的优势。4. 组织强有力党的领导机构，严格控制，统一计划，勤加检查，一致步调，并应适可而止。5. 对罪恶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分子，大张旗鼓，宣布罪状，作出结论，予以逮捕。对真诚悔过、不完全悔过和完全不悔过者，区别对待。

# 给张治中的信

(1951年5月5日)

文白先生：

来信读悉。闻病甚念。视察团<sup>[2]</sup>有邵先生<sup>[3]</sup>领导也就可以了，您可以安心休养，以期早愈。即颂  
痊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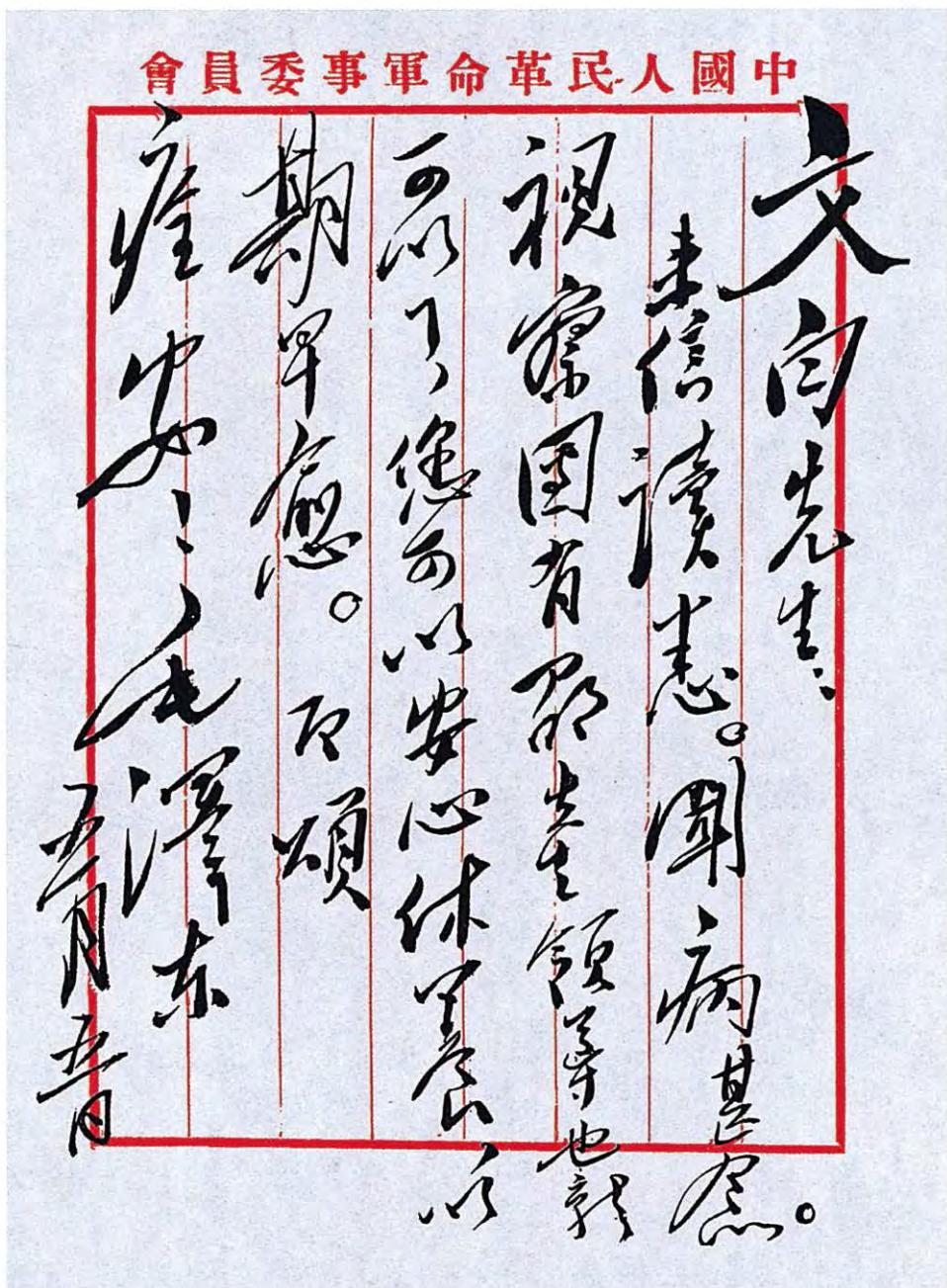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五月五日

---

[1] 张治中，字文白，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 指中央治淮视察团。原定张治中任团长。

[3] 指邵力子，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



毛泽东致张治中信的手稿。

# 关于同意苏联就美国对日和约草案 所拟复文的电报

(1951年5月6日)

菲里波夫<sup>[1]</sup>同志：

你给我的五月六日的电报<sup>[2]</sup>收到了，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对美国政府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廿四时

---

[1]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

[2] 斯大林在这份电报中向中国政府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准备对日和约问题拟定的给美国政府复文的主要内容。其要点是：准备对日和约草案，不应由美国政府单独进行，而应由中、苏、美、英等国共同进行准备，并吸收所有对日参战国一起参与；对日和约应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协定的基础上制定，并以日本应当成为和平民主的独立国家，限制日本武装力量使之不得超过自卫的要求，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对日本和平经济事业发展不加任何限制等作为指导原则。

# 中央转发华北局 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5月7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

兹将华北局五月六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电转给你们。中央认为华北局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均应照此施行。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至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至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清理积案是目前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调集大批干部，在几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整理监狱，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清理期内，各地除现行犯及由各中央局决定的少数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待积案清理完毕后再捕应捕之人。兹定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一』日计四个月为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在此四个月内，“中层”及“内层”重点审查必须认真进行，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中央  
五月七日

# 转发谭震林关于 杭州镇反情况报告<sup>[1]</sup>的批语

(1951年5月7日)

---

[1] 指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谭震林1951年5月1日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给华东局转报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批转这个报告时，除写了上述批语外，还在谭震林的报告内写了6条批语。一、在报告概述杭州市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情况的部分，毛泽东在“汉奸七十五人”后批注：“有血债及其他引起群众痛恨的汉奸分子，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解决。”二、在报告谈到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审批手续严格，各方面力量组织得好，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错这一段末尾，毛泽东批注：“应当这样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从事是错误的。”三、在报告谈逮捕前后的宣传动员工作一段的末尾，毛泽东批注：“不做好宣传不要杀人。”四、报告谈到，虽然逮捕和枪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的坚决分子还在顽强地向我反抗，已经发生向我公安分局打枪、书写反动标语、制造谣言转移群众反特斗争视线等，对潜伏的反动组织只是开始发现，有了一点儿线索，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在这里批注：“我公安机关对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在许多城市都很差，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认真建立这个工作。”五、在报告说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工作，审查案卷，核实材料，讨论量刑问题这一段末尾，毛泽东批注：“各城市均应当这样做，不要怕麻烦。”六、报告还谈到杭州市确定5月份以镇压反革命为中心工作，以工厂工人、学生、居民、农民为发动群众的主要对象，以小型的控诉会、公审大会作为发动群众的方式，对文化教育界、宗教界、各民主党派、工商界有意识地放后一步，而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一定的工作。毛泽东对此批注：“这样做很好。”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五月七日

# 关于印发南京市公安局 纯洁内部的计划的批语

(1951年5月7日)

罗瑞卿<sup>[1]</sup>同志：

公安机关及警察内部旧人员的审查清理处置的问题，应为此次公安工作会议的议题之一，应以一天的时间专门讨论此项问题。南京这个材料<sup>[2]</sup>很有用，可印发到会人员作参考。

毛泽东

五月七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指南京市公安局1951年5月3日关于纯洁内部的计划给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并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报告。

# 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 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政策的决定

(1951年5月8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兵团及志司，并告中央及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

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下面是东北军区保卫部在军区系统逮捕第一批二百零四名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请东北军区即照上述原则处理。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中央  
五月八日

# 对中南军区关于华南海防战备 报告的复电和批语<sup>[1]</sup>

(1951年5月10日)

—

中南军区司令部：

五月六日报告<sup>[2]</sup>收到甚慰。望继续督促广东军区及各军加紧备战整训及其他必要措施，特别注意指导各军审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内部。

毛泽东

五月十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部1951年5月6日报告的复电。本篇二是毛泽东为转发这一报告写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的批语。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部的报告。报告说：3月份华南地区海防工作，完成了要塞的炮兵安置，调整了水警区的岛屿守备。部队方面继续进行战备练兵，进一步勘察战地沿海一带及附近地区的地形、道路，熟悉战场，研究作战方案，准备机动作战。

二

华东军区司令部：

兹将中南军区司令部五月六日报告一份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督促所属加强备战整训和必要的备战措施，并将情况上告。派人下去检查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  
五月十日

# 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执行 中央镇反指示的检讨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10日)

各大军区党委会，并转各省军区及各行署军区党委会：

直到今天为止，关于各省军区和各行署军区党委会向军委作镇反工作的报告的还很少。我们要求每个区省级军区（包括各行署〔军〕区）党委会必须一律向军委作此项报告一次，限于七月一日以前交齐，由各大军区政治部主任负责督促。届时不交报告者，将受到通令批评。下面是广东军区党委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揭发了很多极端严重的现象，认真负责地处理了自己的问题，特发你们参考，并予通令表扬。

毛泽东  
五月十日

# 同意在朝鲜战争结束前 推迟解放金门<sup>[1]</sup>

(1951年5月10日)

聂：

同意你的意见。<sup>[2]</sup>

毛泽东  
五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5月10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在朝鲜战争未结束前，夺取金门之战以推迟举行为宜。估计攻占金门须经过剧烈战斗，各项物资准备必须充分。而在朝鲜战争未结束前，两方同时供应，力量恐来不及。因此所需船只以暂不集中和补造为好，以免形成很大浪费。”5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朝鲜战争未获决定性的胜利前，暂不举行攻夺金门的战役。为此，除现有的500艘机帆船仍应分地进行训练与保养外，所缺船只暂不建造。

# 对今后军工建设方针报告的批语<sup>[1]</sup>

(1951年5月12日)

同意此项计划。<sup>[2]</sup>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5月11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归纳军工委员会关于今后军工建设方针问题的讨论意见如下：（一）大家一致认为今后的军工建设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但这个方针必须根据整个国防建设计划来制定。因军委过去尚无此项决定，故在考虑军工建设时亦较困难。唯根据目前国际情况的发展，我们考虑要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与维护大陆国防的安全，需要保持60个军180个师的国防军。这些军的装备，则需要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予以改善。（二）国防军的装备，必须向着生产自给的方向努力。（三）各种武器的口径规格原则上需要与苏联取得统一，但马上全部统一是办不到的，必须采取逐步统一的原则。（四）在苏联同意与我统一口径规格的情况下，我们不拟采取一般订货与聘请若干顾问的办法，而采取请苏联“包干”的办法，如请苏联负责帮我们建立野炮厂，并配足技术人员，直到教会我们能够掌握该项技术为止。

# 转发中南局关于纠正镇反中 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5月1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兹将中南局五月十二日的指示电<sup>[1]</sup>发给你们，请仿照办理。中央公安部正在组织十五个视察组，每组三人，分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各省区检查镇反工作，定于六月十五日由北京出发。请你们即派若干视察组先去各县市实行检查，迅速纠正已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南方面杀人最多，宣传最少，极不相称，存在着很大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立即纠正。从中南局五月十二日的电报看来，中央和中南局历次指示在汉口这样的地方并未实行，等于说空话，必须立即派人下去检查，问明责任，纠正错误，不可一刻延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1年5月12日给分局、各省市委书记并报中央的电报。电报说，现在各市在镇反中的神秘主义、关门主义、不要群众参与、不管行政、不要党外人士参与、单靠公安部门孤立镇反的倾向，还未认真加以克服。口头上说大张旗鼓，事实上不找具体办法，即如武汉市从中南局直属机关逮捕5个人，连中南局的工作人员及主管人员都莫名其妙，就是明证之一。此外，今后对案情处理，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包括进步、中间分子），这对镇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我们对案犯是采取依法判罪态度，并无不可告人之秘密，而通过这些人可以扩大宣传，并可增加材料。

缓。此电请你们一直转发至地委，并请迅速转去。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转发苏南区党委 关于清理“中层”计划的批语

(1951年5月1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清理“中层”问题现在即应开始解决。除中央对此问题即将发出指示<sup>[1]</sup>外，苏南区党委五月七日的计划<sup>[2]</sup>及华东局五月十二日给苏南区党委的指示电<sup>[3]</sup>，均很好。请各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参考苏南此项计划及以前通报的华北革命大学的经

---

[1] 指中共中央1951年5月21日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

[2] 指中共苏南区委员会1951年5月7日关于在直属机关中开展镇压反革命学习和清理“中层”的计划。计划指出，清理“中层”不仅带有审干性质，同时还带有教育提高全体干部的目的，应取更加慎重和妥善的办法，通过群众性学习运动来进行。清理“中层”的计划，大体上分为组织学习、登记坦白和分别处理三个步骤。第一，首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准备。各机关应以行政首长为主，会同组织、保卫部门，并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成立机关学习委员会，领导镇压反革命的学习。第二，进行坦白登记。在坦白登记前，要进行忠诚与老实的教育。第三，分别处理。根据原有材料、新的材料组织审查，分清问题的性质与大小，适当加以处理，对坦白者一般不应逮捕。

[3]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年5月12日对苏南区党委关于在区直机关开展镇反学习和清理“中层”的计划的指示。

验<sup>①</sup>，作出自己的计划报告中央为盼。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1] 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 1951 年 4 月 29 日关于华北革命大学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经验报告。

# 转发四军党委关于镇反工作 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15日)

各大军区首长，并告志司首长：

兹将四军党委对于镇反工作的总结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  
请你们责成你们的政治部负责督促所属各军，除已作总结报告者  
外，一律作一次总结报告。拖延不报者应去电催促。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 镇压反革命经验的批语

(1951年5月15日)

各中央局，并即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并请各地委将此件一直转发到县委和小城市的市委：

兹将万全县的经验<sup>[1]</sup>通报给你们，请你们仿照办理。全国各县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是否举行了群众的控诉会，群众的反映如何，请每个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除已写的市）都向我写一个报告，交地委和省委转送给我。我希望全国二千余县委和市委的书记同志都和我直接通信一次。这些通信收齐后将发一通报，其中最好的经验将如万全县一样转发各地作参考。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1] 中共察哈尔省委办公厅1951年5月5日通报的万全县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是：将14名死刑犯分别于群众发动较差的城内、五区太师庄、一区西红庙、四区旧堡4处执行，并召开联村群众控诉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4处参加控诉会的群众两万余人，情绪极为高涨。

# 关于争取与尼泊尔建立 外交关系的批语

(1951年5月15日)

李克农<sup>[1]</sup>同志：

叫袁大使<sup>[2]</sup>密切注意尼泊尔的动态，加以研究电告，并应努力与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指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 给王淑兰的信

(1951年5月15日)

王淑兰同志：

五月九日来信收到，欢迎文润泉、文运昌两兄来京一叙。请持此电去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见刘道衡<sup>[1]</sup>同志，请他为两位文先生购买两快车头等火车票，并酌给路上用费，即可来京。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1] 刘道衡（1892—1968），湖南衡阳人，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副部长。



1951年5月，毛泽东的两位表兄到北京做客时，毛泽东和他们的合影。  
(从左至右)江青、毛泽东、文润泉、文运昌。

# 为治淮工程题词<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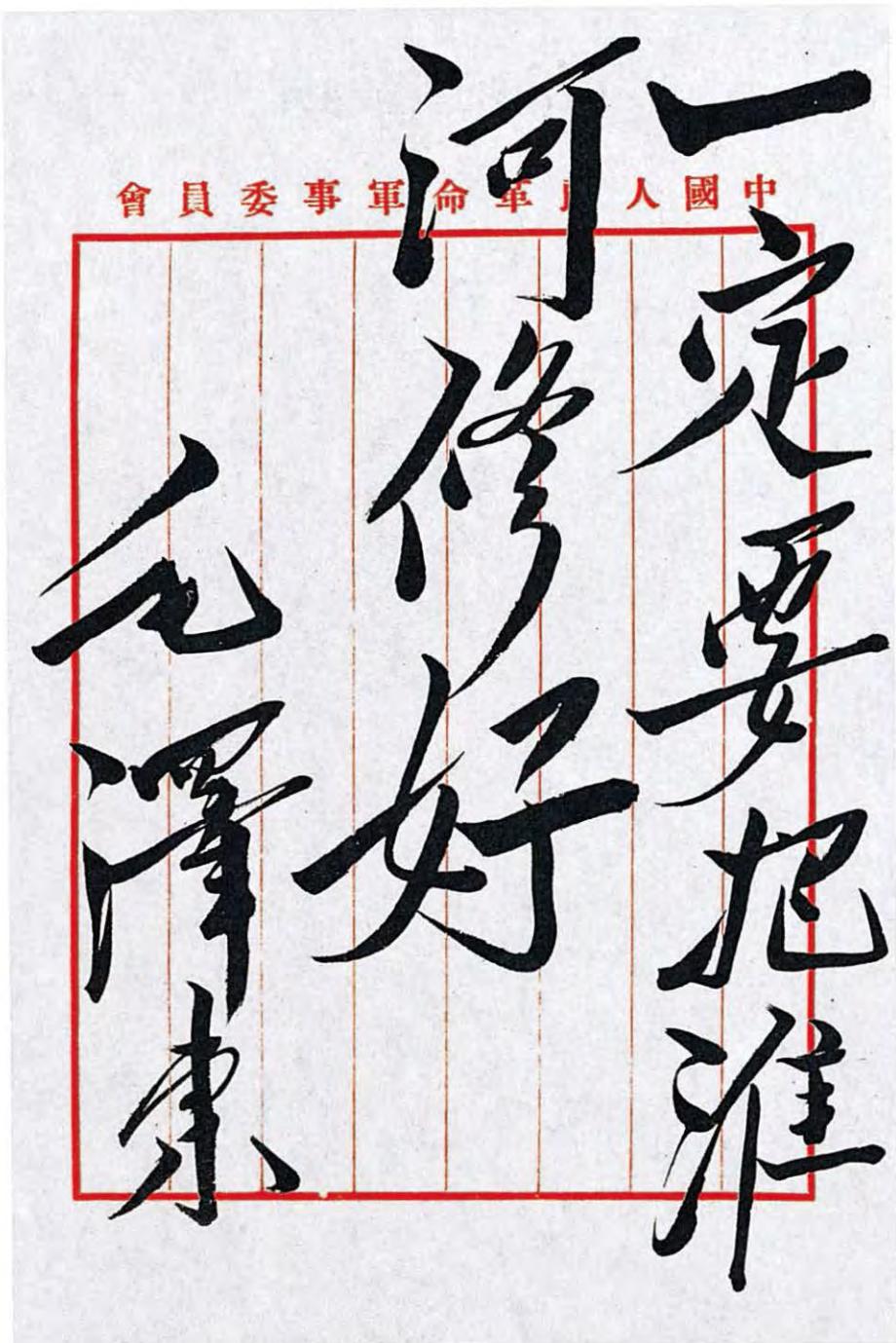
(1951年)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治淮视察团授予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的锦旗的题词。



毛泽东为治淮工程的题词。

# 中央关于转发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 决议<sup>[1]</sup>的通知

(1951年5月16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及地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及军党委：

(一) 中央批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中央认为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和正确的，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二) 这个决议和本电必须转发给地委一级和军党委一级为止，这是机密文件，不得遗失；(三)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详情，由各公安部长、厅长、局长向你们传达；(四) 这个决议和本电已发华东局三野和福建等三处，中南局和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五处，西南局和贵州云南等三处，西北局和一野新疆等三处，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等二处，东北局一处，志司一处，其他均请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和志司转发。

中央  
五月十六日

---

[1]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于1951年5月15日通过，经中央批准后于5月16日正式下达。毛泽东对这个决议稿作了大量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通过，经中央批准。这是机密文件，地方发至地委一级为止，军队发至军一级为止，不得遗失。)

中央双十指示<sup>[1]</sup>颁发以来的七个月中，在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和全国公安机关积极工作之下，纠正了对待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逮捕和处决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使敌焰大降，民气大伸，使镇压反革命工作成为全国性的高潮，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使人民的胜利和人民的统治进一步地巩固起来。由于中央和毛主席的密切指导，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地没有发生偏差和错误。

现在一般地区，处决反革命罪犯的总数已达很大量，需要迅即加以收缩。有些地区，逮捕了大批反革命罪犯，亟须加以清理。有些干部，随着群众反奸情绪的高涨，已开始发生了“左”的错误偏向，需要加以预防或纠正。同时，镇压反革命工作在城市开展的结果，又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并已开始牵涉到“中层”和“内层”。为了保证运动继续正常地健康地发展，特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原则和罗瑞卿同志的报告，作出如下决议：

(一)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特殊情况必须超过者，须经中

---

[1] 指中共中央1950年10月10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但亦不应超过太多。西北方面根据那里的情况规定杀人不超过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这也是正确的。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例如北京二百万人口，已杀六百多，准备再杀三百多，共杀一千人左右也就够了。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此，才能获得社会的同情；才能避免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才能分化和瓦解敌人，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生产建设。同时，在处决反革命问题上，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城市已达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此外，还应明确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二）现在全国积案未清的罪犯〔很多〕，必须有几个月用全力清理积案。因此决定：在今年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一』日的四个月内，全国各地，不论农村和城市，除现行犯和由各省（区）市党委呈请各中央局批准的少数人外，应一律停止捕人，以便集中精力清理积案。

(三) 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六月一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至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至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关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其捕人和判罪应遵照中央五月八日指示<sup>[1]</sup>，一律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以昭慎重。

(四) 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已经展开。但因运动发动较晚，有些城市镇压得还不够，群众要求继续镇压，因此仍需大杀几批，并争取在七月底以前，杀掉预计数字的三分之二。经过此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尚未破获的特务间谍分子的活动，必会更加隐蔽，因此公安部门必须进行更系统的侦察工作，并教育人民群众多方面地注意防奸工作。

(五) 清理大批罪犯的积案，是最近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通过党委，并在党委的坚强领导之下，从各方面调集大批的得力干部，采用突击方式，在六月至九月的四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其中大部分，必须在六、七两月内处理清楚。如果不在夏季处理完毕，拖到秋冬冷季，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在清理方法上，首先应清理该杀的和可以释放的。对于拟判一年以上徒刑的犯人，除不能劳动者外，必须一律组织他们参加劳

---

[1] 指中共中央1951年5月8日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

动。为克服监狱拥挤、营养不良、医药不足、发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况，应当仿照北京的办法，立即使他们离开监狱，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听候判决。对于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以采取缓刑或假释的办法，交群众负责管制。

(六) 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凡已有这一工作的地区，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大。主要的办法，是由县一级，专署一级，省市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中央一级，共五级，分工负责，划分人数，指拨经费，调配干部和管押的武装部队，组织犯人劳动，从事大规模的水利、筑路、垦荒、开矿和造屋等生产建设事业。此事极为艰巨，又极为紧急，必须用全力迅速地获得解决。

(七) 对于“中层”和“内层”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对于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及其他要害部门，则须在六月至九月内首先加以清查，并取得经验，以资推广。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

(八) 对于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必须进行适当的工作，以减轻或消除他们和人民的对立情绪，并争取其拥护政府的措施。为此，第一，应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是只惩办反革命罪犯本人，并不株连其未积极参预反革命活动的家属，使其了解政府的宽大处置，并各安生业。第二，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时，必须留给其家属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其财产较少者，一般可免予没收，以示宽大。第三，应有重点地布置侦察，进行监视，并对那些坚决反对人民和进行破坏的分子，予以必要的打击。

(九) 对于外国反革命分子的打击，目前还十分不够。各地必须抓紧进行系统的侦察，求得弄清情况，逐步破案，以便争取于一年至一年半内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特务间谍分子。

(十) 公安系统，包括警察和公安部队在内，必须于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过程中，如像南京公安局所提出的计划那样，认真地加以审查、清理和补充，使公安系统健全起来。

(十一) 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此项委员会，乡村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须镇反工作开展之后，有领导地进行组织，以免坏人乘机侵入。

(十二)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

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地审查捕杀名单和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十三）为了使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完全遵守上述工作路线，避免犯错误和纠正已经发生的偏向，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省（区）市一级和专区一级，共四级，均必须派遣多数的视察组，每组三人，向下一级至几级检查各地的镇反工作。各级工作组凡未派者，必须于六月内派出，不得迟延。视察和检查的标准是中央和各大行政区关于镇反工作的各项决议、指示和法令。

（十四）为了迅速地了解情况和及时地纠正错误，决定从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一』日的四个月内，从县级起直至中央，共五级，必须每五天由下级公安机关的首长用电话、电报或其他方法报告工作情况一次，不得违误。

（十五）以上各项，要求各大行政区一级和省（区）市一级，于六月一日以前，订出具体计划，正确地施行之，并报告各中央局和中央备案。

(十六) 决定于八月内召开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检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 转发邓小平<sup>[1]</sup>关于土改、镇反、 抗美援朝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16日)

小平，子恢，剑英，漱石，仲勋，一波，高岗<sup>[2]</sup>诸同志，并请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负责同志：

小平同志的报告<sup>[3]</sup>很好，发给你们研究。我的意见附注在报告各段里面，并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指邓小平1951年5月9日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向毛泽东并中央的综合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批注了9条意见：1. 在报告谈到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和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胜利

处，毛泽东批注：“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2. 在报告谈到进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须坚持复查、减退、惩治不法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导成分的方针处，毛泽东批注：“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3. 报告谈到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领导决定收缩，下面继续杀人处，毛泽东批注：“中南区也发生此种现象，也是控制不严的结果，必须记得这个教训，千万不可重复。”4. 在报告谈到上述现象经过西南局几次指示，特别是毛主席的几次指示，4月底都已停止下来处，毛泽东批注：“请中南华东各省坚决一律都停下来，方能控制。”5. 在报告谈到杀人批准权，除个别地委外，均已收到区党委处，毛泽东批注：“必须无例外地一律收回省或区党委。”6. 在报告谈到镇反和土改后期，事前不报告，事后不请示，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处，毛泽东批注：“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7. 在报告谈到西南全区干部从5月起进入整风，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发扬优点，纠正缺点，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处，毛泽东批注：“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两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风。”8. 在报告谈到许多同志以为抗美援朝影响工作，而群众一搞起来，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意料之外处，毛泽东批注：“还有两件事是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9. 在报告谈到今春雨水太多，可能影响春耕，各省都有一些地方发生严重的灾荒，担心各地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忽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注意对这一方面的指示处，毛泽东批注：“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

# 关于将捕人杀人的批准权 一律提高一级的电报

(1951年5月16日)

子恢<sup>[1]</sup>同志，并告饶、邓、习<sup>[2]</sup>：

五月十一日电收到。为了不使步骤混乱难于掌握（目前中南西南两区已有难于掌握的形势，必须严重注意），捕人杀人的批准权必须一律提高一级，不许有例外。在土改区可由省派代表至专区，由专区派代表至县，掌握材料，用电话向专区请示批准捕人，向省请示批准杀人，这样对于捕杀少数人仍是便利的。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

[1]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 关于鼓励部队继续剿匪致广西军区电

(1951年5月16日)

广西军区司令部，并告中南军区：

你们五月七日电收到，四月份全省歼匪近三万人，残余匪众只剩一万五千人，甚慰。尚望鼓励剿匪部队继续进剿，歼灭一切残匪。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 关于清理“中层”问题致高岗<sup>[1]</sup>电

(1951年5月16日)

高岗同志：

清理“中层”问题中央将于数日内发一指示<sup>[2]</sup>，请你接此指示后将你们的指示作适当修改，然后发出实施。详由汪金祥<sup>[3]</sup>向你面报。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2] 指中共中央1951年5月21日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

[3] 汪金祥，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 中央转发察哈尔省委关于 进一步普及镇反宣传计划的批语

(1951年5月16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

兹将察哈尔省委关于进一步普及镇压反革命宣传的计划<sup>[1]</sup>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地均照此计划去做。

中央  
五月十六日

---

[1] 中共察哈尔省委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一）各级党委宣传部将镇压反革命的宣传作为当前工作重心之一。（二）各区普遍召开一次各界代表会，各村普遍举行若干次各阶层的座谈会，专门讲解《惩治反革命条例》，联系本区、本村的镇压反革命工作，进行讨论，使群众明了政策。（三）大力组织群众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和防奸常识。（四）在镇压反革命的紧张阶段，应利用群众关心的每一个具体事件，经常向群众作报告。（五）各种对外宣传的报纸、刊物，均应发表专论。

# 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

(1951年5月16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sup>[1]</sup>，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51年4月30日关于1月至3月处理群众来信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对这段时间收到的近两万封群众来信进行分类统计，概述了来信反映的问题以及对这些来信处理的情况。报告并说“还有九千多封，是地方组织动员群众写的成批致敬信，有的现在还继续向这里寄。这种情形，无法一一回信，准备给该地以总的回信”。毛泽东对此写了批注：“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

中央局，並轉給省委、市委、地委、縣級  
各大行政區，各有市區、縣專區，各縣人民政府的  
黨組，並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的黨組：  
必須重視人民的來信，要給來信以相當  
的處理，雨是僅有的政黨要把這件事情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  
加強和人民聯繫的一種方法，不要採取掉以  
輕之不經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

信很多，本人要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  
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要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或被專門的要理，則不需要設專門  
門要理人民給我來信的秘書室，關於要理  
今年頭三個月信件工作的報告，發给你们參  
照，我想為這個報告的觀點是正確的。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毛泽东起草的《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的手稿。

# 在总政转发西北军区航空处 镇反报告的批语中加写的一段话

(1951年5月17日)

中央已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发给你们，望全军一体遵行不得违反。其中规定从六月一日起捕人杀人均要报请大军区批准，以昭慎重，望加注意。

# 中央转发华东局等 关于涡阳事件的电报的批语

(1951年5月19日)

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请你们检查所属各县中是否有像皖北涡阳县那样的严重现象<sup>[1]</sup>，如有，必须给以坚决的处理，否则是很危险的。兹将华东局，皖北区党委和阜阳地委关于涡阳事件的电报三件<sup>[2]</sup>发给你们参

---

[1] 指皖北区涡阳县党政机关内部混入反革命分子和存在不纯分子的严重问题。据中共阜阳地委统计，涡阳县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和不纯分子共83人，其中有血债、有罪恶的土匪、恶霸、特务及蒋伪分子有34人。

[2] 这三个电报是：中共阜阳地委1951年4月28日关于对涡阳县混入反革命分子处理情况给皖北区党委的报告；中共皖北区委1951年5月7日关于阜阳地委处理涡阳事件的意见给阜阳地委并报华东局的报告；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年5月15日关于处理涡阳事件给皖北区党委、山东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区党委并报中央的电报。华东局的电报指出：（一）对于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镇压的决心还不够，表现在对那些血债累累的土匪、恶霸、特务，未坚决处以死刑。（二）对于党内问题，亦应严肃处理。对直接包庇敌人的县长等，均应开除党籍，依法交公安机关审判。（三）在对此事件的处理中，注意总结经验，通报全党，进行教育。今后还应切实注意该地组织内部的审查工作。

考。我们认为华东局的意见是正确的。

中央

五月十九日

# 转发无锡市委关于组织民主人士 参加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 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19日)

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地委，县委：

使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工作要求一些具体形式。关于审查案卷方面，华东各地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组织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无锡实行的结果很好，各地都应仿照办理。实行这种办法，民主人士真正得到了学习机会，去掉了怀疑，和我党更加靠拢，我党也就更加主动了。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sup>[1]</sup>

(1951年5月20日)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的一部分。

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 中央关于印发清理“中层”“内层” 问题的指示的通知

(1951年5月21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省级军区，军分区，兵团及军师党委：

兹将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sup>[1]</sup>发给你们，请你们照此执行为要。

中央  
五月二十一日

---

[1] 指中共中央1951年5月21日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以便弄清情况，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提高我们组织的纯洁性。指示对清理的范围和重点，步骤和方法，对各类人员处理的政策，工作中注意防止的偏向，以及清理工作的领导问题，都作出了规定。

# 转发东北军区党委 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 和清理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5月21日)

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华北各大军区：

兹将东北军区五月十八日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sup>⑩</sup>发给你们参考。这是根据最近中央指示而规定的方针和办法，除时间一点外，各区均应当照此办理。

毛泽东  
五月廿一日

---

[1] 中共东北军区委员会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对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组织力量加强审讯工作，从审讯中证实已有材料，发现新的材料，弄清具体罪恶事实，然后按其问题轻重拟出名单、意见，实行分别处理，但严禁刑讯逼供。（二）对已有材料但尚不够逮捕条件的反革命分子及复杂分子，应继续收集材料，研究分析，如经查对证实，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调离重要部门，留部队继续审查，由军区集中劳动管训继续审查，或予以清洗的办法处理。（三）部队应进行一次有重点、有步骤、有对象的审查工作，把混入部队的各种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面目不清者弄清，以纯洁内部。

# 关于同意目前收兵休整致彭德怀<sup>[1]</sup>电

(1951年5月22日)

德怀同志，并告高岗<sup>[2]</sup>同志：

廿一日廿三时电<sup>[3]</sup>悉。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彭德怀1951年5月21日23时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第五次战役为时一个月，进行东西两线作战，部队有些疲劳，需恢复和总结战斗经验。战斗发起后，第一线运输极端困难，且雨季已接近开始，数江湖沼泽在我军之后，一旦山洪暴发，交通全断，顾虑甚大。此役未消灭美师团建制，敌夸大我之伤亡，还有北犯可能。根据上述，我军继续前进，不易消灭敌人，徒增困难，不如后撤，使主力休整，寻机歼敌。

# 中央批发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 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 决议的通知

(1951年5月22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地方军区，各级公安部门，及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党组：

兹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sup>[1]</sup>发给你们。中央批准这个决议，望你们遵照执行。

中共中央  
五月二十二日

---

[1]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1951年5月15日通过的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出，对反革命犯和普通犯人必须根据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并适应全国各项建设的需要，着手制订通盘计划，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凡有劳动条件的犯人，应一律强迫其参加。

# 转发上海市委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 扩大打击面的通报的批语

(1951年5月23日)

中南、华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中央局：

上海市委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意见<sup>[1]</sup>是正确的，  
请你们加以注意。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三日

---

[1] 中共上海市委1951年5月19日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通报中规定的几条意见是：（一）控诉会的控诉对象一律确定为被捕罪犯（并以罪大恶极的为主）。（二）控诉会不能变成斗争会，不能把打击面扩大到落后分子以及有关生活作风、思想观点方面。（三）控诉会不能在一个基层单位连续不断地召开。一般好好准备召开一次即可。如无具体控诉对象可不召开，以座谈讨论已破获的反革命案件等方法，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

# 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水平

(1951年5月23日)

谭政<sup>[1]</sup>同志：

五月十七日电悉。(一) 华南各军军事训练的方针<sup>[2]</sup>是正确的。(二) 希望你于秋季再去广州一次，检查各军的工作和海防工作。你去时最好再找一二个在朝鲜作战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同去广州，向干部们作报告，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三日

---

[1] 谭政，当时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指1951年5月17日谭政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华南各军军事训练的方针。报告说，考虑到我们现在的练兵是战略练兵，必须从精神上有所准备，即是趁敌人未来以前，集中时间将必须学的赶紧学好；以便有备无患。因此，就不宜按和平时期办法按步施教。军委训练部所订计划内容太多，且规定不能更改，如按其实施则时间很难集中，重要的课目没有充分足够时间去教，极易产生形式主义。鉴于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经验，在我军技术战术教练上着重某些方面训练是有必要的，不应按平隙时间和按操典程序施教。

# 转发武威地委关于召开反革命家属座谈会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2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地委县委：

武威的经验<sup>[1]</sup>很好，全国各县市均应这样做，争取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孤立尚未消灭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

五月廿三日

---

[1] 指中共甘肃省武威地委1951年5月3日报告中所说的关于武威专署公安处召集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开座谈会的经验。

# 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 协议宴会上的讲话

(1951年5月24日)



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图为双方代表在协议上签字。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

在，达赖喇嘛<sup>[1]</sup>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sup>[2]</sup>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宴会上致词。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生，青海湟中人，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2]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青海循化人，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汉藏文本。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宴会上。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宴会上。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和阿沛·阿旺晋美在宴会上。



1951年5月24日，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向毛泽东献礼。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和阿沛·阿旺晋美亲切交谈。

# 给达赖喇嘛<sup>[1]</sup>的信

(1951年5月24日)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sup>[2]</sup>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以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2] 阿沛·阿旺晋美（1910—2009），西藏拉萨人。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当时是西藏地方政府派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首席代表。

经武<sup>[1]</sup>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收纳！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

[1] 张经武（1906—1971），湖南酃县（今炎陵）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 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

(1951年5月25日)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sup>[1]</sup>已于本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字，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该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为此，特决定如下：

## 一、进军部署：

(一) 西南军区之十八军除留两个师（五十三师、五十四师）于甘孜、昌都地区担任修筑甘孜机场与甘孜、昌都段公路任务外，五十二师进军西藏任务不变。该师应以一个团进驻拉萨，两个团（缺一个营）进驻丁青、所乌<sup>[2]</sup>、嘉黎、太昭<sup>[3]</sup>地区，师部进驻太昭，另以一个营编成独立支队，由硕督<sup>[4]</sup>地区出发，沿雅鲁藏布江之工布地区西进，担任宣传与侦察任务。

(二) 西南军区之十四军一二六团应由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

(三) 西北军区之骑兵支队应由玉树进驻囊谦地区，并仍属西北军区建制。

(四) 西北军区由新疆准备入藏之部队，除先头部队继续侦察到达噶大克<sup>[5]</sup>的道路外，主力继续修通公路，以备随时入藏。

## 二、物资补给：

(一) 补给关系，除十八军与十四军入藏部队由西南军区负责补

给外，骑兵支队仍由西北军区负责补给。

(二) 粮食，除十四军一二六团与骑兵支队分由云南与西北军区负责补给外，十八军入藏所需之粮食应以组织牦牛、汽车等运输为主，并在当地收买一部，不足数则由西南空司负责组织空投及其他方法解决之。

(三) 修路：

A. 甘孜——昌都——丁青——所乌——太昭——拉萨公路由十八军负责抢修，力争于明年年底完成。

B. 西宁——黄河沿——玉树——囊谦——类乌齐——丁青公路由西北军区负责修筑，并将黄河沿——玉树——囊谦段继续修通。

C. 敦煌——柴达木——黑河<sup>161</sup>——拉萨线为我对西藏将来油料补给的预定路线，应由西北军区派人进行实地勘测。

(四) 机场，除十八军应迅速完成甘孜机场的修建任务外，并应在丁青一带选建一临时着陆场，在拉萨修建一普通机场。

三、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

四、各部接此训令后，应立即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并随时将准备情况报告军委。进军行动待军委进军命令颁布时实施之。

主席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1]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其要点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三、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四、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七、实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九、依据西藏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十、依据西藏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十一、西藏各项改革，中央不强迫。西藏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可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方法解决之。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2] 所鸟，当时是西康索克宗（县），今为西藏自治区索县。

[3] 太昭，旧县名，位于西藏中部，1960年改工布江达县。

[4] 硕督，旧县名，1960年并入西藏洛隆宗，改设洛隆县。

[5] 噶大克，即今噶尔雅沙，地名，位于西藏噶尔县东南。

[6] 黑河，旧县名，即今西藏那曲。

# 对美英军目前只宜打小歼灭战

(1951年5月26日)

德怀<sup>[1]</sup>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十六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适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以上请你考虑电告。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 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稿时加写和改写的话<sup>[1]</sup>

(1951年5月26日)

中央的这个政策<sup>[2]</sup>，不但对西藏是如此，对国内一切占少数的兄弟民族都是如此。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民族人民以及和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们自觉自愿地去进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强迫地去进行，而由汉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员生硬地强制地去进

---

[1] 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文字。毛泽东在审阅社论稿时，除加写和改写了这三段文字外，还在李维汉为送审社论和新闻稿给自己的报告上，写有以下批语：“这些可即动员一些人翻译藏文，校正勿误，连同协议和签字时的致词（藏文）印成一本，让他们带回去，并送十八军、西北在玉树区域的部队及王震入藏部队。”

[2] 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的“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行，那就只会引起民族反感，达不到改革的目的。

二

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这不但是为和解藏族内部过去不和睦的双方，也为使国内各民族对藏族领袖引起必要的尊重。

三

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如果这些部队和工作人员中有违反民族政策和协议的行为，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则有批评的权利和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反映和报告的权利。这个原则，不但对藏族是如此，对一切兄弟民族都是如此。

# 给章士钊<sup>[1]</sup>的信

(1951年5月26日)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列席全国委员会会议人员的名单昨已确定，其中没有香港方面的人，与尊旨尚无不合。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

海棠诗收到，谨谢厚意。

---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 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歼敌<sup>[1]</sup>

(1951年5月27日)

甲、志愿军总的政治任务是轮番作战，消灭美英军九个师（几个杂牌旅营全计在内），则可解决朝鲜问题。打法上同意彭总<sup>[2]</sup>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一个营为目标。一次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三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如能提前于夏秋两季达到削弱敌人目的，即可于冬季打大仗，求得一次大量歼灭敌人。

乙、应加强政治工作，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但同时应指出胜利条件，强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丙、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

---

[1]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整理的毛泽东指示要点的一部分。毛泽东1951年5月27日在听取解方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关于朝鲜战场情况的汇报后，对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作出指示。解方于当日整理毛泽东的指示，并电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

[2] 彭总，指彭德怀。

高效率”的原则。兵团最好取消，加强志司<sup>[1]</sup>与军（陈赓同志也同意这个方案），变为精干指挥所也可以。每军建制增加一个师，减掉三至四个军直，以加强新兵训练，军后勤机构则可抽出一部充实后勤。具体方案请彭总提出。

丁、入朝部队六个月左右换班，调到朝鲜北部或我国东北、华北休整三个月左右，再参加作战。西南第三番三个军已到华北，干部太缺，短期内不能出动。杨兵团<sup>[2]</sup>两个军已准备好可随时出动。

戊、除注意建设与加速空军出动外，目前重点是加强反战车武器与防空武器，部队则应大力提倡打战车，打飞机。

---

[1]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2] 杨兵团，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杨成武任兵团司令员。

# 关于华东各城市收回 捕杀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 致饶漱石<sup>[1]</sup>电

(1951年5月28日)

漱石同志：

五月十一日报告收到。同意你的各项意见。华东各城市的反革命分子应当再逮捕几批，到逮捕干净时为止。各城市的捕杀批准权，如你认为有必要，可以推迟一个月到七月一日再收回至上一级，以利继续捕杀。此外请注意你自己及各级主要负责人的安全防卫。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 为陈永康题词<sup>[1]</sup>

(1951年5月28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1] 1951年5月28日，毛泽东亲笔为苏州金阊小学一年级学生陈永康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制作锦旗赠送给陈永康，同时向全国青少年发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号召。



1951年6月1日，少先队员代表向毛泽东献礼。



1951年6月1日，毛泽东和孩子们在一起。



1951年6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和李敏及其同学亲切交谈。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年画)

# 关于同意阻敌和兵力调动计划 致彭德怀<sup>[1]</sup>电

(1951年5月31日)

德怀同志，并告高<sup>[2]</sup>：

各电均悉。（一）你令各军坚决阻止敌人于金化、铁原、朔宁一线及其以南地带的计划，将四十二军主力调至伊川以东地区、将四十七军调至南川新幕地区的计划，都是很对的，望坚决执行。（二）杨成武两个军可即调动入朝，以一个军代替四十七军修飞机场兼顾海防，以一个军代替四十二军防卫元山方向的可能登陆。（三）为防止伪首都师由襄阳向北窜扰元山，必须使用一个有战斗力的师于高城通川之线，人民军有此力量否？（四）六十军一八〇师的情况<sup>[3]</sup>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五月卅一日二时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该部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中，因处置失当，被敌机械化部队包围于芝岩里地区，遭受了严重损失。

# 转发邓子恢<sup>[1]</sup> 关于城市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31日)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sup>[2]</sup>同志，并转各省市区委：

兹将邓子恢同志关于城市工作的意见<sup>[3]</sup>发给你们参考。工厂中，矿山中，码头上，街道上，必须发动群众对于素来欺压和剥削群众的反动分子举行坚决的斗争，分清敌我界线，给予这些反动分子以必要的打击，最严重者予以处决，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加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邓子恢1951年5月16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城市工作的意见主要是：在工厂矿山中，必须下决心用全力发动工人进行民主改革运动，以此来清扫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下层封建基础。只有经过这一段运动，工矿才能成为人民的新企业，才能有大发展前途。在街道中也应经过一段群众的民主改革运动，才能肃清城市中的封建特务势力，肃清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在城市中的下层基础，使城市真正成为人民的城市。

以注意。

毛泽东

五月卅一日

# 对薄一波<sup>[1]</sup>报批的关于购棉储棉工作 给各中央局的电报等文稿的批语

(1951年5月31日)

一波同志：

(一) 给各中央局的电报<sup>[2]</sup>已批发；(二) 中央的公开通知<sup>[3]</sup>退返还你，请添上政务院发布指示<sup>[4]</sup>的时间，连同指示送新华社发表；(三) 农业税是否增加及是否号召捐献问题，还须等几天中央才能召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2] 指为发布政务院购棉储棉指示给各中央局负责同志说明情况的电报。

[3] 指中共中央1951年6月1日为保证政务院指示中提出的购棉储棉任务胜利完成给各级党委的通知。此通知当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4] 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1951年6月1日发布的政务院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我国棉花产量供不应求，棉农存棉不肯出售，造成纱厂因原料供应困难开始停工的情况。指出：此种情况，如不设法改变，将影响到全国军民衣着的供应和物价的稳定，影响到战争和全国多数人民的利益，因此必须在全国棉农中开展一个爱国主义的售棉、储棉运动，劝告有棉花的农民在合理牌价下将存棉立即卖给国家，作为农民对于国家一种重要贡献的爱国表示。同时，国家贸易公司、合作社则应规定合理牌价，收购棉农的棉花，合作社、人民银行则应以有利于棉农的储蓄办法，吸收棉农的实物储蓄或折价储蓄。实行坚决的公私兼顾政策。这个指示亦在当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对薄一波报批的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给各中央局的电报等文稿的批语  
集会议讨论。

毛泽东  
五月卅一日

# 询问我军阵地构筑和防守情况

(1951年5月31日)

德怀<sup>[1]</sup>同志：

请答复下列问题：（一）杨口、华川、涟川之线以北，文登里<sup>[2]</sup>、金化、铁原、朔宁<sup>[3]</sup>之线以南地带过去所筑阵地坚固程度如何，我军扼守此线不让敌进，而于该线寻机多打小歼灭战，以求逐步削弱敌人，可能性如何？（二）你是否正在部署在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之线以北，金城<sup>[4]</sup>、平康、伊川、南川店之线以南地带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扼守该线的可能性如何？（三）四十二军在阳德地区，四十军在沙里院地区做了工事否？

毛泽东

五月卅一日廿二时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文登里，位于江原道（南）杨口郡中部。

[3] 朔宁，位于江原道（南）铁原郡西南。

[4] 金城，位于江原道金化郡东北。

# 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

(1951年6月1日)

德怀<sup>[1]</sup>同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军反坦克武器和反坦克部队的问题。听说近来敌人的坦克增多了，我军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足以征服敌人的大量坦克，才能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的步兵。你对此事有何意见，我军现在配备的反坦克武器是否够用，哪些武器最有用，每团是否应配备一个专门的反坦连，望告。

毛泽东  
六月一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中央转发云南省委关于初步整顿党组织的决定的批语

(1951年6月1日)

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并告西南局：

兹将云南省委关于初步整顿党的组织的决定<sup>[1]</sup>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凡新区有与云南情况相同或有某些相同之处者，可以参考这个决定，整顿那里的党的组织。

中央  
六月一日

---

[1] 中共云南省委1951年5月21日关于初步整顿党组织的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调整主要骨干和培养干部。所有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一律由经过土改、三查、整党锻炼的外来干部担任。原地方干部参加领导，有的须重新调整和分配工作，将他们放到群众斗争中去锻炼提高。同时把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积极分子逐渐培养和提拔成为党的各种工作干部。凡地主富农出身和与地富关系密切的干部，必须坚决调离本地。（二）教育干部。在党内以各种方式（包括整风学习、工作总结等）认真进行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党的整体观念的教育，党纲党章的教育，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掌握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水平。（三）审查干部。首先在党内划清敌我界限，把坏分子立即清洗出党。（四）整顿支部。目前先按照支部不同情况，分为继续活动、停止活动、解散三种处理。

# 中央转发武汉市委关于 汉口特务纵火事件报告的批语

(1951年6月2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

汉口特务纵火，毁房二千余间，受灾一万余人，这一严重事故，一切城市均应引起注意，应组织群众防特放火，在开群众大会时尤须严防。零陵和汉口两次特务放火事件，应引起一切城市的注意。

中央  
六月二日

# 关于三兵团休整和接防问题致彭德怀<sup>[1]</sup>电

(1951年6月2日)

德怀同志：

六月一日电收到。三兵团在阻击任务完成后撤至谷山地区整补，恢复元气，很有必要。但三兵团在华川至涟川一线阵地的防御任务极为重要，须有别部担负，是否由九兵团接防。

毛泽东

六月二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抗美援朝期间，国内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图为国内人民正在为前线捐款。



抗美援朝期间，国内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图为国内人民正在为前线捐赠物品。

# 提高斗志停止敌进稳定局面

(1951年6月2日)

德怀<sup>[1]</sup>同志：

(一) 金日成同志六月三日晚可到北京，他可能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因此你准备给金雄<sup>[2]</sup>同志的电报请暂时不要发出（此电也还须作部分的修改）。（二）看了志政六月一日二十时对目前政治工作的指示电<sup>[3]</sup>及三兵团政治部五月三十一日给十五军及六十军政治部的指示电<sup>[4]</sup>，这两个文件均很好。目前提高斗志，停止敌进，稳定局面，极为重要。（三）三兵团政治部的电报里说，“担任阻击的部队必须彻底地把休整的思想转变过来，认识阻击的意义”。这样指出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金雄，当时任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官。

[3] 指1951年6月1日20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关于目前政治工作的指示电。电报说：“目前政治工作的紧急任务，是如何将各级干部动员起来，以坚定的战斗意志，转危为安的毅力，坚决对敌斗争。要说明敌人这次进攻完全是一种冒险行动，是试探性的，我们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敌人是胆怯的，切不要被敌人的虚张声势所迷惑。事实证明，凡是我军采取了坚决的抗击，不仅保持了阵地，并给敌人很大的杀伤，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各级政治机关应召集紧急会议，号召全体干部同志发挥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带领战士，勇敢机智地打击和歼灭敌人，把暂时不利的局面转为完全有利。”

[4]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政治部1951年5月31日关于阻击作战动员工作的指示电。

很有必要。因此三兵团似应分为两种部队，一种是战斗力没有破坏或没有很大破坏的部队，留在前线担任阻击，继续作战，打些小胜仗，振奋士气，锻炼自己。一种是战斗力有很大破坏的部队，这必须调至谷山地区整补，以备再战。十九兵团则主力应留在前线作战，一部分残破部队则开至近后方整补。又志司五月二十七日的新兵分配数字，十九兵团占五万余人，三兵团只有几千人，是否须根据三兵团近日减员情况有所调整。

毛泽东

六月二日二十三时

# 关于处理涉及重要民主人士 及其戚友的案件的批语

(1951年6月3日)

罗瑞卿<sup>[1]</sup>同志：

凡关涉重要民主人士及其戚友的案件，只收集材料，不忙处理。

毛泽东

六月三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 准备粉碎正面之敌及侧面登陆之敌

(1951年6月4日)

德怀<sup>[1]</sup>同志：

据国民党方面五月三十一日东京情报称“联军将从东线向西北推进。自元山起，至开城止一斜线，压迫共军撤至平壤之北。可能另组元山登陆部队，以促成共军提早放弃临津江以东地区”等语。此种阴谋应肯定是真实的。我全军应振奋精神，加速准备，粉碎正面之敌及从侧面登陆之敌。

毛泽东  
六月四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在审阅《人民日报》关于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的社论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1951年6月6日)

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

# 关于修筑进藏公路的批语<sup>[1]</sup>

(1951年6月8日)

聂<sup>[2]</sup>:

是否有钱修这些路，请与陈云<sup>[3]</sup>同志商酌，可缓者应一律从缓。

毛泽东

六月八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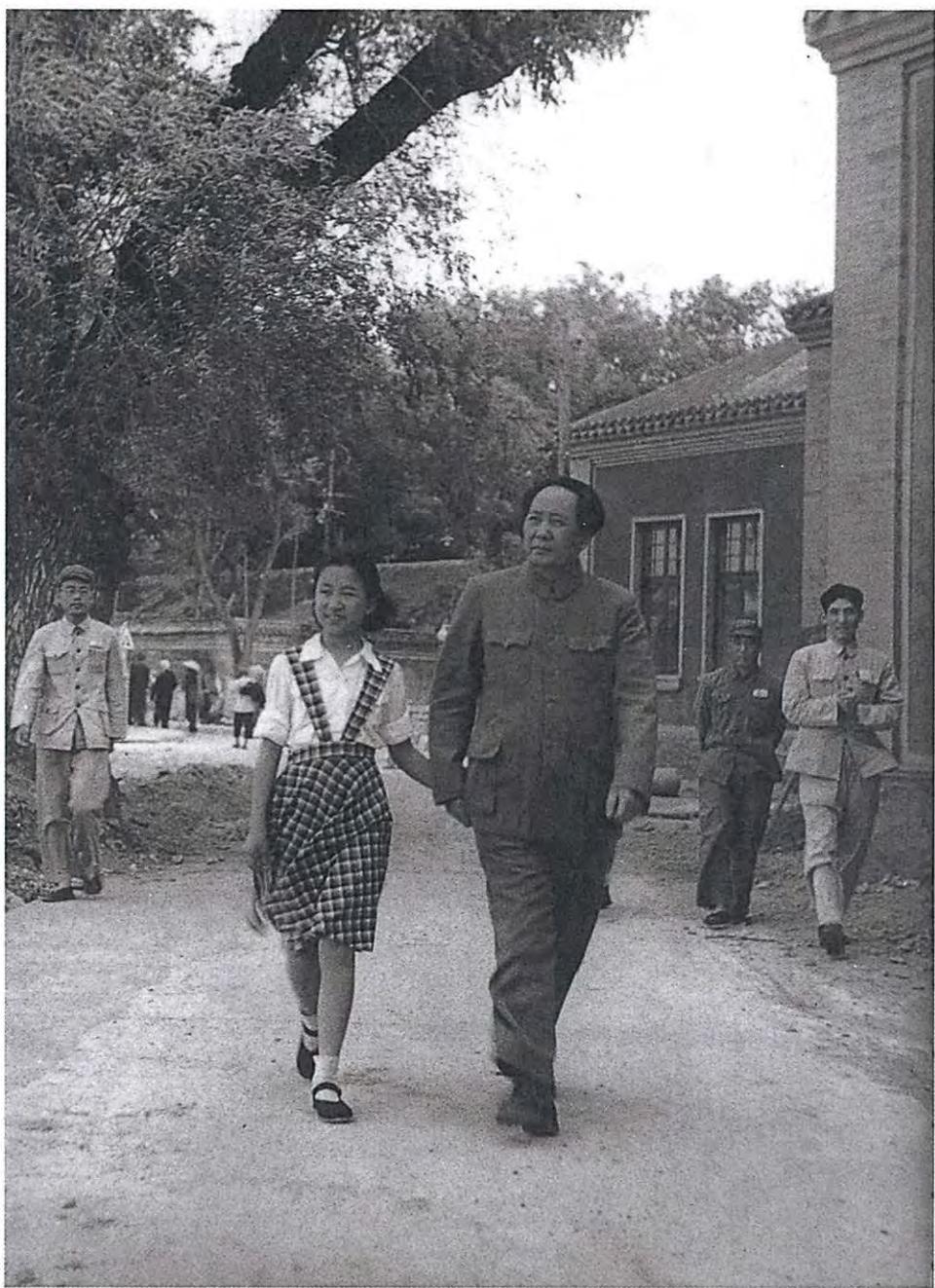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张宗逊（第一副司令员）、甘泗淇（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揆要（参谋长）1951年6月7日给军委并报西北局的电报上的批语。张宗逊等在电报中谈到进军西藏的军事部署、补给、修筑道路等问题，提出：（一）建议今年继续修通张掖至西宁公路（360公里），以便于油料的补给。（二）立即准备1952年春开工修筑的黄河沿至玉树公路。（三）立即着手分段勘测玉树至囊谦及敦煌经柴达木、唐古拉山口、黑河至拉萨线。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3]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1951年，毛泽东和孩子们在观赏荷花。



1951年6月，毛泽东和李讷在中南海。



1951年6月，毛泽东和李敏在中南海划船。



1951年，毛泽东和李敏、李讷在北京香山。



1951年，毛泽东和李敏一起看影集。



1951年，毛泽东和李讷一起看影集。



1951年7月，毛泽东和李讷在北京香山寺。

# 六七两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

(1951年6月11日)

德怀同志：

(一) 你六月四日二十时给金雄同志的电报<sup>[1]</sup>指示甚好，有了这个指示，你五月三十一日给金雄的指示草稿可以不发了。(二) 已和金日成同志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八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三) 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你意如何盼告。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四时

[1] 指1951年6月4日20时彭德怀给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官金雄的电报。电报说：“敌人在各线的进攻虽已被阻，但估计敌人仍会拼命前进。我军为缩短供应运输线，争取反攻的准备时间，以及增加敌之困难和削弱其战斗力，在东线地区还须向后收缩一段为有利。因此，必须动员这一地区的党政军民坚持对敌斗争，设法配合我军正面阻击，以逐渐削弱与疲劳敌人。”

# 为了解敌占金化、铁原后的动态 及我军部署致彭德怀<sup>[1]</sup>电

(1951年6月13日)

德怀同志：

(一) 敌占金化铁原后，动态如何，我军能否在该线至金城平康兔山线之间阻住敌人，我军部署如何，极念。(二) 已令邓华<sup>[2]</sup>同志及其他四同志于十五日动身回前方，中央各项重要决定由邓面告。

毛泽东  
六月十三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 转发华北局关于通县传达 贯彻“死缓”政策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6月1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

河北省通县反映的情况值得注意。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 在华南分局关于叶剑英<sup>[1]</sup>患病的 电报上的批语

(1951年6月16日)

尚昆<sup>[2]</sup>同志：

请查询广州是否有高明的医生及剑英病情告我。

毛泽东

六月十六日

---

[1]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 对民主德国举行 “德中友好月”的感谢电

(1951年6月18日)

德国统一社会党转政治局

威廉·皮克同志和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行“德中友好月”，并承来电祝贺，至深感谢。谨向伟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创造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皮克同志和乌布利希同志致敬，谨向光荣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和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德国人民致敬。中德人民友好万岁！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八日

# 转发华东局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整理“中层”的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1年6月19日)

这是一次二万七千多人的大规模的审查经验<sup>[1]</sup>，很值得各地研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年6月13日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整理“中层”的情况及经验给山东分局、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军政委员会整理“中层”的工作，是从4月5日开始的。基本方针为学习文件，开展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在策略上严格划清敌我及内外界限，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打击反动的首要分子，并严防“逼供信”的现象发生。现全部过程虽尚未完全结束，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已普遍展开。总计参加此次学习的人数，共有27302人。整个学习过程，大体上分作学习镇反文件、审查登记、开展坦白运动和审查调处四个阶段。报告说，整理“中层”的工作，是一件很复杂、细致的工作，领导上除了掌握每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特点及其相互关联，还必须充分注意下列几点：（一）必须在既定方针下采取抽丝剥茧、逐步推进的方法，即由一般学习到个人坦白，一般的填表登记到对反动党团特务及反革命武器证件的清查。（二）学习目的必须明确，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必须分清。对反革命分子也要分清罪大罪小，并反复说明人民政府的政策。（三）一切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必须适当照顾统一战线的特点。学委会应吸收有地位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参加，除党的机密外，一般带重要性的问题，应在学委会讨论，并经常与党外人士商量。（四）各部门必须做到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学习。（五）对坦白分子应根据自觉自愿原则，防止任何形式的“逼供信”的做法。（六）选择与培养典型，组织示范是坦白运动的有效方法之一。典型报告之后，应即普遍掀起坦白热潮。

转发华东局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整理“中层”的经验报告的批语

究仿行。请各中央局阅后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

# 转发华北局关于山西省直属机关 审干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6月19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地委：

兹将山西省直属机关六月七日审干情况的报告<sup>[1]</sup>发给你们，这是一个极好的经验，请你们仿行。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6月18日转报的山西省直属机关一周审干情况报告。报告谈到山西省直机关审干运动的几点经验：一、加强对小组长的具体领导，更多地了解小组长的疑难问题，帮助小组长做好每个人的思想工作。二、放手使用积极分子，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培养与锻炼。对积极分子的条件要求不能过高。对积极分子除思想教育外，必须经常分配给他们适当的工作。通过他们联系一批新干部，打破领导上的闭塞情况。三、选择坦白较好的作典型报告，并让大家来评判其彻底与否，这样做对大家的启发作用大。

# 关于抓紧镇反和清理工作致陈毅<sup>[1]</sup>电

(1951年6月19日)

陈毅同志：

看了几个你们属下的镇反工作报告及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证明华东军区系统内的镇反和清理工作，业已活跃起来了，甚好甚慰。望你抓紧这个问题，贯彻到底，务达纯洁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惟各单位的报告和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发给我们备案即可，不必要求我们每件再作指示，以免延迟时间。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 在胡乔木<sup>[1]</sup>关于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 几处提法的请示信上的批语<sup>[2]</sup>

(1951年6月21日)

主席：

“三十年”<sup>[3]</sup>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一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括号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文字是毛泽东的批语。

[3] 即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这样好。）

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是十二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

二十一日

# 请苏联提供六十个师装备 并在六个月内运至中国<sup>[1]</sup>

(1951年6月21日)

菲利波夫<sup>[2]</sup>同志：

(一) 高岗<sup>[3]</sup>同志回来传达你的各项意见，我认为都是正确的，应当这样做。其中，关于种植橡胶树的问题，我们准备立即开始筹划，希望苏联政府派遣代表来帮助我们进行这项筹划。

(二) 我军在朝鲜作战八个月来，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和急于改善我军装备的必要。曾由高岗同志向你请求六十个师的装备，已蒙允诺。这是我军在朝鲜战场今年内至低的要求。据高岗同志回称，你认为我们的要求对于每个师的装备还不够强，提议每师须配备坦克，增加炮火。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帝国主义作战所必需的，我已电徐向前<sup>[4]</sup>同志完全照你们的意见具体商谈。

(三) 据徐向前来电称，他已与苏总参谋部初步商谈，认为六十

---

[1] 这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2]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3]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徐向前，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

个师照苏总参谋部所提的编制意见，今年只能运来十六个师（内含朝鲜三个师），其余四十四个师须待明年至后年才能陆续运到，这样就使得朝鲜战场的需要与时间发生矛盾。

（四）为适应朝鲜战场的急需，我请你考虑照高岗交给徐向前办理的订货单，将六十个师的步兵武器及各种火炮、坦克、飞机、汽车及汽车零件和各种汽油药品等武器和器材，能于今年七月间开始，到今年年底运完，每月运六分之一，使朝鲜战场各师团暂照现行编制得到补充，以利战局。

（五）如能照我们的订单将武器于今年全部运来的话，按照苏总参谋部所提新编制的标准尚不足的武器，可于明年继续运来。同时，我们亦可根据运输武器的状况陆续抽调若干师团进行改编，逐渐地使六十个师按新编制装备起来。

（六）由于我们的订单的提出迟缓了三个月，误事甚大，而今天我又突然向你提出这样大的数目和在六个月内运到中国的要求，这会使你感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运输的问题不知能否做到？

请你按照可能的条件办理就好了。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 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 可能成为我军现代化的骨干<sup>[1]</sup>

(1951年6月21日)

徐向前同志：

六月十六日及十九日的来电均收到了，所提各问题分答如下：

(一) 高岗<sup>[2]</sup>同志交给你办理的军事订单是朝鲜战场今年内所必需的和至低的要求，因为朝鲜战场敌人各种火力的强大，使我军各种武器的损坏和损失甚大，不断需要补充，加上自参战以来到今年底，我们动员了一百一十万新兵，这些新兵都需要武器训练和带上武器上前线，这是与过去国内战争大不相同的。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请求苏联政府将订单中各种武器能于七月开始分批运来，每月运六分之一，年底运完，使朝鲜战场我军能暂照现行编制不断得到补充。

(二) 苏总参谋部所提的编制意见，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具体编制意见，

---

[1] 这是毛泽东给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徐向前的电报。此电同时发给斯大林。

[2]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可由张清化<sup>[1]</sup>送回再予以研究。唯在进行改编时，必须适合朝鲜战场的要求，照你的来电称今年只能来十三个师的装备，其余须待明后年才能陆续运到，这就使朝鲜战场上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故我已电菲利波夫<sup>[2]</sup>同志，请求他考虑将订单中的各种武器和器材按时运来，如（一）项所述。至于按照苏方所提编制的标准尚不足的武器则可于明年陆续运来。视武器运输的状况陆续抽调若干师团进行改编，逐步完成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此点望与苏总参谋部切实商讨。

（三）我们订货的目的既如上述（朝鲜战场的急需）则与我兵工生产毫无矛盾。你们代表团关于兵工生产问题继续商谈时可按苏总参谋部提出的编制意见作为根据，唯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可能成为我军首先现代化的骨干，而我整个国防军原拟定为一百八十个师，因之我们的兵工生产是为装备这样一个数目的，并应当于三年到五年内完成之。

（四）当然，我们的要求能否办到，要按照运输的可能条件。这点苏联同志会切实计算的。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一日

---

[1] 张清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

[2]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1951年5月25日，徐向前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即赴苏联访问。图为毛泽东在为徐向前饯行。

# 给李烛尘<sup>[1]</sup>的信

(1951年6月23日)

烛尘先生：

六月十三日给我的信收到了。您的提议<sup>[2]</sup>很好。惟时机值得考虑，似以等待一个时期再去进行为宜。此复，顺致  
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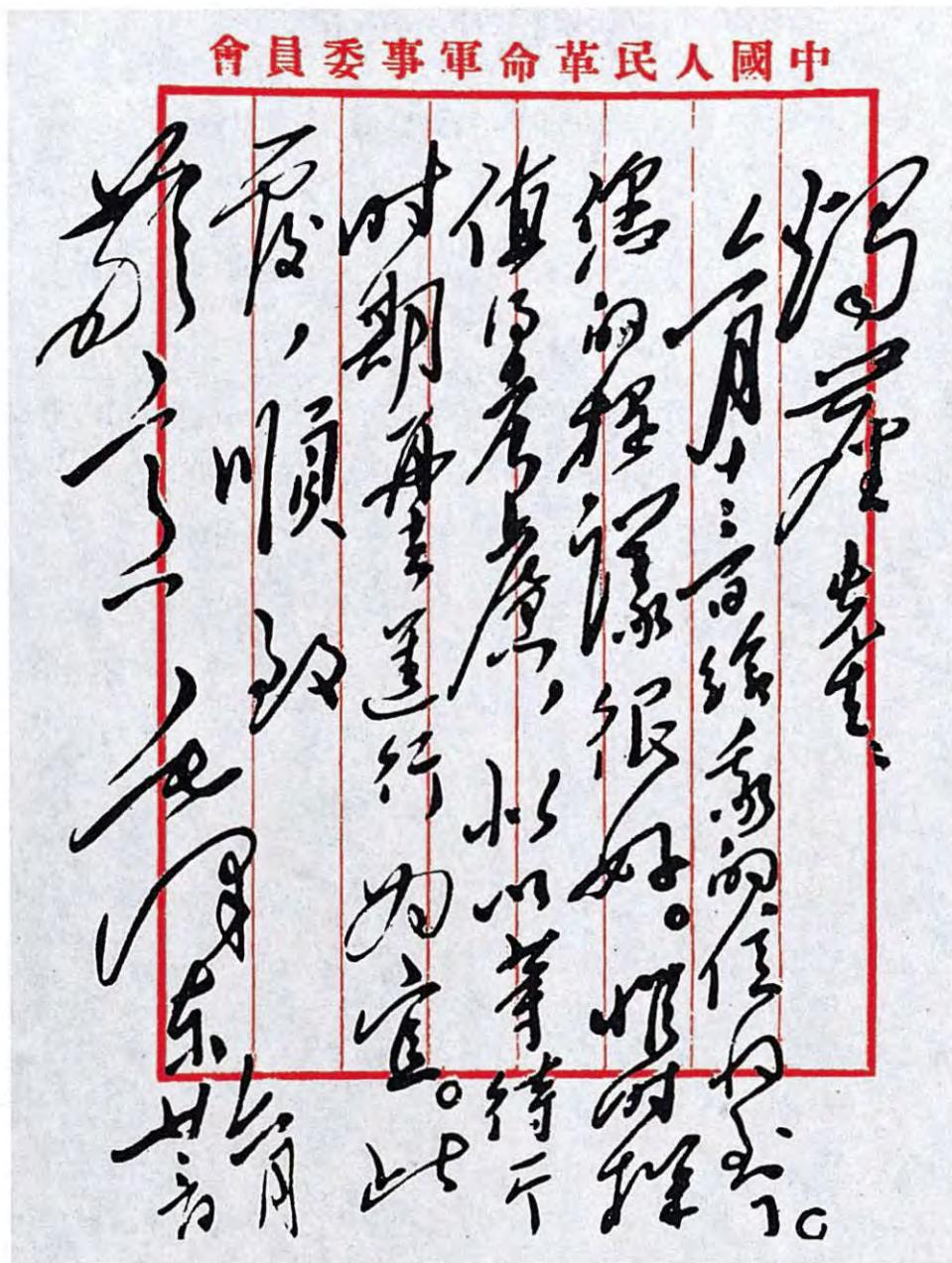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三日

---

[1] 李烛尘，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会长委员。

[2] 指李烛尘在1951年6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过去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人士开展对台湾的宣传活动的建议。



毛泽东致李烛尘信的手稿。

# 给李介侯的信

(1951年6月23日)

介侯兄：

李君<sup>[1]</sup>有空军技术，可持此信去空军领导机关试行接洽，看可以收录否？因我不明李君的政治经历，要他自己向空军部门去说明一切。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三日

---

[1] 李君，指李启炽，湖南韶山市杨林乡纯和村人。曾到美国学习飞行，1948年脱离国民党空军回乡。李介侯在1951年6月18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李启炽有“空军技术”，请“给予学习机会”。

# 空军应抓紧做好参战准备<sup>[1]</sup>

(1951年6月24日、27日)

—

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同志：

六月二十三日你们给我的报告收到了。我同意你们这个计划。望你们按此计划进行切实的准备工作，以便九月实行作战，是为至要。

毛泽东

六月二十四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参谋长王秉璋的电报。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6月27日报告的批语。

二

同意<sup>lll</sup>，请即抓紧办理。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七日

---

[1] 聂荣臻的报告说：“关于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今日下午召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李涛等同志研究后，特请示如下：（一）现在空军参战部队由五个师增至十一个师后，必须提出紧急订货，拟由空军派一负责同志到莫斯科专办此事，不然空军出动即无保证。（二）原平壤以北为友方（苏联）所修的四个机场，尚差四十二万三千工。现第六十七军第二〇一师要归建，除已令第五十军第一五〇师于二十五日出发接替外，为了争取时间（一个师须四十五天方能完工），拟令现在安东的第五十军军部带第一四九师前往加强，争取七月份完工；安东地区防务则由东北军区负责调整。在我空军增加六个师参战的情况下，平壤及其以南的喷气式机场已不够用，必须增修二至三个机场才行。建议用周总理名义电金首相解决。”

# 中央转发罗瑞卿<sup>[1]</sup>关于 犯人参加生产建设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6月2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并告中财委及中公部：

中央批准罗瑞卿同志六月二十四日的报告<sup>[2]</sup>，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按此报告所提处理犯人参加生产的方法办理，并迅速执行为要。

中央  
六月二十五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指罗瑞卿1951年6月24日关于劳改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汇报了劳改会议决定的犯人参加水利、铁路、公路等生产建设的办法。

# 中央转发华北局镇反工作指示的批语

(1951年6月2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中央完全同意华北局六月二十四日给各省的指示<sup>[1]</sup>，请你们注意此项问题，并照华北的办法处理之。

中央

六月二十五日

---

[1]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给各省委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在传达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曾引起一部分群众以至中下级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其根本原因，一是传达不深入，简单从事。二是一部分党的领导机关不重视中央公安会议的决议，也不审慎地研究当地当时具体情况，盲目办事。如有的县本来已决定杀掉而又完全应该杀的人，也因收缩杀人权而停止下来。为纠正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上述偏向，各级党委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第三次公安会议的决议，有计划地召开各种会议传达、讲解公安会议的精神，务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以鼓舞广大群众镇反的信心和勇气，巩固并发展镇反成果。同时由于各县区镇反工作发展不平衡，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力量，一个县、一个区、一个村地去具体检查，具体研究。检查的最好方法就是召开各级的代表会议。

# 在符定一来信<sup>[1]</sup>上的批语

(1951年6月26日)

请齐燕铭<sup>[2]</sup>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毛泽东

六月廿六日

---

[1] 符定一，文字学家。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长，毛泽东在那里读过书。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筹备情况并催促批准成立，以解决一些旅京老人的生计困难，还提出如迟延开办则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

[2] 齐燕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 请会商朝鲜和平谈判准备问题<sup>[1]</sup>

(1951年6月29日)

金日成同志，并告彭德怀<sup>[2]</sup>同志：

六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认为一方面，人民军和志愿军应当积极注意作战，不使敌人乘机获逞。另方面，你们两人应当马上会商一次，就和平谈判问题加以考虑，准备派出适当的谈判代表，并以你们考虑的意见和谈判代表的人选告我。至于假如李奇微<sup>[3]</sup>提出要求谈判的时候如何回答的问题，可在李奇微提出要求时再行考虑回答的内容和措词。

兹将葛罗米柯<sup>[4]</sup>同志与美国驻苏大使寇克的谈话要点，发给你们，请加研究。

毛泽东

六月二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4] 葛罗米柯，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



1951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朝鲜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内阁首相金日成。

#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等问题

(1951年6月29日)

菲利波夫<sup>[1]</sup>同志：

(一) 您在六月二十五日和六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两次电报均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第一，关于六十个师的装备的交货时间，只应当按照苏联的生产和运输的可能条件去规定，即是说在三年内完成六十个师的订货，而在一九五一年内完成十个师的订货。第二，您提出的那个中国现代步兵师的编制表，很好，就照这个编制表办事。中国军队有了按照这个编制表装备起来的六十个步兵师，就较现在的军队要强得多了。

(二) 马立克的演说<sup>[2]</sup>，使我们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取得了主动。六月二十八日，我接到了罗申<sup>[3]</sup>同志交来的关于葛罗米柯<sup>[4]</sup>同志与美

---

[1]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2]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1951年6月23日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其中提出：“苏联人民认为，维护和平的事业是可能的，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3] 罗申，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4] 葛罗米柯，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

国驻苏大使寇克的谈话要点，并在文尾说：每一方只有二人参加，并且这些代表应该是各有关部队指挥部的代表而不应该是政府的代表。这样，在中国方面是以志愿部队的代表身份参加这个谈判，而不使中国以交战国身份去参加。我认为这样做是很适当的。

本日金日成<sup>[1]</sup>同志来电询问，假如李奇微<sup>[2]</sup>要求会谈，应如何答复。我已电告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sup>[3]</sup>同志，一方面积极注意作战，不使敌人得逞；另方面，要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会商一次，准备在敌人要求谈判时，派出适当的谈判代表。至于如何回答李奇微的问题，要待接到李奇微要求时再行考虑回答的内容和措词。您对此事有何意见？假如谈判真能举行的话，很需要您密切地指导这次谈判，以免上敌人的当。

金日成同志的电报附上，供您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

[1]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2]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3]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时间地点等事宜<sup>[1]</sup>

(1951年6月30日)

菲利波夫<sup>[2]</sup>同志：

敌军司令官李奇微<sup>[3]</sup>，已于本日发表通知，建议在元山港内一个丹麦船上由交战双方的代表举行关于停战的会议。并称，必须有适当的保证，方能实行停战。关于此事，有几点请您考虑示复，并请您直接通知金日成<sup>[4]</sup>同志：

(一) 金日成同志似应于七月二日或七月三日发表答复李奇微的通知，在此通知内说明：同意举行双方代表谈判停战的会议，并建议会谈的时间、地点和代表人数。

(二) 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内。查此港是北朝鲜的设防海港，敌军正阴谋于此登陆，似不宜同意在此港开会，可否建议以三八线上的开城为会议地点。

(三) 为使我方代表对于会谈内容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似宜建议以七月十五日为开会日期。

(四) 因为时间迫促与会议的重要性，我建议，请您直接与金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2]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3]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4]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成同志通讯，密切地指导此次会议，同时将您的意见告知我们就行了。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十四时

# 停战谈判代表以朝鲜人民军为主<sup>[1]</sup>

(1951年6月30日)

金日成同志，并彭德怀<sup>[2]</sup>同志：

(一) 本日我给菲利波夫<sup>[3]</sup>同志电报一份，兹同时发给你们参阅，大约明天（七月一号）可能得到菲利波夫同志的复电。(二) 请你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的资格，准备于七月二日或三日发表一个回答李奇微<sup>[4]</sup>的声明。(三) 因为时间紧迫和会议的重要性，我已要求菲利波夫同志直接和你通讯，密切指导此次会议，请你也经常和菲利波夫同志联络，有问题时直接向他请示。(四) 此次谈判，是以你的代表为主，中国志愿军的代表为辅，因此请你对于为了使此次谈判获得较良结果的各项内容和方法加以考虑和准备。(五) 你和彭德怀同志会谈的时间，可在对李奇微的通知发表回答以后，择定一天举行。我这里准备派我们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sup>[5]</sup>同志及其助手，于七月二日由北京动身，七月五日可到彭德怀同志那里，和你及彭商量并帮助此次谈判事宜。他是在内部帮助你们的，不公开出面。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4]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5]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六) 你的意见盼告。

毛泽东

六月三十日下午五时

# 在审阅杨耳<sup>[1]</sup>《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

(1951年6月)

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被那些举人、进士们掌握的学堂也决不会容许真正的穷孩子插足进去。武训的“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钱是残酷地括来的。一是强要来的，武训是一个以吃五毒威胁善良人民逼其出钱的恶丐；二是放高利贷（利息三分）；三是倚仗官势募捐。这三种钱的来源都是不正当的。所办之学，并不是所谓为了“穷孩子”，“为穷孩子”只是一句空话，实际是为富孩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会相信武训的“义”学里好像真有一群“穷孩子”在那里跳来跳去似的。

现在，姑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假定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此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

---

[1] 杨耳，即许立群，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当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根本问题了。

二

武训只是在他未提出“义”学口号以前受过苦，自从他提出“义”学这个漂亮动人的口号以后，他就一天一天被人尊敬，直至变为反动政府的宠儿，他就越行乞越有劲，一点也没有什么苦了。<sup>[1]</sup>

三

你看，武训装得很像，他懂得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他越装得像，就越能获得些举人进士的欢心，他就越有名声。他已经很富了，还是要行乞。他越行乞，就越有名声，也就越富。武训是一个富有机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被他骗过。旧的反动著作家则将武训的骗术有意描写为“美谈”，武训的“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这件事，在“清史稿”武训传中也是大书特书的。

---

[1] 杨耳的文章中谈到，“穷人不识字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呢？不是从争取到穷孩子能够读书的社会基本条件入手，而是以武训那样的‘苦行’，磕头讨钱去兴办‘义’学”。毛泽东审阅此稿时，在“苦行”后面加括号写了这段文字。

# 对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总结部署 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6月)

## 一

在报告<sup>[1]</sup>说到“土改斗争、反霸、退租、退押斗争中逮捕地主恶霸的批准权是否要作另外的规定”处，毛泽东写有：（土改中逮捕地主恶霸的批准权应照今年春季土改时的办法去做——毛注）

## 二

在报告说到“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十年以上徒刑的犯人，均须进行室内劳改，不得置于室外”处，毛泽东写有：（此条请各地斟酌办理，如有良好管理，有些这类犯人亦可置于室外——毛注）

---

[1] 指中共江西省委1951年6月8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总结部署镇反工作等情况给区党委，南昌市委，各地委，并报中南局、中央，毛泽东的报告。

# 多打小规模的歼灭仗<sup>[1]</sup>

(1951年6月)

在目前，多打小规模的歼灭仗，削弱敌人，降低敌人士气，逐渐地进行打大规模的歼灭仗。只要我各级指挥员精心研究情况，很好地布置兵力，组织炮火，每个军一次求得歼灭敌人一两个建制连到一个建制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并且在目前敌人冒进情况下，是最有利于我捕歼敌人的机会。

---

[1]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1951年5月31日15时下达各部队并报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关于阻击战的指示中转述的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在阅看这个指示并把它转发给斯大林时，对这段话作了修改。

# 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的 第二阶段作战方针

(1951年6月)

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1951年7月1日，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在庆祝建党三十周年大会上。



1951年7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庆祝七一酒会上。



1951年7月1日，毛泽东和物理学家钱三强等在庆祝七一酒会上。

# 关于准备和谈会议有关问题 致彭德怀<sup>[1]</sup>电

(1951年7月2日)

彭德怀同志，并金日成同志及高岗<sup>[2]</sup>同志：

(一) 同意彭留在联司<sup>[3]</sup>主持作战及七月十日的干部会议，不去平壤开会。(二) 同意邓华<sup>[4]</sup>同志代表彭出席和谈会议，请邓即日动身去平壤，务于四日晚上或五日晚上，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彭对和谈的意见即告邓华带去。(三) 李克农<sup>[5]</sup>率乔冠华<sup>[6]</sup>及其他助手，于七月二日廿二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sup>[7]</sup>，于七月四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五日早上，或五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人民军的和志愿军的）会商有关和谈会议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四) 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联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司令部。

[4]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5]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6] 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

[7] 安东，即今丹东市。

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如果没有房屋就须使用帐篷）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可能有几十人，包括新闻记者），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须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开城情况如何，望速查告。

毛泽东

七月二日上午四时

# 停战谈判期间军事上应采取的对策

(1951年7月2日)

德怀、高岗<sup>[1]</sup>同志，并金日成<sup>[2]</sup>同志：

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十天到十四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一）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尽这十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必须准备着一经签订停战协定，这些人员和物资就不能运输和调动了。（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三）杨成武<sup>[3]</sup>两个军及五十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二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四）请你们设想在停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人民军最高指挥官。

[3] 杨成武（1914—2004），福建长汀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毛泽东

七月二日二十四时

#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我方应提出的条款<sup>[1]</sup>

(1951年7月3日)

菲利波夫<sup>[2]</sup>同志：

关于敌我双方军事代表会谈时我方应提出的条款，我们认为主要有五条，即：

(一) “双方协议同时发布停火命令。双方海陆空军自停火令发布时起，在朝鲜全境实行停火及停止其他敌对活动。”此条敌方可能无异议。

(二) “双方陆海空军各自三八线撤离十英里，在三八线以南及以北各十英里的地区，成立非武装区。该非武装区之民事行政，恢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之状况，在三八线以北由朝鲜人民政府管辖，在三八线以南，由南朝鲜政府管辖。”此条敌方可提出某些异议，但我们这样提，是很公道的，敌方难于批评。

(三) “双方停止运输（包括陆运、空运、海运）军火、军队或补充部队，由朝鲜境外到朝鲜境内去以及由朝鲜境内运输到第一线部队中去。”估计敌方可能提出此项条文，故我方似应主动提出，或者此条的后一句不要。

(四) “设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由双方各推荐未参加朝鲜战争

---

[1] 这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2]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之国家之同等人数之代表组成之，负责监督第一、二、三条各项之执行。”估计敌方可能提出类似条文，故我方主动提出此条。但实行此条将会招致许多麻烦，敌方推荐的“监督委员”将在中朝国境线及北朝鲜的各交通要站检查我军的运输车辆。或者我方不主动提出此条，待敌方提出时再由我方接受之。究以何者为宜，请你酌定。根本拒绝设立监督机关，似不适宜。

(五)“双方释放战俘。在停战后四个月内，由双方各将对方战俘全部分批交换释放之。”敌方可能提出一个换一个，我方则应要求释放全部战俘。唯敌方俘虏北朝鲜人较多，并已补入南朝鲜部队内，此事可能引起争议。

以上是我们想到的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谈中应当解决的根本的五条。此外，尚有：(一)“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军在内，限期(例如在三个月至四个月内)分批自南北朝鲜撤退完毕。”这亦是很重要的一条。唯敌方代表可能认为此事属于政治范围，不应在此次会议中解决。请你考虑我方应否将此条提出。(二)“南北朝鲜双方的难民限期(例如在几个月内)遣回原地。”金日成<sup>[1]</sup>同志希望提出此条。但此事实行颇为烦难，南北朝鲜的代表可能在此问题上发生许多争论，以致影响到其他主要问题的决定。或者可以提出去，在争论不决时则将它推到将来的政治性的国际会议上去讨论。

以上各点，请将您的意见告我。

此外，我们已派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sup>[2]</sup>同志率助手们于昨夜动身去朝鲜，约七月五日可到金日成同志处，和金等会商有关和谈各事，然后去开城附近，从幕后主持这次谈判。

---

[1]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2]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附上金日成同志的意见，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

# 关于共同筹备谈判会场及开会事宜 致金日成电

(1951年7月4日)

金日成同志，并告彭德怀<sup>[1]</sup>同志：

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请你派出一位负责同志，随带若干工作人员及必要物品速去开城地区会同联司<sup>[2]</sup>参谋长解方同志筹备会场及开会事宜。如该地无房屋，就须带帐篷去。双方会议人员所需物品及会场设备，均须带去。一切均须于七月八日以前准备完毕。

毛泽东

七月四日上午四时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联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司令部。

# 关于保障开城地区的安全致彭德怀<sup>[1]</sup>电

(1951年7月4日)

彭：

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sup>[2]</sup>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毛泽东

七月四日上午四时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接替麦克阿瑟指挥侵朝战争。

# 关于速去开城准备停战谈判事宜 致金日成等电

(1951年7月4日)

金日成同志，并李克农、乔冠华<sup>[1]</sup>同志：

(一) 金于七月四日十三时的电报，李乔于七月四日十二时由安东<sup>[2]</sup>发来的报告均收到了。(二) 李乔及邓华<sup>[3]</sup>均可于七月五日拂晓到金处，请金召集李乔邓及南日、金昌满、金波、柴军武<sup>[4]</sup>等立即会商一次，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于七月五日傍晚即由平壤出发于六日早上或晚上到开城地区准备各项事宜，早一点去较好。(三) 如果你们同意早去，则给李奇微<sup>[5]</sup>的第二个通知就不要发了。但如果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

[2] 安东，即今丹东市。

[3]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4] 南日，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代表。金昌满，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联络官。金波，应为金一波，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联络官。柴军武，又名柴成文，当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

[5]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接替麦克阿瑟指挥侵朝战争。

你们认为于七日上午我们仍有必要派若干人利用白天乘车去开城帮助会议工作则那个通知仍可于六日上午发表。究竟是否发表那个通知，请金于明（五）日再给我一电。但李乔南邓金金柴等同志，最好于五日夜车即去开城，愈早愈好。

毛泽东  
七月四日二十一时

#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 统战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7月6日)

此件<sup>⑩</sup>很好，发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参考，并请仿照办理，加强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央  
七月六日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1年7月5日关于市委统战部召开统战工作会议情况给中央、华北局并报中央、华北局统战部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的收获，主要有：1. 使干部认识了在新环境下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作用和进步的可能性，并批判了以往存在着的对他们的估计不足，武断片面肯定他们落后不会进步的错误思想。2. 纠正了对各界民主人士不敢领导和怕麻烦的思想。3. 解决了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一些思想问题，进一步了解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历史、作用和前途。4. 检讨了过去对统战工作不重视或认为统战工作只是统战部与少数领导同志的事的思想，明确了今后工作的任务，增强了对统战工作的信心。

# 关于纪念武训的学校、碑文和建筑等 处理办法的批语<sup>[1]</sup>

(1951年7月7日)

可予同意。但应着重教育解释，其余可以从容处理。

毛泽东

七月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1951年7月2日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上。华北局宣传部的报告中说：“河北省委对现有武训纪念物提出了处理意见，向华北局请示。我们意见，首先对群众广泛进行教育，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然后再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一）凡私立武训学校（如北京武训小学），在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讨论渐趋成熟时，由他们自己提出更名和改组，我们同意批准，仍为私立学校。凡公立的武训学校（如平原武训师范），在教职员学生思想澄清后，更改校名。（按已改省立堂邑师范）（二）关于纪念武训的碑文、建筑等物，教育群众认清武训以后，由群众自觉地拆除。石刻、塑像、柱、碑要拔除，画像要涂抹，武训纪念林要改名，但武训墓和墓碑，我们认为应当保留。”

# 空军部队不要进驻朝鲜北部机场<sup>[1]</sup>

(1951年7月7日)

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sup>[2]</sup>

毛泽东

七月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参谋长王秉璋1951年7月3日报告的批语。

[2] 刘亚楼等的报告说：“估计到朝鲜战场最近可能出现停火局面这一情况，我们考虑是否需要在宣布停火前，以一部空军部队进驻北朝鲜各机场。如果认为可以而且需要以一部空军部队进驻北朝鲜机场，则提议立即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 停战谈判不要提赔偿等问题<sup>[1]</sup>

(1951年7月9日)

金日成同志、李克农同志，并彭德怀同志：

(一) 不要提赔偿问题，因为这样提出，一则可使英、法、美团结起来而不能孤立美国；二则美国可以发救济费的办法来作答复，而北朝鲜是不能接受美国的救济费的。

(二) 如果金日成同志认为交换难民对北朝鲜不利，则可将南北朝鲜交换难民一项条文取消不要提出，但应准备南朝鲜提出此项问题时的对策。

(三) 第二条中关于非武装区的民政事宜，同意写至“恢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的状态”为止，以下两句可删去。

(四) 不必提出“禁止转交武器”的条件。

(五) 同意增加解方<sup>[2]</sup>为代表。朝中两方的代表均应用真姓名，不要用假名。并须于本日（七月九日）发表公报，叙述人民军和志愿军的代表的官阶和姓名，请克农即刻起草发金及我。

毛泽东

七月九日上午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2] 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 对总政关于纪念建军二十四周年 指示稿的批语和改写的话<sup>[1]</sup>

(1951年7月9日)

—

作了一些修改，可即发出。

毛泽东  
七月九日

—

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关于纪念建军二十四周年的指示稿上的批语和加写的一段文字。

# 关于对南日、邓华<sup>[1]</sup>两个发言稿的意见 致李克农<sup>[2]</sup>电

(1951年7月9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sup>[3]</sup>：

七月八日廿三时电收到。（一）公报稿<sup>[4]</sup>可用，已予发表。（二）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sup>[5]</sup>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

---

[1] 南日，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首席代表。邓华，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2]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3]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4] 指李克农发来的关于朝中方面联络官已到开城地区，为在开城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会议进行布置、准备的报道稿。毛泽东据此改写为朝鲜中央通讯社的电讯稿，并指示胡乔木：“即刻用英语广播，不必登报。”

[5] 指南日、邓华分别准备在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这两个发言稿于1951年7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毛泽东

七月九日十二时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图为朝鲜停战谈判的地方开城。

# 关于坚持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列入议程等致李克农<sup>[1]</sup>电

(1951年7月11日)

克农同志，并告金、彭<sup>[2]</sup>：

来电收到。（一）撤兵一条必须坚持。（二）在各项谈判未得完全协议以前，不要让新闻记者参加。只有在获得完全协议、在举行签字的那一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数目的新闻记者参加。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上午七时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 在薄一波<sup>[1]</sup>关于傅作义<sup>[2]</sup>情况的 来信上的批语

(1951年7月11日)

一波同志：

同意你的意见<sup>[3]</sup>。请妥慎处理，团结傅及其一切可以团结的干部，并加强对这些干部的教育。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2] 傅作义，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1月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

[3] 薄一波1951年7月11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傅作义曾提出，在整风中是否要把他的历史问题向大家谈一下，薄告以不需要。

# 同意步兵师新编制<sup>[1]</sup>

(1951年7月11日)

同意。<sup>[2]</sup>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7月11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经召集有关部门对友方（苏联）为我军拟订之1.3万人一个师的新编制进行过3次讨论，均赞成这个新编制，认为只有实行这个编制方案，才能使我军真正走向现代化，改变我们现在人多武器少、火力弱的现状。根据朝鲜战场作战经验，我军虽然英勇作战予敌重大打击，但如无现代化编制装备的部队，是难以完成歼灭战的任务的。实行这个编制，对我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革，一定会有很多困难，但必须坚决实行。

# 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sup>[1]</sup> 和给胡乔木<sup>[2]</sup>的信

(1951年7月)

## —

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摘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革命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的调查发现了武训家乡的革命军。他们不是太平军，也不

---

[1] 1951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并组织了一个13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阅改而成的。调查记分作五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是捻军，而是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地方性的农民革命军。这种事实，使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作为大家判断的根据。有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答复：究竟是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批判武训、蔑视武训的人们呢，还是宣传武训、歌颂武训的人们呢？

二

武训和宋景诗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武训和杨鸣谦<sup>[1]</sup>或杨树坊<sup>[2]</sup>才是“一文一武”一鼻孔出气的血缘亲属。非常合理，武训和杨鸣谦一同受到了满清王朝褒奖，武训被赐与“乐善好施”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仪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他们不愧为替反动统治者服务，帮助满清王朝，对革命人民执行所谓剿抚兼施政策的两匹忠实的走狗！

三

武训宣传者们高兴歌颂武训的“孝行”和“友爱”，这事我们也作了调查。和这种歌颂相反，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武训早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卖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七十九岁的郭继武说：“他娘他哥都没沾他的光，他娘

---

[1] 杨鸣谦，曾是柳林县民团团长，参加了镇压黑旗军的作战。

[2] 杨树坊，杨鸣谦的侄子，继杨鸣谦任柳林县民团团长。

死的时候还不是像一条狗一样。”有人说他娘死了他哥叫他回去发丧，他说没有“哭钱”不去，在武训正患财迷病的时候，这可能是事实。群众说，武训把要来的干粮拿去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的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 四

武茂林是武训的远房侄孙，一生帮助武训干所谓行乞兴学，结果被杨树坊逼死。武鲁林是武谦的孙子，武克信的儿子，在武训晚年过继武训为孙，被杨家控以“抗不交学租”，县官捉去拷打重伤，放出来，第二天就死了。我们在前面说过武训不顾家，这是他少年和中年的事。到他老年，大约是对杨树坊控制过严不满，同时社会舆论也对他不满，还是请求杨家允许拨出了四十余亩地以作武家祭田的名义交给武鲁林的父亲武克信耕种，同时以每年交租钱十串给学校的条件满足了杨家。此事曾在官厅立了案（见《兴学始末记》，说是四十亩，武金兴告诉我们是四十余亩）。但杨家后来硬夺回去，否认祭田，肯定是学田，派武鲁林送重租，武鲁林出不起，发生争讼，因此人被活活打死，地被夺去。这就是武家“两条人命”的公案。群众对于此事一概同情武家。当武金兴向我们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和他都感觉难过。武金兴沉痛地说：“我们和杨家有仇！”

## 五

光绪十四年以后武训在堂邑方面所增加的财产是他的私产，并未捐入学校。许谨传就是替武训管理这部分私产的一个人。在武训

死后，许谨传的长子许功珏，曾被杨家以“抗不交学租”的罪名关进牢里过。根据这一点，就可知道武训生前没有交出的私产，凡是被地主们知道了的，在武训死后都被地主们以学田名义夺去了。武茂林手中也很可能有这种性质的财产。武训在光绪十四年以前所积的财产是否全部捐给柳林学校，也是可疑的，很可能有一部分未交出而由武茂林管着，武茂林之死可能也和这点有关，不过我们未找到确实证据。

许谨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兴学始末记》所载靳鹗秋的呈文里有一段说：“赵郎砦、王二大砦等村，旧有善书会一道（原文如此，疑有误——笔者），武训捐助京钱二百余吊，每年所有零捐不在其内，许谨传等欲为武训立碑，武训不许。每年齐社一次，武训不论有何事故，必亲身到社，并遍阅每年所印善书簿记。又自取各善书若干卷随身携带，到处施放”。这个“善书会一道”看来像是个会门组织，许谨传是个头儿。武训则因出了许多钱，成了这组织的大头儿。由此可知，许谨传也是一个拥护武训那一套，并帮助武训工作的人，是武训的亲信人物之一。他很有些像武茂林，不过他干的是“善书”，不是“兴学”罢了。

## 六

于殿元诉状中所说的赵一琴，是当时临清的有声望的大绅士，是个举人。武训和于殿元“结拜生死之交”，要赵一琴主盟，赵一琴也肯出面为他们主盟，我们判断是和争夺临清学校管理权一事有关的。武训愿意赵一琴一派辅导于殿元在他死后接管这个学校，而不愿意靳鹗秋一派管这个学校。故靳鹗秋方面的人也不能否认武于结

盟赵为主盟一事，而只能说“巧与结盟”。

## 七

根据上述各种材料，使我们了解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及其流氓兄弟们和地主阶级有矛盾，但在他生前这种矛盾还没有表面化，主要靠了官僚尤其省城官僚方面的维持。武训一死，他的学校先后瓦解，财产被地主霸占侵蚀，他的亲信都被打击。当地群众对于武训是嫌恶的，但对于受打击最惨的他的代理人，例如武茂林，则是寄与同情的。武训的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某些思想错误的人们也喜爱这样一个人物，而为之尽力宣扬。这样，就迷惑了许多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们。因此，揭露武训和武训宣传者的真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

## 八

在武训死后，在鲁西及别地出现了一批吃武训饭的人。其中一人是临清的号称“武训第二”的王丕显，是一个借兴学发财的学

棍，这里不来详说。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栋。武金栋，堂邑武庄人，是武训的疏族，现年七十八岁，他就是现存的一个活武训。他在武训死后一意学武训，见有钱人就磕头，低眉顺眼，出口成词，到处募捐，很积了一笔钱。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到过南京，为国民党所赏识，捧为法宝。他和我们见面，还是口中念念有词。他对群众的态度很坏，当地群众很不满意他，在土地改革时把他当作了斗争的对象。我们找他谈话，柳林镇的群众很感诧异。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群众指着说：“为啥这家伙又来了！”

## 九

根据要能作“满篇”八股文章的才能入学这一点看来，“崇贤义塾”的学生入学资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

## 十

“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经班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即一八九八年以后，这种蒙班就废止了。武训及和他合作的地主们对于设立这种程度较低的蒙班是不感兴趣的。武训及其合作者杨树坊之所以在这四年内开办了蒙班，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表示不满，他们的子弟不能上学，武训和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在学生的成分方面，经过我们调查，不但经班学生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

## 十一

在经济方面，杨树坊想打武训财产的主意。武训这时单在堂邑方面，已集了很大一笔财产，计七千多吊，“义学”一办成就不得不受杨树坊的控制。所以此时杨树坊叫武训办“义学”，武训虽欲不办也不可能了。武训一死，杨家将学校霸为私产，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后来有几年率性停办，毫无意于什么义学不义学，就证明了这点。以上是学校所以办成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时地主阶级也有教育自己子弟的必要。他们利用武训的债利、地租和捐款，就可以为他们的子孙建立一所学校，何乐而不为。《兴学始末记》中说：“堂邑、馆陶与临郡接境，自咸丰甲寅兵燹后，贫家不能读书者较之他郡尤多”（第三十六页）。这里所指的“兵燹”，就是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曾经攻克过这一带好些县城。这里所指的“贫家”，就是地主阶级自己。这样，一方面杨树坊等地主阶级需要办学校，一方面武训已骑在老虎背上，打了三十年招牌，积了七千吊款子，也逼得不能不办，因此武训就替地主阶级，并在地主阶级主持下，办起学校来了。

## 十二

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的武训，依靠封建统治的势力，剥削、敲诈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成三所学校，这种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规律的。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有政权，有军队，保护这种生产关系。因而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

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在中国的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了。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

## 十三

我们将武训学校的调查集中在柳林镇，将武训高利贷的调查集中在临清镇。这是因为武训的学校，柳林是典型，而武训的高利贷，则临清是典型。

## 十四

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去的。每张文约上的地亩数，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我们见到的七十四张文约内，有三十八张，都是三亩以下的数字；十亩以上的，只有五张。武训每次置地的数目如此细小，足证大都是贫苦农民，遇了危急情况，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卖给武

训。武训之成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内（从他三十岁算起），用各种残酷的方法，逐步地积累起来的。

## 十五

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 十六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 关于同苏联谈判订购军事装备 和军工建设问题<sup>[1]</sup>

(1951年7月12日)

向前同志：

七月七日电悉。

一、关于编制问题，经军委研究后，同意苏方所提出之方案，并决定按此编制进行装备六十个师，只有个别单位的人员须要根据中国的情况予以若干增减。

二、六十个师的装备，除两种迫击炮，七六山炮，四五战防炮，马匹、大车及通信器材均由我们自己装备不要苏联供给，餐车、面包炉只要十个师的以外，其他所有装备器材包括工兵、化学器材在内，均请苏方按照编制规定供给我们。弹药基数请其改为五个。

三、军工生产问题，同意以苏联现有武器弹药器材为标准，统一口径，统一制式，现除请苏方派遣专家设计综合组来中国了解我们现有兵工厂的情况，提出改装计划外，请你们在莫斯科将我们各兵工厂的现状材料告诉苏方，以便他们易于考虑改装与新建我国军工生产的方案。同时，在商谈时应将新建工厂与改装原厂的计划

---

[1] 这是毛泽东给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徐向前的电报。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经周恩来审改、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结合起来，将供应目前的需要与供应将来的需要结合起来，并望随时将今后军工建设的谈判情况电告。

四、谈判中几个具体问题确定如下：（一）对苏方业已答应的七种武器及其附属装备的生产和建立四个新厂的问题，可请其先派设计组来。（二）炮的生产，一五二口径以上的重炮厂可以提出，但目前炮厂建设的重点应该是中小口径的炮（三七高射炮，五七战防炮，七六二野炮，八五高射炮，一二二榴弹炮）。各种弹药厂，须与我原有者结合，须增加者亦应俟其设计组到中国考察后方能作最后确定。（三）光学厂的建设应向苏方提出。（四）通信器材须要苏方帮我建立一个真空管厂，与一个零件制造厂。（五）工兵器材除六十个师的装备外，战略工兵团应如何建设，亦请苏方提出意见。（六）钨与钼的精炼厂我们自己准备建设，请问苏方能否派专家代我设计，并在技术上帮我建立起来。（七）坦克装配厂，现已开始从修理厂扩大人手，可不再向苏方提出。

五、六十个师的装备及军工建设谈妥后，应分别签订合同。军工建设应先签订武器蓝图及设计两种合同，其他合同须俟设计后方能签订。六十个师的装备不能按以前的军事贷款计算，其偿还期限至少须八年后始能开始，十年还清（以前的军事贷款规定五年后即须开始偿还，八年还清）。今年十个师的装备运输计划同意苏方的意见。

六、其他详情由周恩来、聂荣臻<sup>[1]</sup>两同志函告。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

# 关于容许新闻记者进入开城地区问题 致李克农<sup>[1]</sup>电

(1951年7月12日)

克农，并告金、彭<sup>[2]</sup>：

在谈判恢复后讨论记者问题时，我方可同意在议程问题取得完全协议后，容许双方同等数目之记者到达开城地区，但不得进入会场。记者数目须估计我方能到者。我方记者主要在前方组织，北京方面亦可组织苏波捷等国的一些记者去。估计议程还会有许多天争辩，才能取得协议，那时我方可以组织一些记者去。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廿四时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 中央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和全国政协会议推迟召开的电报

(1951年7月12日)

中南局，并告各中央局：

七月七日转来河南省委的电报收到了。因为朝鲜和战问题现在尚难确定，故四中全会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将推迟到八月以后，即九月或十月才能召开，你们及各省市在七、八两月，可以照常布置自己的工作。

中央  
七月十二日

# 在胡乔木<sup>[1]</sup>关于翻译工作会议 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1年7月13日)

乔木同志：

同意你的各项意见<sup>[2]</sup>。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sup>[3]</sup>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指胡乔木1951年7月10日关于党的翻译工作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报告说，会议讨论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的俄译、校阅问题。关于《斯大林全集》，已译成3卷，准备在5年内完成《斯大林全集》共16卷的翻译工作。关于《毛泽东选集》俄译稿，拟由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三同志校阅。提议组成党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由稼祥同志负责。但稼祥同志一再推辞，此事请中央决定。

[3] 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他在胡乔木的报告上写了以下意见：“翻译工作委员会，由中宣部同志负责，比较便利于工作，我参加为一个委员，分配我一部分工作。”

# 关于拍发、广播对李奇微<sup>[1]</sup>的复文 修正稿致李克农<sup>[2]</sup>电

(1951年7月14日)

克农：

七月十三日廿一时半来件<sup>[3]</sup>收到，待修正后发给你，你在收到修正稿以后即可发给对方。北京广播当在七月十四日二十时即下午八时左右。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上午一时四十五分

---

[1]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接替麦克阿瑟指挥侵朝战争。

[2]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3] 指拟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名义发出的给李奇微的复文稿。

# 关于同意李奇微划中立区的提议 致李克农电

(1951年7月14日)

克农并金、彭：

(一) 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二) 请你们立即准备在敌方代表团重来开城时注意解决下列几点：(甲) 中立区的面积究竟以多少公里为适宜，为保障双方代表的安全，应考虑撤退当地居民问题，是否能迅速撤退(撤退时保障居民不受损害)。(乙) 我方武装撤退后应否以非武装人员维持秩序。(丙) 设立板门店双方联络员联合办事处问题。(三) 给李奇微复文<sup>[1]</sup>已重写，另电发来。北京准备在今日下午八时才发广播。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上午七时

---

[1] 指李克农7月13日21时30分发来的拟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名义发出的给李奇微的复文稿。

# 关于限定谈判代表团人数 和划定中立区面积问题致李克农<sup>[1]</sup>电

(1951年7月14日)

克农，并金、彭<sup>[2]</sup>：

(一) 在给李奇微的复文<sup>[3]</sup>里没有答复李奇微所提的将双方代表团的全部人员限制为一百五十人的问题，使你们留有机动的余地。如果美方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时，你们可以照你们的意见提出双方代表团工作人员各由自己规定互不干涉，但如美方坚持要规定同等人数，你们也可以同意这种规定，因为这是无关大局的。(二) 在划中立区面积的问题上以能保证双方代表安全为原则。如果可以不要迁动大范围的居民则可以同意美方半径五英里的数目，否则可以划一个通板门店的走廊及一个开城附近的较小圆圈，以便只迁移小范围内的居民。究竟如何，请按情况灵活决定。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上午十时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指经毛泽东重写的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名义于1951年7月14日给“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复文。

# 关于不必再发记者问题公报 致李克农<sup>[1]</sup>电

(1951年7月14日)

克农，并金、彭<sup>[2]</sup>：

七月十四日二时半的电报收到。关于记者问题的公报不必再发，因为主要的内容已经公布<sup>[3]</sup>，再发这个公报就重复了。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1951年7月14日，《人民日报》以《坚持双方协议原则并建议继续开会 南日将军函复美方代表》为题，刊载了新华社平壤13日电，其中谈到朝中方面对新闻记者问题的基本态度。

# 关于修改和广播对李奇微<sup>[1]</sup>的复文 致李克农<sup>[2]</sup>电

(1951年7月14日)

克农，并告金、彭<sup>[3]</sup>：

(一) 七月十四日十五时十分的电报<sup>[4]</sup>收到了。同意你的修改文句(从十三字至一百七十字)，但在十三字下仍须加上“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一句，下接“我们同意你所提的……”。(二) 北京仍在下午八

---

[1]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接替麦克阿瑟指挥侵朝战争。

[2]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3]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4] 指李克农1951年7月14日15时10分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我们仔细研究李奇微来文，发觉中立区与会址区域有大小及含义的不同。对于中立区，他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动；而对于会址区域，则须摒除一切武装人员。与其改动他的建议，不如全盘接受他的，对我主动。因此，建议对复文13字至170字作下述更动：“……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具体问题，我们建议……”我们等你复示后，再将给李奇微的复文发出。

时广播，你处可注意收听。（三）请平壤广播亦照此修改。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下午六时

# 关于金日成、彭德怀电复 李奇微原则同意将开城地区 划为暂时中立区的电讯稿<sup>[1]</sup>

(1951年7月14日)

【新华社平壤十四日电】本社记者从朝鲜前线总部获悉：昨日美方代表团借口新闻记者未得我方同意仍然不来开城开会，以致会议又停顿一天。昨日下午，此间收到了李奇微的一个通知，提出了划中立区的新问题。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将军本日已予以答复。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辩，使和平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方在原则上同意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期间的暂时的中立区。有关此问题的一些具体事项，则交双方代表团去解决。同时对于新闻记者问题也给了美方以便利。这样，就解除了美方在最近提出的一切借口，使开城会议有可能重开。

金、彭两将军给李奇微的通知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电讯稿。

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签字)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



1951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人和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的合影。左起：王政柱、李贞、甘泗淇、朴一禹、彭德怀、陈赓、邓华。

# 给黄炎培<sup>[1]</sup>的信

(1951年7月15日)

任之先生：

七月十四日大示<sup>[2]</sup>收读。尊恙极念。完全同意休养一个月，如有必要，还宜延长一个月，以期全愈。时局诚如尊论。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sup>[3]</sup>，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

敬祝痊安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黄炎培1951年7月14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近来，我头部时感发热、面红、眼红，如酒醉然；脚亦经常发热，觉酸，微肿，医生说是神经和心脏问题，嘱休养一下，拟告假一个月，易地休养。”信中还说：“朝战和谈，恐曲折还多，敌方不愿继续苦战之意甚显，但又怕涉及撤军，更怕提及台湾等问题，会引起内部哗扰，它的单相思，似在停战而暂不撤兵，等武装日本有些眉目，然后抽调（也许就是马歇尔所说：今后可以抽调）。我方应付很稳练，很大方。”“看来此事一时还不会有结果。”

[3] 指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1951年7月14日关于划分中立区等问题给李奇微的复文。

# 既然有权讨论停战 也就有权讨论撤兵<sup>[1]</sup>

(1951年7月17日)

我们提此条<sup>[2]</sup>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起草的以毛泽东名义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上加写的一段文字。

[2] 指在谈判中提出将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问题列入正式议程。

# 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的修改<sup>[1]</sup>

(1951年7月20日)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在西北局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而斗争》时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

# 关于做好尤金<sup>[1]</sup>来华的接待工作 致高岗<sup>[2]</sup>电

(1951年7月20日)

高岗同志：

菲里波夫<sup>[3]</sup>同志同意我们的要求，再派尤金同志来中国帮助我们做理论教育等工作，为时三个月。现尤金同志已于七月十五日动身，七月二十一日可到满州〈洲〉里，请即派妥人好好接待。他到东北后，请你和他恳谈一次。如他愿先来北京，则请派人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先在东北各城市向我们的干部作理论讲演，及参观工厂学校农村，则请你给以布置，派出有能力的翻译人员引导人员及保护人员，在各处布置适当数目的干部听讲会及座谈会。

毛泽东  
七月二十日上午三时

---

[1] 尤金，苏联哲学家，当时任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图书》杂志主编。

[2]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

# 在关于修改谈判议程问题发言稿 给李克农<sup>[1]</sup>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sup>[2]</sup>

(1951年7月24日)

明廿五日只用第一个发言稿，并应坚持其中建议的立场不要让步，看对方如何表现，第二天上午还是如此。到第二天下午（廿六日下午）如对方坚持反对我方新建议时，再用第二个发言稿。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为了同美方谈判朝鲜停战谈判的议程问题，李克农根据谈判可能出现的情况，草拟了两个发言稿，送中央审阅。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关于发言稿的修改和使用问题起草了给李克农的复电，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一电报稿时加写的。

# 停战前积极准备 九月的攻势作战完全必要

(1951年7月26日)

德怀<sup>[1]</sup>同志：

七月二十四日电<sup>[2]</sup>收到。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sup>[3]</sup>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六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51年7月2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美帝国主义处在矛盾状态中。我再有几次胜利战斗，打至三八线以南，然后我再撤回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按比例逐步撤出在朝外国军队，坚持有理、有节，经过复杂斗争，争取和平的可能是存在的。如经过上述办法而不能达到和平，则继续打下去，最后赢得战争胜利是肯定的。从全局观点来看，和的好处多，战亦不怕。我军于8月中旬争取完成战役反击的准备，如敌不进攻，则至9月举行。最好是待敌进攻，我则依靠阵地出击为有利。

[3] 开城会议，指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在朝鲜开城举行的朝鲜停战谈判会议。

# 给张元济<sup>[1]</sup>的信

(1951年7月30日)

菊生先生：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今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六日三次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积雪西陲一诗甚好。由于签订了协定<sup>[2]</sup>，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尊恙有起色，甚以为慰。此复，敬祝

康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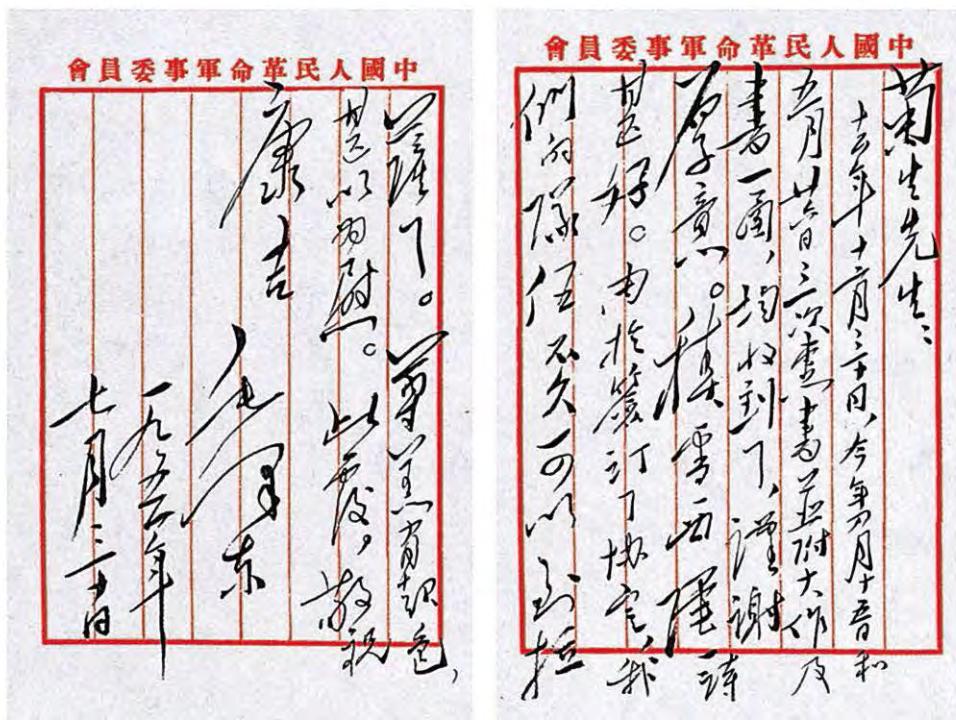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

---

[1] 张元济，字菊生，自清末起长期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长。

[2] 指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毛泽东致张元济信的手稿。

# 九月战役的兵力部署和粮弹储备

(1951年8月1日)

德怀<sup>[1]</sup>同志，并告高<sup>[2]</sup>：

(一) 以二十兵团替换九兵团一个军或两个军的部署甚好，但九兵团的主力仍以作九月战役的第二线兵力（第二梯队）为宜，不要调远了。(二) 十三兵团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应在八月上旬调至第一线积极准备九月战役<sup>[3]</sup>，而从三兵团及十九兵团中抽出三至四个军接替海防兵力。(三) 在最前线修建多数粮弹储备库，为九月战役储备充分的粮弹，使作战时能随缺随补，此点极关重要。闻你已在筹备，未知情形怎样。(四) 以上各点盼复。

毛泽东

八月一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中国人民志愿军原拟定1951年9月对敌实施战役反击。后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决定推迟执行战役反击计划（只加紧准备而不发动），准备对敌实施战术反击。

# 在胡乔木<sup>[1]</sup>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 请示报告上的批语

(1951年8月1日)

请乔木另拟一电<sup>[2]</sup>，采用统一的“九三”纪念。

毛泽东  
八月一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于1951年8月2日为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东北局并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及志愿军政治部的电报。电报说：“同意规定九月三日为全国统一的战胜日本纪念日，除东北应改在此日庆祝解放外，全国军民及报纸均应于此日纪念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 给张云逸的信

(1951年8月5日)

云逸同志：

请陈毅同志带来的信收到，再休养一年很有必要，要安心静养，不要顾虑工作。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八月五日

# 给李介侯的信

(1951年8月10日)

介侯兄：

承你转来刘伯强、刘德三<sup>[1]</sup>二位的信，收到了。请你转告他们，在当地认真工作，在工作中学习。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

---

[1] 刘伯强，湖南省韶山市如意乡杨营村人，当时在湖南省常德市总工会工作。刘德三，现名刘先瑞，刘伯强的胞弟，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五军当兵。他们的父亲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

# 为革命老根据地人民题词<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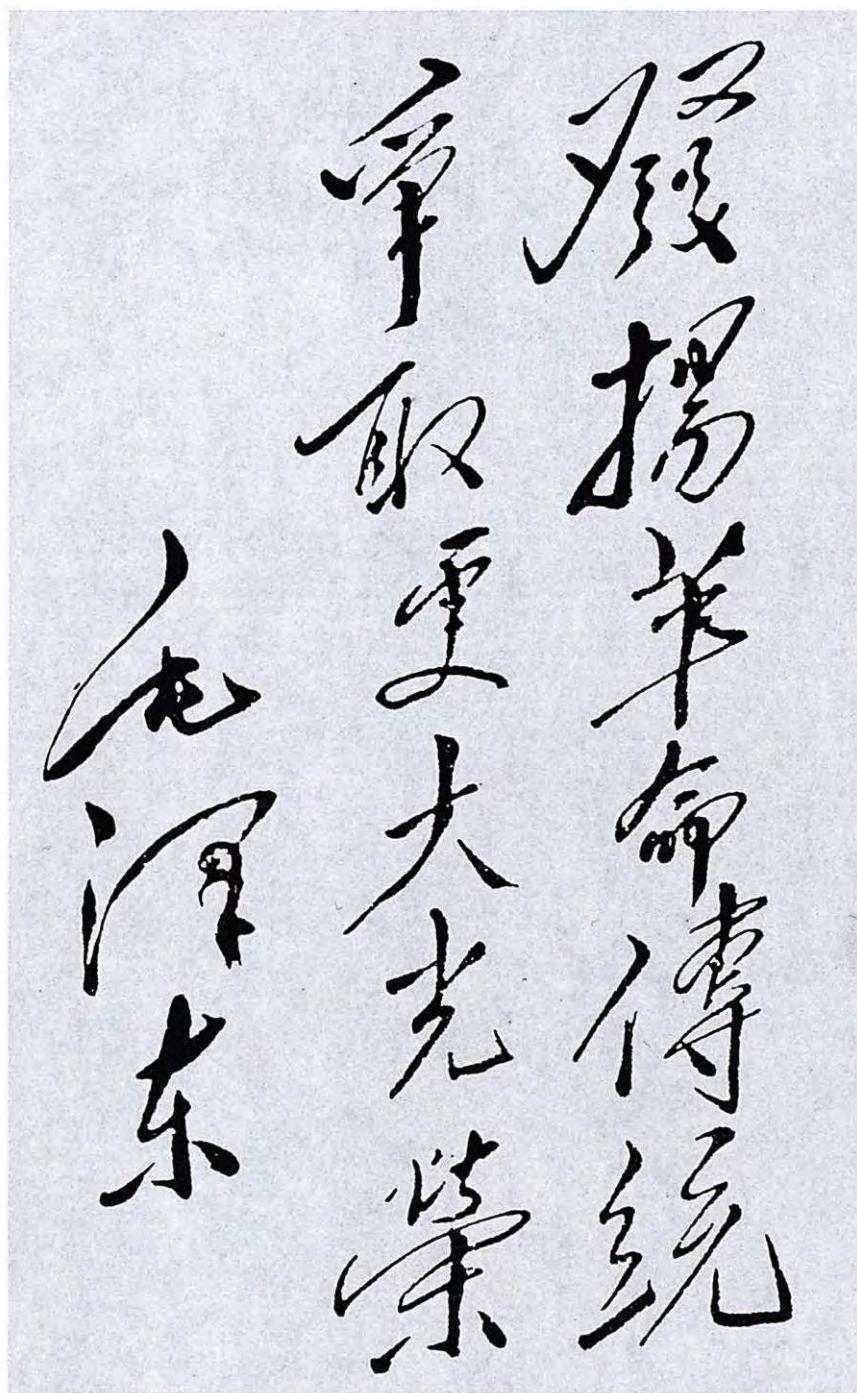
(1951年8月11日)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枣园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题词。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延安指挥中国革命长达13年。1949年10月，毛泽东接到延安老区人民祝贺新中国诞生的贺电，曾热情复电。1951年，中央派慰问团去延安革命老区，毛泽东给延安枣园人民写了这个题词。



毛泽东为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题词。

# 对袁仲贤<sup>[1]</sup>关于尼赫鲁<sup>[2]</sup>催要 毛泽东诗词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8月20日)

外交部：

不要送这种诗词。

毛泽东  
八月廿日

---

[1] 袁仲贤，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 对航空工业建设问题的批语<sup>[1]</sup>

(1951年8月21日)

照办。<sup>[2]</sup>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8月21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经召集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负责同志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共同审核苏联航空总顾问波斯毕沃夫同志提出之计划，均表同意。（一）以利用现有工厂基础，即行改为飞机修理装配厂，并于3年至5年建成飞机制造厂。（二）选定沈阳、哈尔滨、南昌、株洲等地的5个工厂作为航空工业工厂建厂基础。（三）从备战观点上看，以上5厂的位置比较突出，但为加速建设必须就现有基础进行。至于纵深的建设，似应待以后更进一步的建设中再议。周恩来批示：“拟予同意，并请李富春、何长工与苏联专家速依此计划将今年所需的航空工业建设经费以最低限度计算，提送财委审核。”



1951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越南人民访华代表团团长黄国越一行。



1951年8月，参加全国民族贸易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向毛泽东敬献锦旗。



1951年8月，毛泽东接见少数民族代表。



1951年8月，毛泽东接见瑶族妇女代表。

# 对敌实施战术反击的意见 值得认真考虑

(1951年8月21日)

德怀<sup>[1]</sup>同志，并告高<sup>[2]</sup>：

你对邓华<sup>[3]</sup>同志八月十八日电丙项作战方案的意见如何。邓华说“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当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九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如何进行法，须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的反应将会如何，请就这几点考虑电告。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一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 准备对付可能在镇南浦登陆之敌<sup>[1]</sup>

(1951年8月26日)

彭，并告高<sup>[2]</sup>：

我军已决定九月不作大规模反攻战斗，敌人又有企图在镇南浦<sup>[3]</sup>登陆的消息，因此，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及四十军均应位于原驻地，加强训练，并准备对付镇南浦方面的可能登陆。

军委

八月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镇南浦，即今南浦，位于平安南道西南。

# 以十月二十五日 为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sup>[1]</sup>

(1951年8月28日)

同意。<sup>[2]</sup>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1951年8月27日报告的批语。

[2] 萧华的报告说：10月25日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志愿军政治部8月18日来电提议，可否以此日作为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我们同意。

# 对西安市在清理积案中组织罪犯学习 《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经验的批语<sup>[1]</sup>

(1951年9月1日)

送罗瑞卿<sup>[2]</sup>同志注意，推廣西安办法。

毛泽东  
九月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51年8月31日出版的《内部参考》第一五六号上。这一期《内部参考》报道：西安市在清理积案过程中，组织一批未判决和已判决罪刑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一次《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学习，并展开了坦白、检举运动，收效很大，平息了未判决罪犯的情绪波动，使他们认识到人民政府判罪是有根、有据、有凭、有证，是分清轻重、分别对待的。不少未判罪的犯人都拿《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四条来检查自己，认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已判决罪刑的反革命分子，经此次学习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人民政府对自己的判刑，并且在劳动改造中积极生产。

[2]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 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胡志明主席的贺电

(1951年9月1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胡志明主席阁下：

欣逢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六周年纪念，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人民，向阁下及越南人民致衷心的庆祝，并祝越南人民在阁下的领导下，为解放全越南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获得新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 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致斯大林电

(1951年9月2日)

斯大林大元帅：

当此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致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以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共同防止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巩固同盟，使中国人民在反对远东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无限鼓舞。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维护远东和平的正义事业中的伟大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日

# 在中央关于对西藏各寺院及乞丐 發布施給張經武<sup>[1]</sup>的電報稿上 加写的一段话

(1951年9月3日)

发放的时机以在我入藏先遣支队及阿沛<sup>[2]</sup>等人到达拉萨，西藏政府讨论了中藏协定，并发出了拥护这个协定的通电之后为适宜，不要过早。

---

[1] 张经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他在1951年8月31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对西藏各寺院及乞丐发布施的数目和方法，中央复电同意。

[2] 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当时是西藏地方政府派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首席代表。

# 给毛宇居、文梅清、张有成<sup>[1]</sup>的信

(1951年9月4日)

禹居、梅清、有成三兄：

接到梅清、有成二兄的信，想来京一游，我认为可行。如禹居兄有兴趣，亦可同来一游。来者以三兄为限，他人不要来。到京大约可住一个月至两个月，太久则不方便。如三兄同意这几点，即可偕我这里派的同志一道来京。

此祝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

---

[1] 张有成（1886—1953），湖南省韶山市大坪乡新联村人，木工。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



1951年9月，毛泽东邀请少年时代的好友张有成（左一）、堂兄毛宇居（左二）、表兄文梅清（右一）赴京叙旧。

# 给张元济<sup>[1]</sup>的信

(1951年9月5日)

菊生先生：

八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编藏文小册子尤为急需，已告有关机构加力办理。我入藏先遣支队日内可到拉萨，沿途得藏人热烈欢迎，知悉并以奉闻。此复

顺祝时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

---

[1] 张元济，字菊生，自清末起长期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长。

# 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 决议草案的批语和修改<sup>[1]</sup>

(1951年9月)

—

瑞卿<sup>[2]</sup>同志：

已阅，略有修改，可以此稿发给到会人，征求意见，于星期六日来中央讨论一次。

毛泽东

九月六日上午三时

—

瑞卿、彭真<sup>[3]</sup>同志：

---

[1] 本文第一、二、三部分是毛泽东的批语，第四至第七部分，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

[2] 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已加修改，请你〔们〕再加斟酌，印发到会同志及政治局各同志。俟会议提出新的意见，再作一次修改，就可定案。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

### 三

瑞卿同志：

已看过，略有修改。印刷时注意校对勿错。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 四

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的领导。

### 五

鉴于过去有些县区乡，因为党政组织不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发生了镇压不彻底的现象，或乱捕乱杀的错误，因此决定：一切

由于基层党政机关内部不纯以致反革命镇压不彻底的地区，或是犯了大错误的地区（这种地区在全国说来是少数），在县区乡党政组织没有整顿好和领导力量没有加强以前，除现行犯外，必须一律继续停止捕人杀人，等待县区乡组织整顿好了（包括在县区乡组织中清出可能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内）和领导力量加强了之后，再去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对于此种地区，必须忍耐，不可性急。

## 六

在镇压反革命确实已经达到了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市区，即应结束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转入经常的对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此类县区乡或市区的判定，由省（区）市级公安机关负责（经党委讨论通过），报告大行政区及中央公安部备案。

## 七

加强对领袖、对首长、对首脑机关及重要民主人士的警卫和保卫工作，同反革命的暗害活动作尖锐的斗争，经常保持充分的警惕性，必须引起十分注意。责成专署以上和师以上各级公安机关和保卫机关负责，收集各地反革命分子的暗害案件（包括已破案和未破案的）归于一类，加以清理，找出线索，研究处理办法，做出结论，报告中央公安部。

# 对南京市委关于 宗教改革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9月8日)

乔木<sup>[1]</sup>同志：

此件<sup>[2]</sup>很好，请印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其管理宗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2] 指中共南京市委1951年8月20日关于宗教改革工作的报告。报告说，自4月以来，我们在各个基督教会中先后开展了控诉运动，举行金陵男、女两神学院扫毒展览，并继续进行了一个月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政治学习，以后又连续举办了两期基督教青年学生的夏令会，建立了全市基督教徒学生三自革新运动促进会。7月中旬，我们即以进步教徒为基础，加上部分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处领导下组织了宗教工作队，分赴各城区，深入各教堂，普遍开展了以教堂为单位的包括80%以上教徒参加的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的运动。工作步骤是：首先使工作队直接与各教堂的全体教徒见面，反复进行反帝爱国实行三自革新的教育，启发教徒揭发与控诉教会的黑暗、专横、反动的事实，并树立教徒的主人翁思想，从而展开教徒与神职班的正面斗争，以确立教会中的进步群众优势。然后由宗教事务处召开教会人员的座谈会（已开3次），阐明教会树立民主作风与教会前途的重要关系，支持民主改革的要求，强调指出民主改革是牧师与教徒团结一致，坚决击败帝国主义进攻，争取教会生存的重要步骤，以减少上层分子的对立与抵抗。

教事务的机关，并于文前加上几句介绍的话<sup>①</sup>。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1951年9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南京市委的这个报告，并加了以下批语：“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南京市委这个报告很好，其中关于进行基督教工作的方式和步骤的经验，很值得各地学习，特印发给你们研究，望各地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外事处、宗教事务处注意。”

# 关于荆嗣佑<sup>[1]</sup>工作安排的信

(1951年9月8日)

—

道衡同志：

荆嗣佑一信付上，请察阅。其中所述溆浦乡间对荆不尊重的事，请予查明酌办。荆在辛亥革命后曾当我们学校的英文教员，四十年来他做过些什么事，是否和国民党反动派有过关系，我完全不明了，请你向程颂云、程星龄<sup>[2]</sup>诸人及沅陵地委问明，并决定是否帮助他在长沙解决工作问题。至于他要求去日本的事，现在没有此种可能。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荆嗣佑，曾留学日本，任过李宗仁的顾问、湖南省制宪会议主席。当时闲居在家，1951年后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2] 程颂云，即程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程星龄，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二

荆先生：

八月二十二日惠书敬悉。所述乡间情况，值得注意，已将来信转给中共湖南省委查明办理。先生出外工作一事，也要湖南省委酌情帮助。如先生有兴趣，可与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部长刘道衡先生通讯商酌。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

# 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

(1951年9月9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

贺诚同志这个报告<sup>[1]</sup>很好，你们收到后，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引起各级领导同志注意。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

---

[1] 指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1951年9月7日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遵循“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项原则取得的成绩和工作中还存在的缺点，提出要使防疫工作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须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给予适当的重视，但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实际上因疫病而死的人数远超过饿死的，而其中大多是可以预防的。

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

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



1951年，人民群众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中央局，并转给各省市区党委、  
及领导同志。贺诚这个报告很好，你们收到  
后，也宜加以重视。在内部刊物上登载，引起各级  
领导同志注意。中央认为对防治工作非常重  
要，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這是党  
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强做  
到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  
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極力开展這項工作。

对衛生工作人員應加以領導和幫助。  
對衛生工作成績應加以檢查。在經費  
方面，除中央預算外，各級政府應盡其可  
能，在地方上籌出經費。必須教育幹  
部，使他們懂得，因為缺乏衛生知識  
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的  
損失，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  
水旱風雹等項災荒所受的損失。因  
此，至少要像衛生工作和財政防災工  
作同等看待，而決不應該輕視衛生  
工作。中共中央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必须重视  
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手稿。

# 在马寅初<sup>[1]</sup>关于北京大学教员 政治学习问题给周恩来的信<sup>[2]</sup>上的批语

(1951年9月11日)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

---

[1] 马寅初，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2] 马寅初1951年9月7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市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10位教师。”

# 给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的信

(1951年9月12日)

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同志们：

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们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sup>[1]</sup>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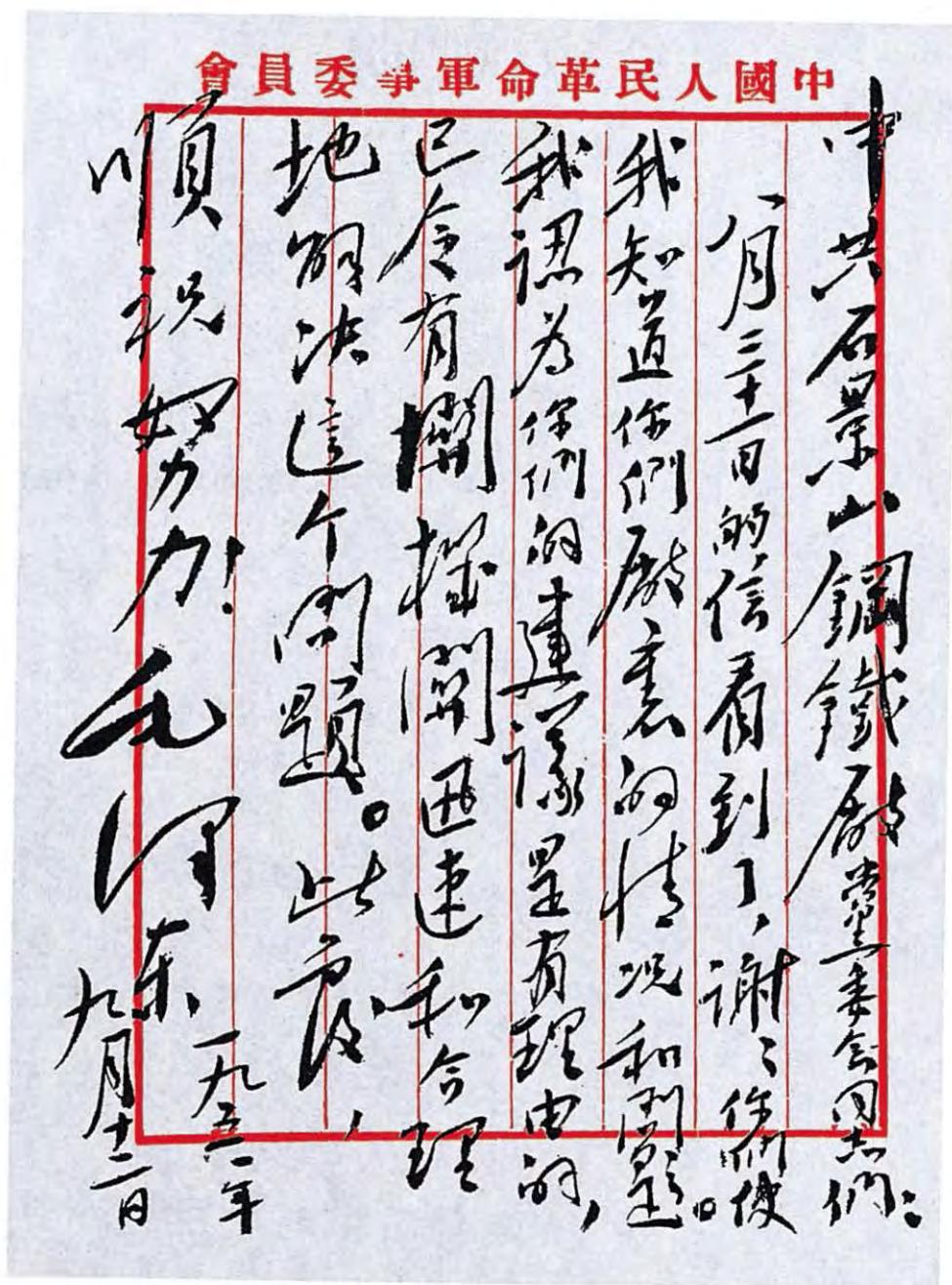
顺祝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

---

[1] 指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就当时厂内工资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状况提出进行调整的建议。



毛泽东致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信的手稿。

# 给王自勉<sup>[1]</sup>的信

(1951年9月12日)

王自勉同志：

八月二十七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

顺祝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

---

[1] 王自勉，当时任中共石景山发电厂总支部书记。

# 入藏部队的当前任务和兵力部署

(1951年9月13日)

小平<sup>[1]</sup>同志：

我先遣支队已到拉萨，张国华<sup>[2]</sup>所率部队不久亦可到太昭<sup>[3]</sup>、拉萨一线。关于这些部队一九五一年的任务是以修筑公路为主，还是以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问题，张国华在京时曾对我说应该是筑路而不是生产。张并认为明年一年即可修通甘孜至拉萨公路。但据后来所得情报，明年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此点在现在就应确定，以便在冬季有所准备。此外，关于兵力分布问题，似应在几个月内，在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拉萨的中间地点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并在这些地方布置生产，使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2] 张国华（1914—1972），江西永新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

[3] 太昭，今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

班禅<sup>[1]</sup>能回后藏，并便于展开工作。原先决定明年不进驻上述各点的计划似应改变，惟进驻时间可在张国华到拉萨和西藏政府的关系完全弄好之后，即在三四个月之后为适宜。以上望复。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

---

[1]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 致米丁<sup>[1]</sup>电

(1951年9月20日)

米丁同志：

来电收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周年，我们将于九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以电报发给你一篇由董必武同志写的文章<sup>[2]</sup>。  
此复

顺致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二十日

---

[1] 米丁，当时任苏联科学院院士、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主编。

[2] 指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杂志写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年》。

# 给黄炎培<sup>[1]</sup>的信

(1951年9月22日)

黄副总理：

九月十五日大示<sup>[2]</sup>收到。

贵体康复，甚慰。

最近上海报告一份，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其中某些部分带有机密性质，请加注意。

敬礼！

毛泽东

九月廿二日

---

[1] 黄炎培，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黄炎培1951年9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昨晚从东北归来了，在大连住一个半月，身体确已恢复正常。最近半个月在大连、沈阳、鞍山、抚顺、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参观了二十来个厂矿，很想整理所得资料，写一报告，如写成，谨当呈请赐教。”

# 致邓子恢<sup>[1]</sup>电

(1951年9月24日、25日)

—

子恢同志：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偕同小平贺龙<sup>[2]</sup>同志一道早日来京。

毛泽东

九月廿四日

—

子恢同志：

九月二十五日电<sup>[3]</sup>悉。(一) 向你的病故的老母致哀悼之意；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

[3] 邓子恢1951年9月25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昨夜始回汉，因要了解一些工作情况，又因家母前日病故，要主持丧事，故拟于过国庆节后去京。可否，请示。”

(二) 同意你于过国庆节后来京，如能于十月三日到京则甚好。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 关于印发纠正文字缺点的文件 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1年9月25日)

刘、周、胡乔木、尚昆<sup>[1]</sup>:

此四件<sup>[2]</sup>，加上中央一信<sup>[3]</sup>，共五件，请尚昆印在一起，分送各中央局，并要它们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分发中央和军委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中央政府各党组。

请乔木同志看一遍。

刘、周如有时间，可看一下。如无时间，不看也可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5月10日关于文件、电报文字缺点及今后办法的报告，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1951年5月15日关于纠正文件、电报等文字缺点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1951年6月27日关于检查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1951年8月10日关于文件、电报等文字缺点的初步检查报告，共4件。

[3] 指中共中央1951年9月25日为转发华北局等四单位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纠正文字缺点指示的情况报告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等的信。

尚昆写的信，自己就没有遵照中央那个指示<sup>[1]</sup>，有许多缺点，我已作了修改，请注意。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

[1] 指中共中央1951年2月1日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

# 致饶漱石<sup>[1]</sup>电

(1951年9月25日)

漱石同志：

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于过国庆节后即动身，于十月三日到京。

毛泽东

九月廿五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 接受缅甸大使吴拉茂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1年9月27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缅甸联邦总统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中缅两国在历史、文化上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两国人民在长期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中，更有了深切的同情与了解。我深信贵我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增进与巩固，而且必将有助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定。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缅甸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贵大使加强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1951年9月27日，缅甸联邦首任驻华大使吴拉茂向毛泽东呈递国书。

# 对章士钊<sup>[1]</sup>反映张之洞、段祺瑞<sup>[2]</sup> 遗属情况来信<sup>[3]</sup>的批语

(1951年9月29日)

—

请彭真<sup>[4]</sup>同志查明情形，酌量处理。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廿九日

---

[1] 章士钊，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2] 张之洞，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1884年任两广总督，开始兴办新式工业；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力主筹办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1898年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段祺瑞，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2年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职位后被任命为陆军总长。自1916年袁世凯死后到1926年，段祺瑞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等职。

[3] 指章士钊1951年9月28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反映张之洞、段祺瑞遗属生活窘困，所遗住宅，法院已判归政府没收，生活难以为继，要求政府给以特别照顾等。

[4]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二

在来信说到“曩者传谈偶及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皆不是人民敌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顾”处，毛泽东批：“因时间已久，人民已淡忘了，非谓过去也不是人民的敌人。”

在来信说到段祺瑞“在派系私斗上虽有失德，却无反革命之举”处，毛泽东批：“有三一八惨案。”

在来信说到段祺瑞“按其征讨复辟、对德宣战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诸节，皆不失为革命荦荦大端”一句中“晚年抗日南下”处，毛泽东批：“只此节可取。”

在来信说到段祺瑞所遗吉兆胡同住宅“所谓经敌人购买一节”，“乞公批交有司彻查，加以了解，能不没收最妙，万一不能亦希别筹照顾方式”处，毛泽东批：“此事可商。”

# 中央同意新疆分局 对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检讨的电报

(1951年9月30日)

新疆分局，并告西北局：

九月廿八日关于检讨分局没有正确执行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的电报收到了，我们认为这一检讨是好的，望在今后工作中完满地实现之。

中央  
九月三十日



195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195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献花儿童交谈。



195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宴请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 对刘亚楼等关于空四师 空战报告的批语<sup>[1]</sup>

(1951年10月2日)

刘亚楼同志：

此件<sup>[2]</sup>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毛泽东  
十月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参谋长王秉璋1951年9月27日报告的批语。

[2] 指刘亚楼、吴法宪（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空军参谋长）1951年9月27日关于我空军第四师9月25日在朝鲜同敌机进行多次空战的情况给军委的报告。

# 关于更换谈判会址问题致李克农<sup>[1]</sup>电

(1951年10月3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sup>[2]</sup>：

关于更换会议地址问题，经我们再三考虑，认为目前还应采用你们原先的主张，拒绝敌人这项无理要求，并准备与敌人拖一时期。因为敌人目前的政策是拖，我急他不急是无用的，到了敌人真想解决问题的时候，那时就可以扯拢了。因此，所拟复件<sup>[3]</sup>，便可简单，对于未了事件的处理，既不取消，也暂不提，看敌人如何反映〈应〉。复件现附上，可于十月四日上午送出。北京拟在四日晚广播，五日登报，请平壤亦同时发表。

毛泽东

十月三日十八时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指为金日成、彭德怀起草的关于更换会议地址问题给李奇微的复文。

# 给徐冰<sup>[1]</sup>的信

(1951年10月4日)

徐冰同志：

全汝真的信付上。她是覃理鸣<sup>[2]</sup>的夫人，其子患病，要求照顾。请你派人调查一下，全汝真在政治上是否有问题。如政治上纯洁，对其本人及儿子，似应予以照顾。请酌办。

毛泽东

十月四日

---

[1]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2] 覃理鸣，即覃振，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临时参议员。1924年国民党改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次年参加西山会议，后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等职。

# 为马毛姐题词<sup>[1]</sup>

(1951年10月4日)

毛姐：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马毛姐写的题词。1949年4月20日夜，毛泽东、朱德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年仅16岁的马毛姐在家乡安徽省无为县参加了渡江第一支船队，因战绩突出，被授予“渡江英雄”称号。1951年10月4日，毛泽东派人接马毛姐到家中做客，还特意为没有正式名字的小英雄“马四姐”起名为“马毛姐”。毛泽东说：“‘马’是你家的姓，名字第一字就跟我姓了。”当毛泽东知道马毛姐上学了，便高兴地在一本笔记本上写道：“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

# 对李维汉<sup>[1]</sup>关于给班禅<sup>[2]</sup>送礼等事的 报告的批语

(1951年10月6日)

维汉同志：

送礼及相片题字<sup>[3]</sup>均照办。吃饭时间，由你处酌定得我同意后办理。塔尔寺<sup>[4]</sup>字不写。

毛泽东  
十月六日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3] 李维汉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以毛泽东的名义赠给班禅黄缎子袈裟料、砖茶等礼物及毛泽东亲笔题字的照片。

[4] 塔尔寺，在青海省湟中县境内，是喇嘛教格鲁派著名寺院之一。

# 给谭熙春<sup>[1]</sup>的信

(1951年10月7日)

熙春先生：

九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生活困难，甚为系念。毛禹居<sup>[2]</sup>兄现在此间，待其还乡时，当与一商援助办法。此复  
即颂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

---

[1] 谭熙春（1882—1960），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竹鸡村人。当时在乡务农。1920年曾在长沙毛泽东等创办的文化书社当店员，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安源、上海等地从事过工人运动和党的通信联络方面的工作。

[2] 毛禹居，即毛宇居。

# 给戴毓本<sup>[1]</sup>的信

(1951年10月10日)

毓本同志：

九月九日来信收到。大有进步，甚以为慰。我同意彭习梅<sup>[2]</sup>兄入革大学习，但须他自己下决心。如他决来，可持此信和校方接洽入校事宜。此复

顺问近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

[1] 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2] 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

# 给贺晓明的信

(1951年10月10日)

晓林兄<sup>[1]</sup>:

九月十四日来信收到，承你告以许多事情，甚为感谢。你家分了土地，生活有了保障，向你祝贺。你在乡耕作甚好，不要来京。此复

顺祝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

[1] 晓林，系晓明之误。毛泽东应称贺晓明为弟。

# 给文炳璋<sup>[1]</sup>的信

(1951年10月10日)

炳璋同志：

七月五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人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军队工作。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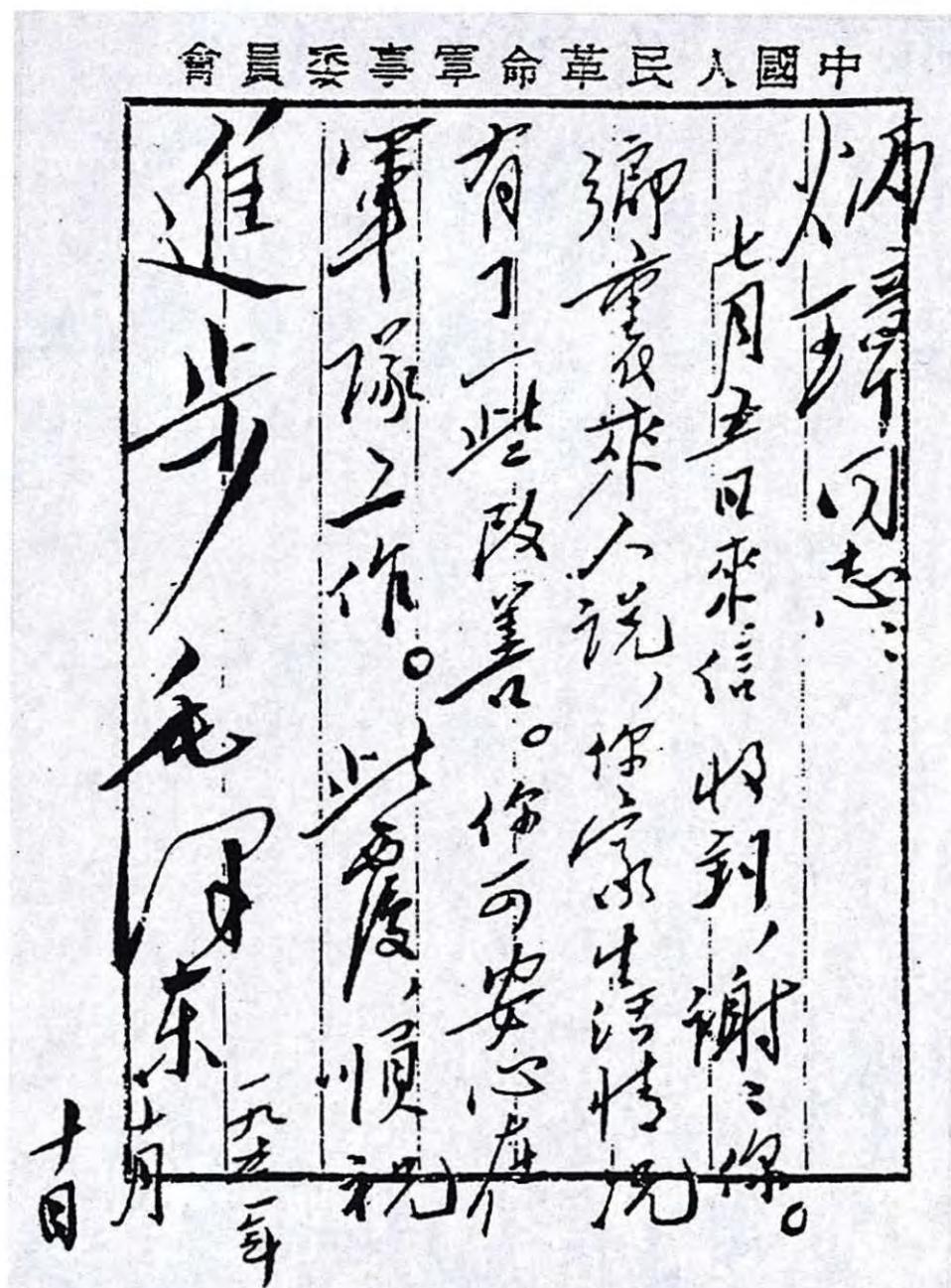
顺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

[1] 文炳璋（1920—1973），湖南省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唐家圫（当时属湘乡）人，毛泽东的表侄。文炳璋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防空司令部通讯连工作，1954年转业，后在北京合成纤维厂工作。



毛泽东致文炳璋信的手稿。

# 给雷瀚的信<sup>[1]</sup>

(1951年10月11日)

雷先生：

看到你十月八日给我的热情的信，甚为高兴。我为你的努力和进步表示庆贺！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一日

---

[1] 雷瀚，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著名教授、物理化学家、电气学家，在参加了庆祝新中国成立两周年的游行活动之后，心情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于10月8日提笔给毛主席写信，汇报自己两年来的思想、工作和身体情况。这是毛泽东给雷瀚的回信。

# 在关于扩大中立区问题 给李克农<sup>[1]</sup>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1951年10月12日)

这样转弯<sup>[2]</sup>比由金彭<sup>[3]</sup>出面转弯要好得多，并且以早一点转弯为宜。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给李克农的电报中指出：“在联络官会议上可以相机表示，扩大中立区问题应由代表会正式讨论，但为准备代表会的讨论，不反对在联络官会上就此问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

[3]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 在铁道部工程师韩伯林反映 住房及房租问题的来信上的批语

(1951年10月12日)

彭真<sup>[1]</sup>同志：

此事<sup>[2]</sup>请市委讨论一下，找出解决办法，并给韩伯林工程师一个答复。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2] 指韩伯林在信中反映的因北京市房屋紧张、房租上涨，一些公务员无房住和整天忙于找房以及房产交易所不能起解决房荒作用等问题。

# 中央关于由邓华<sup>[1]</sup>转达中央对志愿军战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的电报

(1951年10月14日)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九月二十日的电报<sup>[2]</sup>早已收到，我们认为你们的总方针是正确的。邓华同志现来北京，中央已将最近关于志愿军战略方针，节约兵力，节约资材，节约经费及两岸迫近敌人可能登陆处筑工事等项决定告诉了他，由他向你们转达。希望你们联系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执行办法，争取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sup>[3]</sup>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

---

[1]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指中共志愿军委员会1951年9月20日关于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谈到5次战役后部队阻敌的经验教训、整训情况、思想动态与后勤工作，并在持久作战的总的方针指导下对各方面的工作作了具体布置。

[3]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中共中央

十月十四日

志願軍党委 九月三十日 電平已收  
親愛的同志們  
約，我們認為你們的方針是正確的。鄧華同  
志現未回北京，此時最近回復於志  
願軍戰略方針及節約兵力、節約資材，  
節約經費及兩岸直近敵人可能發動第二步  
黃項決定告訴了他，由他向你們轉達布  
請你們根據實際情況規定具體執行辦法，  
爭取朝鮮和平的最後勝利。中央對於  
志願軍全体同志在志願軍支前和敵後協同

志的領導下進行了一個整年的英勇作戰，  
取得了很大的勝利，表示欣慰與慰勞。目前  
的任務是用一切努力爭取最後勝利。目前  
國內情況是很好，國際形勢也於我們  
有利，敵人因爲我軍在朝鮮甚多，我們也有利  
條件，但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同志們繼續努力，  
並和朝鮮同志始終團結一致，最後勝利  
中共中央十月十四日

是可以取得的。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由邓华转达中央对志愿军战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的电报》的手稿。

# 给陈叔通<sup>[1]</sup>的信

(1951年10月14日)

叔老：

十月九日惠示<sup>[2]</sup>敬悉，谢谢您。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有，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力上顾得及的话。

有一份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

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

---

[1] 陈叔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陈叔通1951年10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前曾面陈愿参加土改，本月全国委员会开会拟于11月出发”“按照原定办法须经所属机关批准，叔通属于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应请批准。再全国委员会梅龚彬副秘书长亦愿参加，并拟约其同行”。

# 关于转发东北农村生产 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

(1951年10月17日)

—

刘、周、朱、陈、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sup>[1]</sup>：

此件<sup>[2]</sup>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

毛泽东  
十月十七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1951年10月14日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给毛泽东的报告。

二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

兹将高岗同志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sup>[1]</sup>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每个省区都要建立生产新式农具的国营工厂，以便农民购用此种农具。省、专区和县都要建立至少一个公营农场，以为示范之用。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发给你们。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

[1] 高岗在报告中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这里的关键是看我们对合作互助组领导的实际成效如何，即是否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多打了粮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各类形式的合作互助组要做出比较优良的成绩，来积极动员与吸引单干的农户自愿加入各种类型的合作互助组，但必须强调自愿，不能对单干户有任何强迫和歧视。对单干户在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同样要帮助他们解决。人民政府应从各方面给互助组以优待，特别是在农具、技术指导与供销方面。为了更好地领导合作互助组的发展，必须培养合作互助组的骨干。省、县、区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应训练积极分子，推广经验，提高觉悟，巩固组织，并经常派人指导与检查合作互助组的工作。农村党的支部和党员要成为合作互助组的核心。

# 转发西南局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 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批语

(1951年10月17日)

中南局，华南分局，华东局，西北局，并转所属省市区党委：

下面是西南局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的经验<sup>[1]</sup>，请你们加以注意，并仿照办理。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10月10日给各省、区、市党委并报中央的电报。电报总结了西南第二期土改中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一、组织土改工作团，在其他工作不受重大影响条件下，必须动员必要的骨干参加，特别应坚决尽量动员一批高级干部参加，使他们不致坐失能够得到锻炼的良机。二、对民主人士参加土改，一方面要热烈欢迎、积极帮助，同时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要进行诚恳坦白的适当的批评，即把他们既当干部使用，又当干部教育。三、土改工作团下乡后，在土改工作上应当完全受当地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并与当地土改工作干部混合配备，组成工作组分散在各乡村工作；但亦应保持其原来土改工作团的一定的组织上的联系。四、为了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各系统党内外干部参加或参观土改，组成“西南参加土改工作筹备委员会”。各省、区如有必要亦可组织。五、土改告一段落或土改结束后，尽可能召集民主人士集体座谈经验，或向其中比较负责者个别征求意见，并听取负责人的一些意见。六、对于下乡土改干部的生活待遇及补助费等，除少数人经派出机关规定特别照顾外，一般都应一致，不应参差，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sup>[1]</sup>

(1951年10月23日、11月1日)

## 开幕词

(1951年10月23日)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指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和闭幕词。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们：

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现在开大会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之外，应邀列席的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出席和列席人员中包括了许多为人民所公认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我们这次会议的这个规模，充分地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战线上都有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致开幕词。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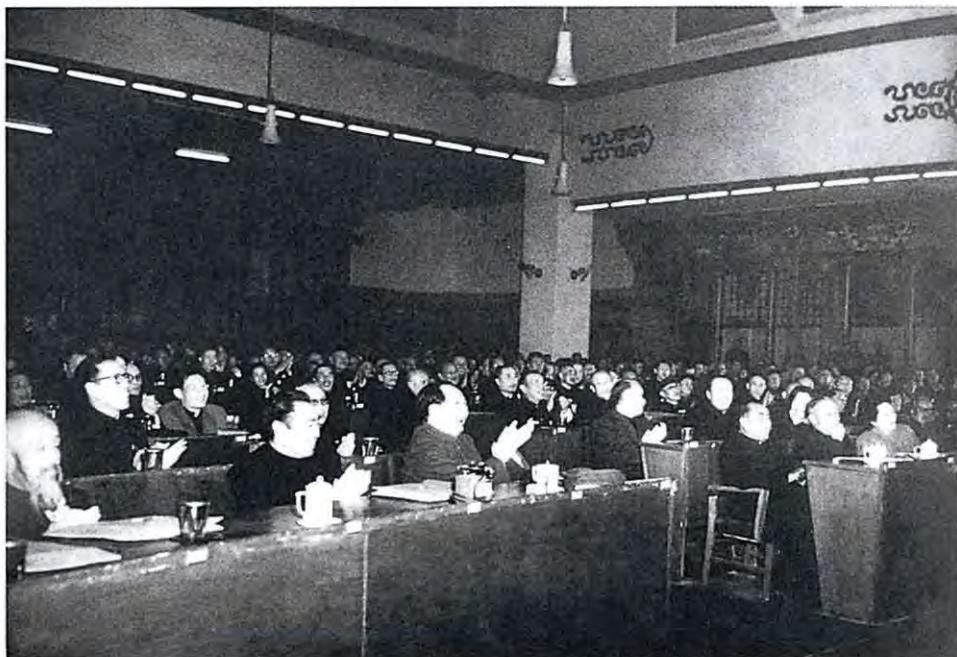
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以外，即将于一九五二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我们应当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表示庆贺和敬意！

由于上述三大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由于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现土地改革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善其物质生活 and 文化生活的可能。只要我们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要出现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

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号召继续加强在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图为会议会场。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

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年中，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我们是依靠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才获得的。在国内，我们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在国际范围内，我们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由于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各方面工作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的敌人所没有料到的。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他们也看不到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

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我们的敌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还想欺负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还想称霸世界。但是，同志们，我可以断定，他们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欺负的，以苏联为首的伟大和平阵营是不能侵犯的，全世界和平人民是不能欺骗的。同志们，自从伟大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就确定了，现在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而使这个局面发展和巩固了。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发生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这种事实还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没有成立的时候。但是结果如何呢？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图是狂妄的和徒然的吗？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想要称霸的帝国主义却得到了被打倒的结果吗？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苏联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在这种时候，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过去德、意、日三国侵略者的老路，则其结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吗？总之一句话，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并好好地和我们的苏联盟友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

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向着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同志们，只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胜利决定地是我们的。

## 闭幕词

(1951年11月1日)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为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示庆贺。如像我们在国际国内各项伟大斗争中团结一致一样，我们的会议也是团结一致的。而且我们的团结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更亲密，一年比一年更加生气勃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形成的，它是一个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几万万人的统一战线，它是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它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它又是采用自我批评方法的，因此，它就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它就能够越来越有生气，越来越有力量，它就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同志们，我们已经总结了过去一年的经验，规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并且补选了十八名委员，让我们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前进，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吧！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图为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讲话。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和朱德握手。



1951年10月，毛泽东和雷洁琼委员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交谈。



1951年10月，毛泽东和艺术家周信芳在一起。



1951年10月，毛泽东和新闻总署副署长范长江交谈。



1951年10月，毛泽东和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等在一起。



1951年11月，毛泽东和医学家黄家驷、工商代表荣毅仁在一起。



1951年11月，毛泽东和甘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马鸿宾（左一）、宁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马腾霭（左二）在宴会上。



1951年，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青年志愿军代表，在了解了志愿军战士生活后，为青年志愿军代表签字留念。



1951年，毛泽东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并为其签名。



1951年，毛泽东和志愿军归国代表在一起。



1951年11月1日，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在郭树德的《毛泽东选集》上签名。

##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0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